

7-21

中山論爭戰

李浴日著

大元帥令

派大元帥
華林
察此令

孫文

世界兵學雜誌社發行



論爭戰山中

著編日浴李

行發社誌雜學兵界世

中華民國卅一年七月初版

編著者 李 浴 日

發行者 世界兵學雜誌社

社址：韶關上后街卅六號
前座二樓。電報掛號0350

曲江特河印刊。李合作社

社址：河四台兒莊第一號

代售者 世界兵學雜誌社

韶關：中國文化服務社
社廣東分社
新建設出版社

桂林：國防書店
大時代書局

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
及各地分社

中山戰爭論



版權所
翻印必究

定價 國幣 十五元

學校機關直接向本社購十冊以上者一律九折郵票九折計算
函購另加掛號郵費國幣一元
如欲航空寄發加郵費四元五角

自序

我們不要害怕戰爭，我們應迎接為民族國家求生存謀解放的革命戰爭！

我們不要諱談戰爭，我們應在紛歧錯雜的戰爭思想界裡，把我們革命的戰爭理論體系建立起來！

中國的開國史，是黃帝驅逐蚩尤的歷史，亦即中國戰爭史的第一頁，五千年來的中國歷史，大半是戰爭史，我們的祖先大多數過着戰時生活。蔣百里先生說：「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強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真是指出我們民族國家盛衰興亡的所在。

從五千年來的中國歷史看，從五年來的抗戰過程看，現在我們是急需建立一種戰爭理論了，但這個重大問題是不容易解決的，復古不行，標新不是，為兵學而兵學不可，為優畧而兵學更不可，却不知它早為我們的革命導師——國父孫中山先生給我們根本地解決了，他的戰爭理論，是實踐的，從戰爭的實踐中產生出來，是革命的，為革命而建立戰爭理論。

中國今後的一舉一動是與有真理的指導了，否則，陷於盲從和盲動，固無成功可言，且會招來不良的結果。何況戰爭為人類生死線上的活動，為民族國家掙扎於盛衰存亡之道的最高表現，自然更要有真理的指導，國父的戰爭理論，是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真理，所以闡揚它來建立中國今後的戰爭理論體系，實為必然的歸趨，又為我們當前的急務。

在黃崗山上，放眼遠眺，便是蜿蜒的山岳，衝立於天際。冬天的夜裡，山上野火四作，火為風煽，正如火龍的飛舞。我的四週是一片青翠的松林，風從天上來，松聲作古樂般的彈奏，在這個環境裡，使我常作深思，使我想起應繼我的「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商務版）之後，來寫一

部「中山戰爭論」，但這個整理和闡揚的工作，却比「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爲難，何況又屬於創舉，但我相信精神力是可以征服一切困難的，於是拼擋俗務，着手編纂，經過去年一個夏季的奮鬥，終把初稿寫成，秋涼拂稿長征，由韶赴渝，再事博訪周諮，以爲補充，春初南飛，在苗崗山上，又下數月工夫，方告脫稿，但因參考材料的缺少，及時間的限制，致未克盡量發揮，細爲推誠，爲拋磚引玉計，便匆匆地付梓了。在這裡，我應感謝給我匡助的友好，并誠懇地就正於海內外的高明！

國父的戰爭理論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產物，在此以前爲「孫武兵學」時代，從今以後，當爲「孫文兵學」時代，從「孫武」到「孫文」，顯名思義，真是中國兵學上一個趣味的奇蹟。今日我們讀他兵學理論，在字裡行間感覺到蘊蓄著一種無限的生氣和浩氣，這是「民族復興」之氣，中華民族的人們今後應浸淫薰陶於是氣之中。我們再看他歷次指揮作戰的精神，其大仁大勇大智，實可作爲我國軍人的傳統精神。像英國海軍以納爾遜的精神爲傳統精神，法國陸軍以拿破崙的精神爲傳統精神，德國以腓特烈爲傳統精神，這纔才能把我們的革命軍、國防軍的基礎像鋼鐵般的建立起來。

中華民族今後是要在「鐵的時代」裡奮鬥而爭取他的生存解放和發展了，數千年來「重文輕武」之風和「文武分離」之習是要澈底地給它蕪除了，今後應爲筆與劍的合作，但劍應列於第一位。唯有劍才可以制服一切惡魔，唯有實行國父的戰理戰法才可以使劍獲得光輝的勝利！

李浴日

民國卅一年七月廿二日序於國
父兩次誓師北伐的聖地——韶關

中山戰爭論

目次

封面——集國父遺墨

一個偉大的昭示

兩個正確的闡明

自序

- | | |
|--------|----|
| 一·緒言 | 1 |
| 二·戰爭思想 | 23 |
| 三·國防計劃 | 43 |
| 四·軍政興革 | 67 |

五·決勝精神力	181
六·戰爭與政治	173
七·戰爭與經濟	151
八·戰爭與宣傳	141
九·鐵的紀律	128
十·戰畧戰術	106
十一·縱橫戰論	96
十二·結語	81

一·緒言

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中國國民黨的手創者，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建設者——國父孫中山先生，向來一般人都一致推崇他爲中國現代一個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却很少認識他也是個大軍事家，並在遺教中，建立了中國現代的戰爭理論。自然這個闡明的任務，有待於我們今日的努力和完成。

國父一生雖然沒有機會進過軍事學校，却常和軍事專家研究軍事，並自修古今中外的兵書，尤以他卓越的天才，和在醫科學校時代對於科學的修養，這都是打好他成爲一個大軍事家的基礎。可是國父爲什麼要懂得軍事和會用兵呢？因爲國父以完成國民革命爲己任，而欲完成國民革命，則必須「起義」——發動戰爭，戰爭是「政治的手段」，亦即革命的手段。一個健全的革命領袖固須擅長政治，亦須兼長軍事，退一步說，縱不一定要有用兵的大才，起碼亦須懂得軍事，然後才能隨機應變，指揮裕如。

現在我們爲研究國父的戰爭理論，首先應知道的是國父研究軍事及指揮軍事的經過實情，因爲這是國父成爲偉大軍事家之所在，亦即國父戰爭理論的根基。

一、關於
國父的
研究軍
事：

根據我們的考証：國父的研究軍事應以此為起源，即太平天國滅亡十年後，

國父在村塾讀書時，村中有一個太平天國的遺兵，常到塾裡為學童講述洪楊革命的故事，國父聽得，深慕洪秀全之為人，推溯滿清之志，不禁油然而生，憤兵

對國父特加愛許，一遇無事，便和國父詳談當年戰事，如洪秀全怎樣起義，引

怎樣從廣西打到湖南，再打到武漢和南京等等，並以洪秀全第二勉國父，國父得此啟發，引為無上榮耀，亦輒以洪秀全第二自居。

國父於一九〇三年（癸卯）夏由安南東渡日本，致力外交活動，結識日野龍藏少佐，日野留英多年，為日本軍事專家，以研究南非洲波人散兵戰術，（類今之游擊戰術）及發明日本式盒子砲，聞名於時。國父認此種戰術最適用於揚竿起義的中國革命軍，乃和日野研究，除筆記其口述外，並購置英文的英波戰史及圖籍百數十卷，日夕觀摩，孜孜不倦。同時為實施同志以軍事訓練，乃秘密組織「革命軍事學校」於東京，延聘日野為校長，小室健次郎大尉為助教，學科除普通兵學及製造盒子砲炸藥外，尤注重於波人散兵戰術的傳授。第一期學生共十四人，開課之日，國父親臨致詞，聽者大受感動。至於國父當時為推翻滿清，在粵桂邊境及各地所組織的革命軍或稱「民軍」，實為今日之游擊戰術，當屬游擊戰術。于此可見游擊戰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

現代的軍事學術，是一種專門而複雜的科學，且不斷地向著日新月異的前途邁進。故在現代歐成一個大軍事家，除要努力自修之外，還要與良師益友切磋砥礪，以匡不逮，而收事半功倍之效。國父有見及此，加以自己的虛懷若谷，故每求教於外國軍事專家。像上述的日野，便是其一。此外還有美國軍事評論家堪馬利（民元聘為南京臨時大總統府高等顧問），英聯戰將嘉蘭、李察及英德法將校多人。

至於自修兵學方面，國父對於普通軍事書籍，如典範令及六大教種等，莫不一一精通。在社會雜報的自序中，曾提及步兵操典說：「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瀏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對於外國軍事名著更為愛讀，據一位老同志最近給我的信說：「總理所讀各國兵書，以德著英譯為多。據言：軍事學以德著為第一」。又說：「總理對外人用兵者最崇拜拿破崙，書架上滿置各國名人關於拿破崙之著作。癸卯年（民前九年）曾語人謂：拿破崙器，百年後始大放光明，蓋歐人研究拿破崙戰畧之佳本，多出版於百年以後也。總理對拿破崙每次戰役，皆瞭如指掌，有條不紊，據言：諸役以攻奧一役為最神妙，於戰史上最有價值」。（註一）至於我國古代各家兵法，亦有精湛的究研，就中以「孫子兵法」為最。在民權主義上評該書說：「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又對同志說過：「拿破崙的作戰，深得孫子的蘊奧」。原來拿破崙在歐洲作戰，陣中常披閱法譯「孫子」——譯者係由

法來華傳教的教士。當對同志講解太平天國戰史及其他攻守之事，輒引孫子的原則來說明，有時並很精細地指出那原則是見於「孫子兵法」中第幾篇第幾頁第幾行。（註二）

此外 國父于演講中常歡喜引用軍事來說明本題的。如民權主義上說：「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一。又如黨員之言門同於軍隊之營門演講詞上說：「這次的大會（指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浴血註）好像是一個大軍事會議，定了種種作戰計劃，下了許多攻擊命令，交各將領帶回去實行作戰一樣。又好像是一個大兵工廠，製了許多槍礮，出了很多子彈，請君在此領了很多槍礮子彈，回到本地地方去，便要分給到各位同志，補充他們，各位同志得了補充，便要他們實行攻擊，不可空耗了這些補充，到了實行攻擊的時候，必須密察敵情，隨機應變，對於敵人要能够收效，那才算是冤枉了這補充」。非對於軍事素有研究曷能作此說明。

二、關於
國父的
指揮軍
事：

國父從事革命運動，認為欲掃除革命的障礙，決不是採用溫和手段所可奏效，只有假以軍政時期，斷然採取戰爭的手段。在歷史上，像我國的湯武革命，美國的獨立運動，法國和俄國的大革命都是如此的。

國父於一八八五年（乙酉）中法爭結束之時，已決志致力於推倒滿清的革命運動。正如自傳所述：「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以醫術為入世之媒」，而首先採取軍事行動，以圖推翻滿清，係肇端於一八九五年（乙未）廣州之役。又如自傳所說：「欲襲取廣州以為根據

。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爲幹部，設學於羊城爲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衛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澹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衆，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洩已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之第一人。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帥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因或釋。當時 國父在廣州居中指揮，清吏懸賞緝拿，急如星火，泰然匿居十餘日，方從間道脫險安抵香港。

自此而後， 國父更積極地策劃軍事的進行，由他直接發動同志起義的，有一九〇〇年（庚子）惠州之役，一九〇七年（丁未）潮州黃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及一九〇八年（戊申）欽廉上思之役，雲南河口之役。就中以欽廉之役， 國父命王和順率二百餘人大破勝兵於王光山，爲最光彩的一頁。當時安南的法蘭西新聞曾論此役說：「此處革命軍，不知用何戰術，能一戰而去清兵四分之三，可稱奇捷」。尤以鎮南關之役， 國父挺身親臨督戰，以一當十，充分表現了革命領袖的英勇可風。

鎮南關是桂省南部的一個要隘，向有「第二旅順口」之稱，這一役可以稱爲小規模的要塞戰。 國父當時欲奪取鎮南關，以壯革命的聲勢，命黃明堂用革命戰術，於十月廿六日率百餘人襲

取該關。俄頃，所有鎮中鎮南鎮北三座砲台，盡爲克復。國父在河內接得捷報，興奮異常，乃率同黃克強、胡漢民、胡毅生、及日本志士池亨吉（新聞記者）、法國退職砲兵上尉（佚名）等，於廿九日從河內搭乘火車直達同登站（此站與鎮南關距離不遠）下車，步行抵關，時已入夜。當即召集軍事會議，決定防禦計劃，並指定何伍坐守鎮南，李裕卿坐守鎮中，自己與明堂、克強等坐守鎮北，檢査所俘獲戰利品，爲數無多，不足以增強我軍的戰鬥力。而清軍陸榮廷等却擁衆二千餘人浩浩蕩蕩地來圍攻。國父利用居高臨下的地形，沉着指揮守軍抵抗，又親自督率法國砲兵上尉發砲，轟擊敵陣，使敵人不敢仰攻。俄因衆寡懸殊，未能由守勢轉爲攻勢，給敵人以包圍殲滅。到了第二天，國父爲逼返河內，籌款購械，以圖大舉，便偕同行者乘黑夜繞道下山了。留下明堂等繼續抵抗，因糧盡彈絕，活躍於十萬大山的友軍揆遠不能來援，一直抵抗至十一月四日，才突圍而出。（註三）

可是，上述各戰役，在軍事上，雖然收效甚微，但在政治上，却得到偉大的成功：震撼羈縻的心胆，樹立大漢的聲威，造成革命的時勢，促進全國各地的起義。往後國父雖遠處海外，然愈挫愈奮，再接再厲，仍命國內同志到處發難，於是便有一九一〇年（庚戌）廣州新軍之役，及轟動全國的一九一一年（辛亥）三月廿九黃花崗之役，因而促成是年武昌起義，跟着此次起義，各省便紛紛響應。國父在海外聞訊，奔馳回國，各省代表於十一月十日齊集南京，選舉國父爲

儀，仍負隅北京，國父毅然主張用武力消滅解決，積極進行北伐軍事，每每召集各軍將領指示機宜。于指示時，置地圖於桌上，按圖指示，如何進軍，如何攻守，均合用兵原則；并囑調革命軍不怕武器的拙劣，只要攻擊精神旺盛，便可以寡擊衆，百戰百勝。起初一般將領以爲國父沒有進過軍事專門學校，不會懂得軍事，及至領畧這一番訓示後，大家都深深地佩服他兵學的深造，尤佩服他那種審慎而虛心的指示態度，這是一位親歷其境的老軍官告訴我的（註四）。至所決定的北伐計劃：「以鄂湘爲第一軍，由京漢鐵道進。寧皖爲第二軍，向河南進，與第一軍會於固封鄭州之間。淮揚爲第三軍，煙台爲第四軍，向山東進，會於濰州秦皇島，合隴外之兵爲第五軍。山陝爲第六軍向北京進，一三三四軍既達第一之目的後，與第五六軍直指敵巢」（見覆黎元洪電）。這時由津浦路前進的北伐軍，所向無前，連戰皆捷，初次粵軍姚雨平及蘇軍合敗敵軍張勳於固鎮，敵方增援而來，戰於南宿州，又爲姚軍及淮軍陳幹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張勳等只得放棄徐州，敗走濟南。我軍乘勝追擊，一鼓而下徐州，各路亦正謀分進合擊，直搗幽燕。清帝見情勢危急，授權袁世凱議和，同時我方主和者亦居多數，遂以清帝退位爲條件，而中止北伐軍事。這便是民國成立以來，國父首次指揮軍事的經過。

可是滿清雖告推翻，而繼滿清之後的封建遺孽及反革命勢力，却又此仆彼起，變本加厲。

國父目擊心傷，認爲職責所在，只得重主軍事，繼續討賊逆了。十餘年間，由討袁之役（民國二年及四年兩次），而護法之役（六年聲討馮國璋，段祺瑞），而討莫榮新之役（九年），而討陸榮廷之役（十年），而討陳炯明之役（十一年至十三年），而討沈鴻英之役（十二年）及削平廣州商團之變（十三年）等，就中除討袁之役，避居日本，遙爲指揮各省同志起兵討賊外，其餘戰役均以廣州爲根據地，就近指揮。在這個時期中，國父於民六被選爲海陸軍大元帥，民十被選爲非常大總統。每次均統攬黨政軍的大權。民十二由滬重返廣州主持討陳軍事，因各將領之推戴，又暫就陸海空軍大元帥職。這可見在戰時政治與軍事一元化的必要性。國父正像英國克倫威爾，德國腓特烈，法國拿破崙，他們都是一樣統攬着政治指導與軍事指揮的大權。可是國父是以貫徹護法，實現國家統一及完成國民革命爲職志的，自然不能偏促于南方一隅，亟宜興師北向，剷除北洋軍閥。因此國父先後在廣州發動了兩次北伐，第一次在民十一年：

國父於民十以兩廣底定，乃親至桂林，整理軍隊，準備十一年春督師由桂取道湖南，大舉討伐非法總統徐世昌及直系軍閥。不料，北伐軍於十一年初陸續出發到達湖南邊境時，陳炯明竟在後方勾結直系軍閥吳佩孚，不獨斷絕北伐餉械的接濟，且從而阻撓北伐軍的前進。國父不得已，遂由桂班師返粵，罷免陳炯明職務，改道江西北伐，於是年五月六日親臨韶關督師。這次的作戰計劃：第一期奪取贛州，第二期奪取南昌九江。義師所指，節節勝利，經將贛州克復，北伐軍前

到吉安泰和，但又因陳炯明在後方搗亂，嗾使部下圍攻總統府，只得回師靖亂了。第二次在民十三年：國父以曹錕、吳佩孚朋比爲奸，毀法禍國，遂於九月率師重游韶關，發表宣言，檄告天下，名正言順，聲威大震。旋以曹錕倒塌，及北方國民軍領袖諸同志紛電入京共商國是，國父應召辭粵北上，改用和平方法解決一切糾紛，北伐於焉中止。

國父於討賊各役中，以指揮討伐陳逆之役，其沉着大胆，堅剛果斷及機智，比之中外古今的名將，毫無遜色，洵爲我國今後將校的楷模。却說 國父因陳炯明的阻撓北伐，由桂返粵，

乃免其粵軍總司令及省長兼內務總長等職，但念其前勞，冀其悔過自新，仍留陸軍總長之任，旋爲便利北伐起見，復畀以辦理兩廣軍務。而陳却冥頑不靈，竟愈演愈兇，于民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派使部下葉舉圍攻總統府，欲置 國父於死地，實現其獨霸廣東地盤的陰謀， 國父當時接得謀害的密報，在叛軍的刀光劍影中，從容不迫選入楚豫艦，轉登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以留紀念），便造成「廣州蒙難」的一幕，這和「倫敦蒙難」的一幕，同樣的悲壯險絕，成爲中國革命史上的兩大奇蹟。

國父登艦後，即召集各艦長商議應變戡亂的策略。這一役就海軍作戰上說：假如海軍力量強大的話，就應俾陸戰隊單獨登陸，佔領據點，進擊敵軍；反之海軍力量薄弱，不能單獨登陸作戰的話，就應發揮炮火協同陸上部隊，夾擊敵軍。 國父當時因海軍陸戰隊，爲數很少，只得採取

後一策略，一面令衛戍總司令魏邦平率所部集中大沙頭，策應海軍進攻陸上叛軍，一面親率座艦永豐及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豐等艦，于十七日由黃埔出動，經車歪砲台駛至白鵝潭，砲擊大沙頭、白雲山、沙河、觀音山等處叛軍，各彈多中標的，叛軍聞聲落胆，紛紛棄械逃遁，傷亡於砲火之下者達數百人。惟因陸上部隊，未能如期發動策應，砲擊之後，叛軍仍得散而復聚，其亂雖未獲平，已足表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在」（見致本黨同志書）。

國父見情況如此，遂率各艦駛回黃埔鎮守，這時各艦艦長均主張艦隊移往西江。國父却認為只有襲取車歪砲台，駛進白鵝潭，等候北伐軍回師夾擊，較為得計，遂於七月十日又親率座艦及楚豫、豫章、寶玉、寶豐等艦，從海心岡駛往三江口，向車歪砲台轟擊，叛軍亦發砲還擊，一時砲聲震天，雙方均有損失。各艦艦長看見叛軍砲火佔優勢，畏縮不敢前進，國父以身作則，令座艦駛於前頭，一致攻擊前進。而叛軍在該砲台兩岸佈置野炮有二營之多，一見艦隊駛近，便構成交叉火網，實施封鎖射擊，熾滅射擊，彈如雨下，各艦均受微傷，座艦却連中六彈，官兵死傷十餘人。國父一面指揮各艦作戰，一面親書船內，雍容鎮定，大有古代儒將之風。正如國父致本黨同志書說：「此役也，以兵艦數艘，處叛軍四集環攻之中，不惟不退，且能進至省河，以備叛軍之阻，而壯義士之氣，中外觀聽，亦為之聳動」。國父在白鵝潭，一直支持到八月九日，見李烈鈞許崇智等北伐軍回師討逆的失利，認為孤守省河，于事無濟，方離粵赴滬，再圖討伐。

。于此，值得大書特書的，當座艦密碇白鵝潭時，陳逆會運動海軍叛變，以威脅 國父，施放水雷魚雷，以謀害 國父，派遣飛機，盤旋於座艦之上，以恐嚇 國父，又用民船銅板小輪及敢死隊，圍襲國父座艦。這時全體官兵均驚惶失色， 國父却屹然不動。這是由於秉持「寧為玉碎，勿為瓦全」，「總統為民國而死，分所應酬」，「我輩既為國犧牲，當置死生於度外，方寸既定，逆軍其如予何」(註六)的偉大精神所致。這種精神，正和英國海將納爾遜於伐拉加的大海戰中，身為敵彈所傷，尤負傷指揮，直至絕命的為己的精神，先後輝映。

讀我於此補述 國父對於海軍的研究吧： 國父對於往昔水戰上所謂「風沙水線」的知識，無不通曉(註六)。對於英美各國出版的海軍名著，亦無所不讀。據說：每年定有英國海軍年鑑，常置案上，以供參考，並屢對同志詳論海軍在國防上的重要性(註七)。像在這一役中，當肇和、海深、海圻三大艦為陳逆運動，駛離黃埔時，叛軍以為這三大艦他移之後，則 國父所停在黃埔各小艦，均在魚珠砲台監視之下，並以為黃埔後方的海心崗，平日水深只有六尺，各艦必不能通過，那麼，勢不為魚珠砲台所轟燬，亦必為其所封鎖，任憑為所欲為。却不知道 國父對於海圖，瞭如指掌，他為應付這個突變，派員往測量，該處河水的深度，一聽得水深達十五呎的報告，私心大喜，嘆為果不出所料，當即督率各艦從黃埔上游，經海心崗駛出三河口，繞道駛往新造村附近，弄得叛軍無所售其奸。這一個斷然的處置，使全體海軍將士，為之心折。就是叛軍

方面，也深驚其神算。至對各艦艦長主張艦隊不可移至西江，列舉五大理由說：「（一）以兩江水淺，如各艦移至西江，僅留三大艦在黃埔，則海軍以勢分而力弱，大艦或僅逆軍所買，則將來更難取勝。（二）以大本營一離黃埔，則長洲要塞必失，廣州附近水陸形勢，盡入逆軍範圍之中，牽制更難，賊謀必張。（三）以總統移駐西江，其地面較廣，活動雖易，然黃埔為廣州咽喉，且有長洲要塞，其地點重要，非西江可比。且總統駐於黃埔，廣州雖失，猶易恢復，威望仍在，如移西江，地勢偏僻，無以繫中外之望。（四）海軍如往西江，重來省河較難，如北伐軍回粵，不能奏水陸夾攻之效。（五）移駐西江，而棄長洲天然之要塞，另謀陸上根據地，能否佔領，尚不可知。且西江各部陸軍，隱匿不明，能否為吾所用，尚未可必。如果陸上毫無根據，陸軍又不奉命，則海軍勢絀，可立而待。有此五害，故動不如靜，堅持北伐軍運來，以備水陸夾攻省城，則賊亡有日也。」又說「各艦由此出動西江，經過牛山，魚珠之叛軍砲台，又有三大艦已在沙路港口，監視我各艦行動，叛軍砲台或可鼓勇衝過，而沙路港口之三艦，監視嚴密，其妨礙我行動，阻止我通過無疑。故我艦隊此時惟有襲取車至砲台，駛入省城之一策，其餘皆非計也」（註八）。

這真是一個英明的指示及決策。又，于民十三致蔣介石先生的親筆信說：「聞仲愷說：械船到時，擬在金星門內起卸，以避耳目，我以為不必如此，若為避人耳目計，則金星門大大不相宜。因金星門之對面，即伶仃關，該關有望樓，有緝艇，凡到金星門附近之船，無不一目了然，

實在不能避，而以露我欲規避之心，示人以弱，恐反招英艦之干涉，因英艦已視此等海面爲其範圍，此一不可也。且金星門外，年年淤淺，此時之水路，當較數年前海圖必差數尺，恐致擱淺，此二不可也。又在該處搬運，實花費太多，又恐小艇有遇風雨盜賊之危險，此三不可也。究不知直來黃埔，公然起叫爲妙」。據說依此而行，果得安然起叫，足見國父的熟悉海上形勢。在民權主義上說：「好像外國的舊兵艦，從前如果是裝了十二門大砲，便分成六個砲台，要瞄準放炮，打甚麼敵人，都是由許多炮手去分別執行，做指揮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現在新兵艦，要測量敵人的遠近，在桅頂便有測量機，要瞄準放炮，在指揮官的房中，便有電機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敵人，不必要許多炮手去瞄準放炮，只要做指揮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測量機的報告，按距離的遠近，撥動電機。要用那一門炮，打那一方的敵人，或者是裝十二門砲，同時瞄準，同時放炮，都可以如願，都可以命中，像這種海軍砲的使用，是叫做直接管理」。足見國父對於海軍砲兵戰術亦有研究，此外國父對於古代水戰亦很注意。他在國民要以人格救國的演講詞上說：「從前莊子說：『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滌爲事，客聞之，請置其方百金，聚族而謀之曰：我世世爲泝滌，不過數百金，今一朝而醫技百金，請與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則與越人水戰，大破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滌，則所用之異也』。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保護手在冬天不至破裂的那種藥，宋人用之不適當，

世世僅供漂布後塗手之用，吳人用之適當，便供水兵冬天耐戰之用，而得一國」。

前面說過 國父因討逆未果，乃離粵赴滬。可是 國父於到滬之後，依然籌劃討陳事宜，不數月（十一年底），陳逆便爲滇桂各軍圍逐出廣州了。各將領見粵局稍定，即電迎 國父於十二年二月重返廣州主持大計，惟此時陳逆仍盤據于惠州， 國父認爲「孔明欲出中原，先擒孟獲，吾欲出長江，非先滅陳不可」（註九）。乃於是年夏季，親自督師東征。其經過情形有如下述：

「國父爲剷除陳逆炯明以除後患，乃決計親征，設大本營於石龍。於八月廿三日乘大南洋輪船爲座駕，十二時向東江進發，下午九時，抵達石龍。時天氣奇熱，船復湫隘，所處之室，僅容一席，而 國父居之泰然，接圖握管，決策定計，晝夜不少息。及至許崇智由博羅來謁，請示機宜，並謂逆軍分三路來襲，李易幟已抵距此二十里之湯村，敵將接近，不意帥座冒險來此也。時滇桂各軍，已與陳逆激戰數日，迄未得勝。廿五日，博羅方面，又告失敗，林某即率逆軍向石龍進犯。廿六日，博羅飛鵬嶺失守，逆軍佔鉤鼓嶺一帶等處， 國父乃命飛機出發博羅，使守城者知有援應，並親函許崇智堅守，更命差艦載糧貫湖前進，以資接濟。又電廣州促援軍，急速來援，羽檄如雪片，而軍行轉緩，蓋廣州滇軍待餉乃發，不問博羅被圍之急與不急也。因之博羅之圍，終不得解。廿七日，情勢益惡，及至深夜，尚不見援軍之至， 國父乃遣古應芬回省，嚴促滇軍福軍與吳鐵城所部開進。

李福林即率所部偕朱培德赴前方，同時吳鐵城部亦開抵增城。廿九日，國父由石龍向博羅前進，從禮村至蘇村，沿途風雨急驟，船阻難行，甚至李福林、吳鐵城兩部負偵察任務之騎兵，均不得濕。而座駕舟小，顛簸動盪，勢頗危險，然國父正襟危坐，策畫軍事，並以民元以前之革命史，昭示同行官佐，而披閱圖籍，未嘗一日輟也。卅一日，國父由鐵岡泊池地抵松村，時博羅被圍已久，守將劉震寰拼死堅持，城下水漲，逆軍不得近，僅以砲遠擊而已。適譚延闓入湘之軍，由敗轉勝，捷報傳來，國父喜形於色，乃命各軍攻擊前進。九月一日，座船至第七礮，命福軍滇軍登山警戒，並飭副官於山巔燃火爲號，使城內知主帥親自來援。次日，國父親登北嶺，舉凡偵查敵情，考察地勢，悉自爲之，於致胡漢民書會云：「吾今日兼辦一排長之職務矣」。惟其時，滇軍大部份尙未集中，且驕不受命，國父不得已，重返石龍督促，雖許滇軍祿國藩以重賞，而無效果，悍將驕兵，殊可恨也。三日，東路軍所屬師長張民達，與逆軍戰於淡水，大破之。四日，張至石龍捷報請調，國父命福軍滇軍分左右翼進攻，滇軍第四次要挾軍餉未得，全部引退，止之無效。五日，得南本路鄧殷攻陷北海訊，國父命永豐艦往援。七日，許崇智決突圍，但以援軍不克，早八時，福軍與逆軍大部接觸，滇軍田中毅，粵軍張發奎等部，登艦拍翼佈陣。國父親自登山督戰，左翼福軍，初猶小勝，及逆軍大部衝進，福軍退去，逆乃乘勢

闖進，沿義和墟而蘇村，欲斷福馮軍之歸路。是夜，退至石龍。八日，軍進蘇村，張部等會同福軍，進攻義和墟之逆，破之。九日，國父由雄鷄拍翼至譚公廟，率屬登山督戰，各軍奮勇分途追擊，鏖戰甚烈，自朝至午，進退數次，雙方均有死傷。十日，博羅守軍楊廷培，突圍佔銅鼓嶺，逆軍死傷枕藉，向派尾噴水退却，博羅羅之圍，乃得以解。國父進城撫慰。見楊部死傷太重，令獎萬元，調回廣州休養。國父即乘艦赴梅湖視察重砲兵陣地，以備進攻惠州。博羅之圍解後，國父命福軍及張部等分途追擊，十一日，克平山。十二日，命飛機隊往惠州城投彈。十三日，國父入梅湖，親發重砲（由虎門運往之十五生的要塞砲）五彈，轟擊陳逆所盤據之惠州城。次日返廣州，得增城報捷訊。十八日，國父復至前方。二十日，至飛鵝嶺等攻惠州，上午十一時至砲兵陣地，被逆軍發見，敵即發砲不斷向國父射擊，彈落身旁，距不尋丈，從者多爲國父危，而國父但諒以無恐，並謂敵砲射程已止於此，縱密發，必不及。此種大無畏精神，與料敵之準確，軍事專家嘆爲罕見。旋以事返梅湖，留程潛等禦敵，行至中途，忽聞爆炸聲甚烈，後知白沙堆所泊電船自炸，飛機隊長楊仙逸，長洲要塞司令蘇從山，魚雷局長謝銜良皆遇難。廿一日，復至梅湖重砲陣地親發六彈攻惠城。次日復攻，雖不破敵，逆順已蹙。廿三日午，合各軍並進，作衝鋒之搏擊，戰至廿四日拂曉，以魚雷炸城基，飛機擲炸彈，亦不克。午後，逆軍

反攻死亡過鉅，不支而退。十月卅一日，兩軍相戰，互有勝負，劉震寰於是日退出飛鵬嶺。十一月六日，國父恐博羅失守，重行出發親征，激戰之餘，雖告勝利，而萬城仍然在逆軍之手。八日，逆軍傾巢而出，各軍均受挫。九日，國父急懸重賞，嚴督反攻，無如各軍各顧地盤，不肯力戰。十一日移大本營於石灘車站。十二日，逆軍迫近石灘，被滇軍擊退，旋聞茶蘭，鉄埔方面戰急，討逆軍不支，國父即令新到之李根澗部沿廣九路前進，不移時，聞戰大敗，潰兵沿鐵路紛奔，訛言四起。國父即率古應芬李烈鈞等急下車制止，以圖反攻。不料潰兵多不從命，向後紛退，車遂倒行，侍從秘書副官黃禹龍等乃強國父上車，旋改登機車，直開廣州，而李烈鈞等已不及趕上，特另乘車到石灘佈防。時逆軍乘勢尾追，幾及石灘。然而范石生一聞敗耗，不待炊畢，急奔赴救，大破之於石灘以東，逐逆軍洪兆麟部於石龍，逆軍之勢乃稍戢，事後各路逆軍復以重兵自廣九路圍迫廣州，廣州形勢危急，不堪言狀，國父仍本其大無畏之精神，堅持一兵一槍之奮鬥，又急電湘軍豫軍馳援，豫軍樊鍾秀部日夜兼程趕到廣州，徒步出擊破之，廣州賴以保全。是役也，國父之危，不減於白鵝潭之役，而堅剛勇邁之氣，視白鵝潭之役殆尤過之，從其役者，談及此番戰事，莫不神往」。（註十）

以上記載，是很簡畧。雖說戰鬥以殲滅敵人戰鬥力，迅速獲取勝利爲目的，國父在這一役

中，以八十餘天的短期間，因陳逆憑據惠州的天險，及我方雜牌軍隊未能用命，致不克將其包圍殲滅，却給予重大的消耗，並摧毀其鬥志，尤以國父親臨前線督戰的精神，足以感召我全體革命將士，造成他日東江大捷的因素。就通例說，國父以大元帥的地位，五十有九的高齡，對於討賊軍事，本應坐鎮後方的廣州，通用電話電報來指揮，他却顧一切險阻，毅然挺身到前線去，如設大本營于石龍，親到砲兵陣地發砲轟擊陳逆，及敵砲對他射擊，彈落身傍，而不退避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實與拿破崙於普法戰爭中——率旗前進的精神，同出一轍。

于此，尚有兩點，值得略述如下：

一是地圖圖籍：我們知道，不能判讀地圖，固然不配做指揮官，而地圖又常為指揮官的必携品，指揮官不能拋棄地圖而指揮作戰，正如航海者不能拋棄羅盤針而航海。否則，在戰場上就要變成瞎子，既不辨東西南北，也不辨地形地勢，固不會適切地運用戰畧戰術，更無從判斷敵軍的企圖、位置與配備。據說：國父對於軍用地圖很重視，在這次東征中，常吩咐參謀秘書或親自携帶地圖，到野外時，平鋪地上，站着用手杖指點判讀，並指示部屬。在軍營中，懸掛壁上，或平置桌上，用紅藍鉛筆劃出記號，以為指揮作戰的根據。登山視察地形時，用望遠鏡瞭望之後，又對照地圖，判別有否差誤。對於圖上所示路程的遠近，山川的高低廣狹，都能迅速計算出來。對於地圖上很小地點的名稱，亦能記得清清楚楚（詳十一）。至在督戰時，一有餘暇，定必手不釋

卷，一種好學的精神，真爲常人望塵莫及。考拿翁的作戰，他不論自己所担任職務怎樣的重大，凡關於豫定戰地，必先在歷史上和地圖上仔細研究，並自行嚴密整理各種地圖，出發時，在籠駒的革囊中常攜帶必要的地圖和書籍。前面說過，國父精通拿翁騎畧，那麼于此也許受到拿翁的影響吧！

二是使用空軍作戰：空軍的大量使用於戰場上是開始於上次歐洲大戰。從此，戰爭的形態，便由平面變爲立體，空軍在現代戰爭上幾取陸海軍的地位而代之，沒有擁擠大量的空軍。而被迫參加現代新型的戰爭，其吃虧將不堪設想。國父在中國對空軍的認識，實爲第一人，民元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時，已設立航空隊，民六致南洋同志書說：「飛機爲近世軍用之最大利器，並鼓勵同志學習飛行，派遣同志到外國學習航空，提倡「航空救國」及設置航政局於廣州大沙頭。他說過：「像飛機不是一次做成了便可以飛的，是經過許多次的改良，才完全成功。……像大沙頭的那般青年飛機師，從前不知道怎樣飛，但是請外國的技師來教，所以學到現在，便飛得很好」（見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軍事奮鬥演說詞）。國父在這次東社中，爲導致戰局於有利的形勢，曾派空軍到前方助戰，雖說當時所擁有的軍用機連練習機僅有十餘架，未能實行「杜黑主義」，使用強大的空軍，一鳴而殲滅逆軍，並且當時機上所裝置的機關槍，係步兵使用的手機關槍，所投擲的炸彈，係改裝的水雷或迫擊砲彈，一切都是很幼稚的（計

十二），但于此却可以看到 國父已拋棄陳舊的平面戰爭的觀念，踏上嶄新的立體戰爭的大道了。于此應附帶一說的，就是 國父也從事于現代機械化部隊的建設了。機械化部隊是以戰車爲主體，具有優越的運動力、攻擊力與防禦力，而這號稱爲「地上雄獅」的戰車，係出現於上次歐戰，並在戰場上表演了驚人的奇蹟。自此以後，各國競相建立機械化部隊，加以英國機械化部隊理論家富勒將軍的鼓吹，更使機械化部隊的建設與空軍的擴張，俱成爲今日世界軍事的兩大主流。國父對於上次歐戰很有研究，對於歐美鼓吹建設機械化部隊的理論，也必受其洗禮，所以在當時物質條件的限制之下，仍勉力設置一個「甲車隊」，設計者爲擅長甲車戰術的蘇聯顧問李際將軍，雖說這個甲車隊亦同飛機隊一樣的幼稚，使用于鐵路上的改裝鋼甲火車（據說使用于廣九、廣三、粵漢鐵路路上收效頗大），使用于公路馬路上的改裝鐵甲汽車，爲數無幾，及所有的坦克兩輛正在製造試驗中（註十三），但此舉却開了中國機械化部隊建設的先河。我們今後的建軍，應澈底地接受 國父這兩個偉大的遺規吧！

最後還有：一是 國父於同盟會時代的一九〇五年，親自擬定軍事規章有：「軍政府與各處民軍關係條例」、「軍隊之編制」、「將官之等級」、「軍餉」、「戰士賞恤」、「軍律」、「招軍章程」、「畧地規則」和「因糧規則」等。於中華革命黨時代的一九一四年，又親自擬定有：「中華革命黨革命方略」、「內分「軍政」、「軍政府」、「服制勳記」、「軍律軍法」、「因糧徵

發及其他則例」等編，其中大部份亦屬於軍事規章，從這些規章看來，非對於兵學及軍事法規素有研究，焉克臻此。其次是，國父鑒於歷次革命的失敗及蘇聯創設紅軍的成績，認為今後欲掃除國內反革命勢力，尤其為鞏固中國國防及對外打倒帝國主義計，決不是利用烏合之眾的民軍，可以成事，因為他們沒有經過嚴密的訓練，缺乏戰鬥的能力，也不是利用軍閥的武力，可以有濟，因軍閥以爭權奪利為目的，不聽命令，不守紀律，隨時可以幹起反革命的勾當來，像陳炯明、陸榮廷、沈鴻英之流，何莫非一度投機參加革命，但終變與革命為敵的反動軍閥，所以非從新建設強大的革命武力不可。為此必須養成大批新革命幹部，這便是國父設立黃埔軍官學校（原名「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原因。國父為設立這間軍官學校，於民十三年派蔣中正、廖仲凱兩先生負責籌備，旋任蔣氏為校長，廖氏為黨代表。開學之日，國父親臨致訓，囑勉全體學生以「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從此積極訓練，一面授以軍事學術，一面加以政治訓練，果然源源養成無數新革命幹部，奠定黨軍的基礎，這真是中國現代建軍上的偉績。

西人論將帥的條件：一曰無畏的大勇，二曰創造的智慧，三曰強健的體魄。德國名將魯登道夫氏也說過：「主帥的地位，應為第一等艱辛，第一等天才，第一等堅強意志」，國父實足以當之而無愧。國父確是中國現代一個智仁勇兼全之天才的大軍事家。

(註一) 據馮自由先生「民國卅年七月由渝給我的信」。

(註二) 據胡毅生先生口述。

(註三) 及(註六)，及(註十二)(註十二) 據李仙根先生口述。

(註三) 據胡毅生先生(是役參加者)口述。修正坊本記述寫成。

(註四) 據張文先生口述。

(註五) 及(註八) 見蔣介石先生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國父語。

(註七) 據張溥泉先生口述。

(註九) 見鄒海濱先生編著：「中國國民黨史稿」(商務版)，國父語。

(註十) 參照胡去非先生編纂：「總理事略」第十一章六十節寫成，并承參與是役者兩位老同志校正。因該文據古應芬著：「孫大元帥東征日記」寫成，而古著與事實略有出入。

(註十三) 據趙超先生口述。

參考書：馮自由先生「革命逸史」(商務版)，陸達節先生輯：「孫中山先生外集」(中華版)，中宣部編：「國父孫先生年譜」等。

二·戰爭思想

思想是行動的指針，是力量的根源。一種戰爭必有一種戰爭的思想。德國兵學大師克勞塞維茲說：「戰爭起於戰事爆發時所存在之各種思想觀念等關係，復因此等關係，而使戰爭有種種形態了。」

中國過去的歷史是戰爭起伏的歷史，今後的歷史，當然也免不掉戰爭的發生，但今後的戰爭思想，是不容再有所紛歧或錯誤了：分歧則力量分散，難期勝利，錯誤則輕舉妄動，禍國殃民。所以必須建立一種正確的戰爭思想，以爲今後戰爭行動的南針，實爲先知先覺者的重大使命。

過去的戰爭思想，姑且勿提。現在世界的戰爭思想，可以分爲三大體系：一是社會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一是民主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一是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前者以蘇聯爲代表，次者以英美爲代表，後者以德意日爲代表。現在他們正在本着這種戰爭思想或戰爭哲學，而進行着戰爭。

戰 爭 思 想

可是，在我國今後應建立怎樣的戰爭思想呢？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當然我們不能向上述各

國去移植，也不能關在房子裏來憑空捏造。更不必在我國古兵書及其他經典裏來兜圈子。我們知道：戰爭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反映，德國的戰爭思想是德國政治思想的反映，英國的戰爭思想是英國政治思想的反映，蘇聯的戰爭思想是蘇聯政治的思想反映，現在我國的政治思想是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自然我們的戰爭思想，也是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所以我們爲建立中國今後的戰爭思想，就要從三民主義中（國父全部遺教俱可歸結于三民主義）去發掘和建立。其實 國父早已爲我們建立了基礎了。

克勞塞維慈氏關於戰爭的定義說：「戰爭的基本要素，是兩人以上之間的鬥爭，即決鬥，戰爭不外是決鬥的擴大」。跟着附結說：「戰爭是用暴力行爲屈服敵人，實現我的意志」。國父對於戰爭這個術語，雖然沒有下過一個完整的定義，但在昆樞主義裏却說過：「一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克氏又說：「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的行動，實爲一種政治的手段，政治上對外關係的一種繼續，而以其他手段（暴力行爲——浴日誅）實行之」。國父亦認戰爭屬於政治的形態說：「政治的源陸軍力」，跟着又說：「應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怎樣說兵力一朝可以亡國呢？拿歷史來證明：從前宋朝怎樣亡國呢？是由於崖門一戰，便亡於元朝。明朝怎樣亡國呢？是由於松州一戰，便亡於清朝，拿外國來看：華鐵路一戰，拿破崙第一之帝國便亡，斯丹一戰，拿破崙第三之

帝國便亡」(民族主義)。所以我想 國父一定讀到克氏「戰爭論」而受其影響的。於此，我們再舉出一些例證來。克氏說：「凡爲指揮一種戰爭或一幕戰役的重大活動，而取得光榮的勝利，非具有政治上的特別高見不可，所以戰爭與政治是一致，將帥也是政治家」。民權主義裏說：「如果軍人說不干涉政治，還可以講得通，但說不懂政治，便講不通了。因爲政治的原動力便在軍人，所以軍人當然要懂政治，要明白什麼是政治」。在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的演講詞上說：「管理衆人的事，就是政治，換言之，管理衆人的事，就是管理國家的事。這個道理，許多軍人多不明白；譬如這次北方發生事變，(指民十三馮玉祥、胡景翼、張作霖等推倒軍閥曹錕和吳佩孚——浴日註)，本是少數軍人的舉動，這件事變，本來就是革命，他們發動了革命，就是發生了政治變動。……現在北京有政治原動力的軍人，已發生了政治變動，尙且說不懂政治，這好比是磨打自己發生了電力之後，不知道用處，當然是有極大的危險。至於有大原動力的軍人，日日在政治範圍中活動，而沒有政治意識，那種對於衆人的危險，比較磨打當然是更大，又更厲害。大家現在如果還不明白這個道理，可以讀我的民權主義，便能够了解」。克氏「戰爭論」是世界軍事名著，也是一種戰爭哲學的書，不特軍人應該讀它，卽一般思想家亦應人手一卷。它是政治家、外交家、顧問及一切與政務有關者的枕中秘本。誠以 國父的「好學」與「博學」，尤以指導戰爭的需要，自不會不知道這部名著，又不會不加以深刻研究，雖說目前未找到

更確鑿的證據，但在上面言論的對照上已可以辨別其異同了。但國父與克氏亦有不同之處，就是國父不是克氏「絕對戰爭」的論者，而是「相對戰爭」的論者。他一面反對「野蠻」與「弱肉強食」的侵略戰爭，另一面却主張「以戰止戰」及「爲人類作干城，爲進化除障礙」的革命戰爭（見國父爲「戰爭入門」一書所撰的序文。下面的論述，亦爲相對戰爭論的註明），可見他的戰爭根本思想，比克氏來得正確和偉大。

其次，國父對於戰爭發生的見解，不是看做偶然的現象，也不是看做經常的現象。他認爲有國家即有戰爭，戰爭是國家間不可避免的現象。中國存亡問題一文說：「論國家之起源，大概以侵畧人之目的，或以避免人侵畧之目的而爲結合，其侵畧人固爲戰爭，即欲避人侵畧亦不能避免戰爭」。他又認爲在革命過程中，戰爭亦爲不可避免的現象，誠以革命是最艱巨的事業，或從事於統治者的推翻，或從事於侵畧者的打倒，唯有訴諸流血的戰爭，決不是採取溫和的手段所可奏效。故國父當革命之始，即揭發「驅除韃虜」的綱領，又確定「軍政時期」，爲革命建設步驟的第一個時期，換言之，就是戰爭時期。建國大綱宣言上說：「夫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行，必有其方法與步驟。三民主義能否影響於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與否，端在其實行之方法與步驟如何。文有見於此，故於辛亥革命以前，一方面提倡三民主義，一方面規

定實行主義之方法與步驟，分革命建設為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期於循序漸進，以完成革命之工作——蓋不經軍政時代，則及革命之勢力無由掃蕩，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傳於群眾，以得其同情與信仰——前者之大禍，在革命破壞不能徹底」。可是根據國父最高的理想，戰爭這個東西並不是永遠不會消滅的，却有待於「大同世界」的實現。

如今我說到國父戰爭思想的特質了。他的戰爭思想，既和民主法西的戰爭思想不同，也和社會主義的戰爭思想有異。從另一方面看它更，不同於神秘派生物社會學派及實証進化論者的戰爭思想。他的戰爭思想是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已如前述，現我再來給它指出下面的五大特質：

一、爲生存而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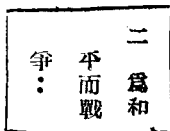
這可以說是國父戰爭思想的核心。國父的哲學，是民生哲學，說社會的進化以民生爲重心，亦即以人類求生存爲原動力，在社會和歷史中，一切都可以以人類求生存去說明，自然戰爭亦不能例外。可是國父民生哲學的論據是怎樣呢？民生主義說：「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又說：

戰 爭 思 想

「社會問題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又以人類生存問題爲重心，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再說：「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再又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什麼爲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爲

戰 爭 思 想

中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誠以戰爭是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也是人類最重要的活動，當以求生存爲重心，唯有全社會人類爲求生存而戰爭，才是革命的戰爭，否則就是掠奪或侵略的戰爭。其次，民權義說：「人類如能够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够生存……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奮鬥發展達于極點使成爲戰爭或戰鬥——谷日計）。又 國父於民國元年解職後，在香港與西報記者談話說：「惟吾意中國無侵略志，因吾人志尚和平，吾人之所以要水陸大軍者，只爲自保（即求生存——谷日計），而非攻人」。由此可見 國父的戰爭思想是以民族的生存爲核心，更昭然若揭。他發動推翻滿清，是爲求中華民族的生存，他主張抵抗帝俄，也是爲求中華民族的生存，他屢次興師討賊，也是爲求中華民族的生存。至于我們此次對倭抗戰，也是繼承 國父的遺志，爲求中華民族的生存。本來魯登道夫將軍在「全體戰爭」一書上，也是主張爲戰爭而生存的，他說：「全體性戰爭之目的，在于民族生存之維持」，實則僅爲求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在大日耳曼民族求生存的大前提之下，他可以犧牲別個民族的生存，即他只要自己民族的生存，不要別個民族的生存。我 國父則比他正確進步得多，既要自己民族的生存，同樣也要別個民族的生存，而且要扶助別個民族的生存，正如民族主義說：「濟弱扶傾」。



和平與戰爭是相反的現象，也是相成的現象，故主張和平不能反對戰爭，主張戰爭也不能反對和平。今後的戰爭，應爲和平而戰爭，即爲打破一切不平的現象，使歸於平，消除一切不平的原因，使歸於和。這便是 國父爲和平而戰爭的思想。實業計劃上說：「中華民國之創造，其目的爲和平」。這是說爲打破滿

清對我漢族的不和不平，才發動推翻滿清的戰爭，依於戰爭的勝利，而創造中華民國，即創造新的和平。尤值得注意的，國父的發動戰爭都是出於不得已而在和平絕望之後，民元就臨時大總統告各友邦書說：「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於天性，非出於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啓爭端。故自滿清盜竊中國，於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開虐政，罄竹難書。吾民族唯有隱忍受之，如倒懸之待解，求自由而企進步，亦常爲改革之要求。而終勉求所以和平解決之道，初不欲見諸流血之慘也。塵起屢戩，卒難達吾人之目的，至於今日，實忍無能忍。吾人鑒於天賦人權之萬難放棄，神聖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武力，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於萬重羈轡」。大亞洲主義演講詞上說：「請歐洲人之在亞洲者，俱以和平方法，退還亞洲人之權利，如果不能達到目的，便當訴諸武力」。且常贊揚中國人素愛和平的天性說：「中國人民本甚和平，現在世界上，立國百有數十，雄強相處，難保不有戰爭發生，惟中國數千年來，卻知和平爲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種思想，故數千年來之中國，純向和平以進行，中華民國有此民數，有此民習，何難登世界舞台

之上，與各國交際，共謀世界之和平，此種和平運動，即中華民國國民之天職（見民一四月一日在南京參議院解職辭）。又說：「中國更有了一種極好的道體，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民族，只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來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方主強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盛頓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人共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脫不嗜殺人者能」之，和外國人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好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更從歷史上證明說：「羅馬不過與中國的漢朝同時，那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思想便甚高深，一般大言論家都極力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字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棄珠崖之議，此項文章就是反對中國去擴充領土，不可與南方蠻夷爭地方。由此便可見在漢朝的時候，中國便不主張與外人戰爭，中國的和平思想到漢朝時已經是很充分的了。到了宋朝，中國不但去侵畧外人，反為外人所侵畧，所以宋朝被蒙古所滅。宋亡之後，到明朝才復國，明朝復國之後，更是不侵畧外人。當時南洋各小國要來進貢歸化中國，是他們仰慕中國的

文化，自己願意來歸順的，不是中國以武力去壓迫他們的。（見民族主義）。到了民十四逝世的彌留時對同志說：「余此次放棄兩廣北上，實為和平統一而來」，又反復斷續的說：「和平！奮鬥！救中國！」益見 國父愛好和平的精神，他這種愛好和平精神，是貫通着他整個的戰爭思想。并可見他是反對動輒以干戈相見的讀武主義者，是反對惟恐天下不亂因擊人國的侵畧主義者。至於這次日本軍閥的進攻我國，就是破壞中國的和平，世界的和平。我們答復以全民抗戰，也是為維持中國與世界的和平，同時也是發揚 國父倡導和平的偉大精神。

三、爲劃除障礙而戰爭

國民革命的障礙有三：一曰專制皇帝，一曰封建軍閥，一曰帝國主義，這三大障礙物，如果沒有根本剷除，則國民革命無由成功，三民主義亦無從實現。但欲根本剷除這三大障礙，唯一法門，就是訴諸流血的戰爭。所以 國父當進行推翻滿清之時，無時不倡率起義，採取戰爭手段。見同盟會宣言說：「滿清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見北伐宣言說：「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專制政體暨滿清征服階級，本已得所藉手，以從事于目的之貫徹」。又爲打倒軍閥，便先後實行討袁，北伐及討陳，例如民十三年，大舉北伐，其目的就是爲掃除革命的障礙——曹錕與吳佩孚等。見北伐宣言說：「此戰之目的，不在殺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惡勢力。換言

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據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中國國民黨之最終目的，本於三民主義，本黨之職任，即爲實行主義而奮鬥，敢敢謹告于國民及友軍曰：吾人顛覆北洋軍閥之後，必將要求現時必需之各種具體條件之實現，以爲實行最終目的三民主義之初步。此次爆發之國內戰爭，本黨因反對軍閥而參加之，其職任首在戰勝之後，以革命政府之權力，掃盪反革命之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同時漢帝國主義亦成爲國民革命的障礙，故亦主張打倒帝國主義。見北上宣言說：「國民革命之目的，其內容真如此，廿年來，帝國主義與軍閥互相勾結，以爲其進行之障礙，遂使此等關係民國存亡國民生死之弊案諸端，無由實現。爲謀目的之達到，不得不從事于障礙之掃除，此北伐之舉所以不容也」。又見爲商團事件對外宣言說：「今將開始一新時期，爲努力推翻帝國主義之干涉中國，掃除完成革命之歷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礙」。并在民族主義中極力主張打倒帝國主義，在民權主義中亦極力主張打倒專制皇帝及封建軍閥，因爲帝國主義不打倒則民族主義無由實現，專制皇帝及封建軍閥不倒，則民權主義無由實施，推而至于民生主義亦無由着手，此次我們不惜付最大的犧牲來抵抗日本軍閥的侵略，又加入太平洋戰爭與英、美、荷等同盟國並肩作戰來打倒日本軍閥，其目的就是爲剷除我們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的障礙。

四、爲抵
抗侵略
而戰爭

一國當外患之來，很明顯的，抵抗就是自衛的生路，屈服就是自殺的死路。中國對外向來採取抵抗主義：發軔於開國始祖軒轅黃帝的驅逐蚩尤，發揚於管仲的攘除夷狄，秦始皇的建築長城，漢武帝的驅逐匈奴，晉謝玄的大敗苻堅，唐太宗的討伐突厥，南宋岳飛的抵抗金人，明代戚繼光的剿平倭寇，降及 國父，更把這個主義發揚光大了。

當民國元年，帝俄侵我外蒙古甚急，製造所謂「庫倫獨立」，旋以俄蒙協約，迫我承認，野心勃勃，節節進逼，駭駭乎有囊括我東北各省之勢。這時 國父爲打破這個危機，便以在野之身，堅決地提出對俄抗戰的主張，見錢幣革命一文（發表於民二）說：「今者俄人乘我建設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外蒙古，以常情論之，我萬無能抵抗之理，在俄人固知之素，而審之熟，故甘冒不韙行之。我國人皆知蒙古亡，與其不抗俄屈辱亡，孰若抗俄而爲壯烈之亡」。跟着說：「與其俯首聽人之瓜分，何若發奮一戰，以戰強俄，而固我國基於萬代之爲愈也。況當此民氣正盛，國體方新，戰有必勝之道，不戰爲必亡之階，孰利孰害，不待智者之決也。縱以常理論之，今日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屈於霸道強權而亡，不如一殉人道，公理而亡，一戰不獨不亡，而更可揚國光，衛人道，伸公理於世界也」。 國父爲糾正當時北京政府和議派的錯誤主張，在該

文上說：「語曰『能戰而後能和』，惟我今日不能戰，故俄敢公然侵我領土，若徒然與俄交涉，與之言仲裁，悉歸無效」。國父這個偉大的主張，因當時北京軍閥政府採取不抵抗主義，致未實現，遂將外蒙古的主權斷送於俄人了。可見不抵抗主義的危險。又國父于民元解職後，在香港與四報記者談話說：「若果歐人勢逼吾人，則吾人將以武力強國」。并在民族主義上主張採取抵抗主義說：說「中國有些痴心妄想的人，以為列強對於中國的權利，彼此之間，總是要互相忌的，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總是平均，不能統一的，長此以往，中國不必靠自己抵抗，便不至亡國。像這樣專靠別人，不靠自己，豈不是望天打卦嗎？」又說：「救中國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已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宗族的團體來顧國家，便有辦法，無論對那一國，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這種方法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抗，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二是消極的，致滅亡」。再說：「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列強要抵抗他」。此外在建國大綱上亦規定有「對於國外侵畧強權，政府當抵禦之」的條文。這是更進一步確定抵抗侵畧為國策的，不待說，今日我們的對倭抗戰，就是實踐國父先前所豫定的抵抗主義和國策。

五、爲人
類打不
平而戰
爭：

二十世紀的世界是一個極端不平等的世界：一面是壓迫者，另一面是被壓迫者，一面是侵畧者，另一面是被侵畧者，但兩者人數的比較，處於壓迫侵畧地位的帝國主義者佔很少數，而陷於被壓迫被侵畧的弱小民族却佔大多數，以大多數人而被很少數的強者所宰割和蹂躪，天地間不平之事，孰甚於此！故 國父主

張於完成民族主義之後，便要發動爲世界弱小民族打不平而戰爭，以期造成大同世界。民族主義說：「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我們要能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就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打破強權」。又說：「世界上的十五萬萬人之中，頂強盛的是歐洲和美洲的四萬萬白種人，白種人。以此爲本位，去吞滅別色人種，如美洲的紅番已經消滅，非洲的黑人，不久就要消滅，印度的棕色人已在消滅之中，亞洲黃色人現正受白種人的壓迫，不久或要消滅，但是俄國革命成功，他們一萬萬五千的萬人，脫離了白種，不贊成白人的侵畧行爲。現在想加入亞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強暴的民族，那摩強暴的民族，只剩下二萬萬五千萬人，還是想用野蠻手段，拿武力去征服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故此後世界人類，要分爲兩方面去決鬥：一方面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方面是二萬萬五千萬人。第二方面的人類雖然很少，但是他們佔了世界上頂強盛的地位，他們的政治力和經濟力很大，總是用這兩種力量去侵畧弱小的民族，如果政治的海陸軍力

所不及，便用經濟力去壓迫。如果經濟力有時而窮，便用政治的海陸軍力去侵畧，他們的政治力幫助經濟力，好比左手幫助右手一樣，把多數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民壓迫得很利害。但是天不從人願，忽然生出了斯拉夫民族一萬萬五千萬人，去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爲世界人類打不平。所以我前次說，有一位俄人說，世界上列強所以誣毀列寧的原因，是因爲他敢說世界多數的民族十二萬萬五千萬人，爲少數的民族二萬萬五千萬人所壓迫。列寧不但是說出這種話，並且還提倡被壓迫的民族去自決，爲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打不平，列強之所以攻擊列寧，是要消滅人類中的先知先覺，爲他們自己求安全。但是現在人類却覺悟了，知道列強所造的謠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們欺騙，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進步到光明地位的情況，我們今日要把中國失了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爲世界上的人類打不平，這才算我們的天職。國父這個崇高偉大的戰爭思想，不獨我們世世子孫應奉爲圭臬，就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及帝國主義國家內的被壓迫階級亦應表示熱烈的同情與擁護。我想：它必有實現的一天。

以上便是 國父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本此而論，自然他是反對軍閥戰爭，反對帝國主義戰爭，關於前者，他說：「軍閥惟知以武力據地盤，以欺詐保權利」（見民十一年覆蕭翼、楊道聲函）。又說：「事實上，不能禁軍閥中之一派不對於他派而施以攻擊，且凡屬軍閥莫不擁有偏備軍隊

，推其結果，不能不出于爭戰，出於搶奪，蓋搶奪於鄰省，較之搶奪於本省爲尤易也」（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關於後者，他說：「國際戰爭者無他，純然一簡直有組織之強大盜行爲耳，故對此種強盜行爲，凡有心人，莫不深疾痛恨之」（見實業計劃）。又說：「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還是不龍消滅帝國主義，因爲當時的戰爭，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仍是一個帝國主義打倒別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關於階級戰爭呢？國父認爲階級戰爭，是歐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產物，在今日的中國則不能發動此種戰爭，他說：「階級戰爭，即工人與資本家之戰爭也。此種之戰爭，現已發動於各工業國家者，極形劇烈。在工人則自以爲得最後之勝利，在資本家則決意以爲最苦之壓迫，故此種戰爭，何時可以終局，如何可以解決，無人敢預言之者。中國因工業進步之遲緩，故就形式上觀之，尙未流入階級戰爭之中。吾國之所謂工人者，通稱爲苦力，而其生活只以手爲飯碗，不論何資本家，若能成一小店予他等以工作者將必歡迎之，況資本家之在中國寥寥若晨星，亦僅於通商口岸耳」（實業計劃）。

此外 國父亦已產生「全民戰爭」（註一）的思想了。現代的戰爭，已由過去的「英雄戰」，「軍隊戰」，「內戰」，進化爲「全民戰爭」。戰時攻擊的對象，不限於軍隊，而是整個民族，從事戰爭也是整個的民族，民族中的每一個份子都要貢獻着他的全力，然後才足以爭勝負。

至於使全民戰爭的發生，爲主的，由于現代新式武器總發明和使用；有了空軍便使戰場擴前，與後方之分，國民無戰鬥員與非戰鬥員之別，敵方的空軍能够隨時侵入轟炸對方國內任何地方，發揮他強大的破壞威力。也能够侵入投擲下巨量的宣傳品，以動搖對方戰勝的信念。尤以降落傘部隊及空輸步兵的出現，更可以突然侵入對方的後方實行奇襲。此外，無線電之設備，可以用做有力量的宣傳工具，海陸空又能够斷絕對方的對外交通，而陷整個民族於飢餓線。總而言之，現代的戰爭已變爲「全民戰爭」了。倘若人家對我施行「全民戰爭」，而我僅作局部的抵抗，或僅以軍隊應戰，則未有不敗的。在國父的全部遺教中，雖然不見有「全民戰爭」這個名詞，却常見有性質類似的「民族戰爭」，與「國民革命」的名詞。而且國父又爲民族戰爭及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國父說：「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也」（同盟會宣言）。又說：「故舉國一致，誓死靡他也」（見錢幣革命一文，係主張對帝俄抗戰而言）。又說：「我們要革命事業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動，團結精神。自根本上講起來，革命事業是大家的事，不是一個人的事，既是大家的事，必要大家同心協力，才可以實行。如果不能同心協力，便永遠不能實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又說：「中國的事太大，要用四萬萬人的力，才容易做成功，不是一兩個人的力可以做得到的，因爲一個人的力有限。……我們要中國進步，造成一個極合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國家，非用羣力不可。要用羣力，便是在合羣

費盡力，大家去奮鬥，不可依賴一人或一部份用孤力去做，用孤力去做，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見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再又說：「人人對於國家社會，當視為我個人與他人組織而成，凡國家社會之事（戰爭亦即國家社會之事——浴日註），即我分內事也，有時凡有益於國家社會之事，即犧牲一己之利益為之而不惜，然後國家社會乃能日臻於進步」（見地方自治與責任心演講詞）。這都可以當做 國父全民戰爭的根本思想，但它是革命的，不是侵畧的，與德將魯登道夫所說的不同。其次，全民戰爭是以民族精神為基礎的，團結全國上下成爲一貫着，視此精神力，在報難困苦中支撐長期抗爭戰者，視此精神力，壯旺軍民殺敵的意志及爭取國際的同情與援助者，亦視此精神力。所以民族精神，實爲全民戰爭取利之本。國父有見及此，故發動推翻滿清之時，即提出「驅除鞑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民元就臨時大總統頒告海陸軍將士說：「曠觀世界歷史，其能成改革大業者，皆必有甲冑之士，反戈內應，若士若衛，其前例矣。吾國軍人伏處異族專制之下最久，慷慨激烈之氣，蓄之也深，則其發之也速。同一軍人也，爲漢戰則奮，爲滿戰則潰。同一艦也，爲漢用則勇，爲滿用則怯。凡此攻城克敵之豐功，皆吾將士有勇知方之表証。內外視國者，徒致嘆於吾人成功之迅速，爲從來所未有。文猶有以知吾海陸軍將士，皆深明乎民族民種之大義，故能一致進行，萬死不避，以成此偉烈也」。這是指出民族精神在民族戰爭上所發生的效果。其次 國父在民族主義上大聲疾呼，

從速恢復民族精神，鞏固民族精神，以抵禦外侮而挽救危亡，說：「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衰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位置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又說：「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鬥，無論我民族是處於甚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所以在抗戰期間中，「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號，便支配着全國同胞的心靈，所有軍民，雖苦不怨，雖危不投降。不待說，這就是由於秉着民族精神。但是是為民族精神的障礙，有一種代代相傳所謂「世界主義」，或「世界精神」，因為這種主義，其流弊必變為不抵抗主義，投降主義，順民主義，奴隸主義，又如俗語說：「不管誰做皇帝，都是一樣納糧」的思想，所以非給予澈底清除不可。民族主義說：「世界主義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所謂天下主義，我們現在研究這個主義，要知道他到底是好不好呢？照理論上講，不能說是不好。從前中國智識階級的人，因為有了世界主義的

思想，所以滿清入關，全國就亡。康熙就是講世界主義的人，他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東西夷狄之人，都可以來中國做皇帝，就是中國不分夷狄華夏，就是世界主義。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合乎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人征服了，要想把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義，要全世界服從他。中國從前也想做全世界的主人翁，總想站在萬國之上，故主張世界主義，因為普通社會，有了這種主義，故滿清人無無人抵抗，以致亡國，當滿清人關的時候，人數是很少的，總數不過十萬人，怎麼能够征服數萬萬人呢？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大多數人，很提倡世界主義，不講民族主義，無論什麼人來中國做皇帝都是歡迎的，所以史可法雖然想反對滿人，但是贊成他的人數太少，還是不能抵抗滿人，因全國的人都歡迎滿人，所以滿人便得做中國的安穩皇帝，當那個時候，漢人不但不是歡迎滿人，並且要投入旗下，歸化於滿人，所以有所謂漢軍旗一。因此，在今日，我們就應根除這種主義的遺毒，積極發揚民族精神，先完成民族戰爭，民族主義，然後再來講真正的世界主義。

總之 國父的戰爭思想是進步的，是革命的，是反侵略的，是救國救世的，換言之，就是以中國為本位而建立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由此發生信仰，有了信仰，便發生力量，用此強大的力

最來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戰爭。

(註一)魯登道夫將軍著 *Der Totale Krieg* 一書，有譯爲「全民戰爭」，亦有譯爲「全體戰爭」。本書所引魯氏言論，係摘自張君勱氏譯本——「全民族戰爭論」

(商務版)。

三·國防計劃

倘若人類皆愛和平，戰爭早已消滅的話，那麼我們現在也不必再來談什麼國防建設了。

國防建設以戰爭為對象，正因為國際戰爭的不斷發生，尤其是我們必須從革命戰爭中求中國的自由解放，更應從事於戰爭的準備——國防建設，亦即「時效戰」的準備。

現代的戰爭是全體戰爭，是綜合戰爭，現代國防的內容，一般學者分為精神國防，與物質國防，或分為政治國防、經濟國防、文化國防、及軍事國防。惟從事于這個國防內容的建設，自然以假想敵國為對象，決非一蹴而幾，也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所可藏事，須分別重輕緩急，作有計劃的建設，然後才能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達到「不戰而屈」，或「戰則必勝」的要求——保障「國家的安全」。

中國是亞洲一個古國，也是一個大國，氣候溫和，物產豐富，陸有白山、興安嶺阿爾泰山、天山、蔥嶺、喜馬拉雅山為天然屏障，海有朝鮮半島、琉球列島、舟山羣島、澎湖列島、台灣、香港、海南島、安南及東西沙羣島為天然屏障，如此天然國防，實居亞洲主人的地位。惟因歷代

祖先，對於國防的建設，如物質國防，除那用以防守的萬里長城外，幾等于零。至于精神國防：尚武之風，日漸消沉，僅存着一些所謂「正氣」，或「禮義廉恥」。以這樣的國防狀態，一轉入近代，由于列強帝國主義的侵入，及經過好幾次對外戰爭，如鴉片、甲午、庚子等役的失敗後，使大家都深深認識原有的國防力量，不足以禦侮圖存。在這個時期，像以林則徐爲代表的「海防論」，以曾國藩、左宗棠爲代表的「洋務論」，以李鴻章、張之洞爲代表的「時務論」，以康有爲、梁啓超爲代表的「維新論」，便是先後應運而起的國防主張，畢竟因爲他們沒有真正了解西洋富強的原因，文化的精神及中國的國情，且所發表的主張多爲議論，未能見諸切實施行，無怪乎終不能把中國的國防力量充實起來。

「沒有國防，便沒有國家」，國父於上次歐戰結束之後，因飽受歐戰的教訓，又目擊國防的危機，更感到過去「海防論」，「洋務論」，「時務論」及「維新論」的錯誤與失敗，便決意爲中國國防打開一條生路，擬著「國防計劃」一書以爲宣傳，並作爲今後國防建設的南針。

國父對於中國國防的言論，可以追溯到李鴻章書的「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其實這便是他最初對於國防的主張。此後，民元四月在廣東軍界歡迎會上演講說：「今日要務，在乎擴張軍備，以成完全鞏固之國防，然後可與世界列強並駕齊驅」。民二致陳英士先生的信說：「中國之海軍，合全國之大小戰艦不能過百隻，設不幸有外侮，則中國危矣，何也？

我國之兵船不如外國之堅利，槍炮不如外國之精銳也，兵工廠不如外國設備齊完也，故中國今欲富強，非厲行擴張新軍備不可。同志謂中國國防不有相當武備建設，此中國不富強之原因，誠是也。故中國欲勤修軍備，然後可保障國家獨立民族生存也。文聞袁同志世凱擬向外國大借外債以爲擴張新軍備建設之需，果此事實行，則中國有相當新軍備建設也。如是則中國富強，可計日而待也。昔滿清政府將擴張海軍建設之費以爲建設一大娛樂園（增頌和園——浴日莊）以作私人之娛樂，吾想今日民主政府，必定努力整理新軍備建設，改革中國舊軍備也，而不有昔日滿清政府之腐敗也。現在強隣如虎，各欲吞食我國，若我國不有相當武備自衛，則我國必爲虎所食也，故我須改良武器然後能自衛也，不爲虎所食也」。民八撰「精武本紀」序說：「我國民族平和之民族也。吾人初不以黷武善戰策我同胞，然處競爭劇烈之時代，不知求自衛之道（即國防建設之道——浴日莊），則不適於生存。且吾觀近代戰爭之起，恆以弱國爲問題。倘以和平之民族，善於自衛，則斯世私無弱肉強食之說，而自國之問題不待他人之解決，因以促進世界人類之和平，我民族之責任，不綦大哉？易曰：「謾藏誨盜，洽容海淫」。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皆爲不知自衛善警也。一。到民十三演講民族主義時，更把中國國防的危機，說得淋漓盡致：

「因爲我們的海陸軍和各險要地方，沒有預備國防，外國隨時可以衝入，隨時可以亡

中國。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是日本，他們的陸軍，平常可出一百萬，戰時可加到三百萬，海軍也是很強的，幾幾乎可以和英美爭雄，經過華盛頓會議之後，戰鬥艦才限制到三十萬噸。日本的大戰船，像巡洋艦、潛水艇、驅逐艦都是很堅固，戰鬥力都是很大的。譬如日本此次派到白鵝潭來的兩隻驅逐艦，中國便沒有更大的船可以抵抗，像這樣的驅逐艦在日本有百幾十隻，日本如果用這種的戰艦來和我們打仗，隨時都可以破我們的國防，制我們的死命，而且我們沿海各險要地方，又沒有很大很大的炮台，可以鞏固國防，所以日本近在東鄰，他們的海陸軍隨時可以長驅直入，日本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如果要動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國，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止，最多不過十天，所以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此係就民國十三年前的情勢，並為警惕國人而說，後經我政府逐漸充實國防力量，故此次對日抗戰得以不亡，且可獲得最後勝利——浴日計）。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東岸，最強的最美國。美海軍從前多過日本三倍，近來因為受華盛頓會議的束縛，戰鬥艦減少到五十萬噸，其他潛水艇、驅逐艦種種新戰船，都要比日本多。至於陸軍，美國的教育是很普及的，小學教育是強迫制度，通國無論男女，都要進學校去讀書，全國國民，多數受過中學教育，及大學教育，他們國民在中學大學之間，都受過軍事教育，所以美國政府隨時可加多兵。當參加歐戰的時候

，不到一年，便可以出二百萬兵，故美國平時常備軍雖然不多，但是軍隊的潛勢力非常之大，隨時可以出幾百萬兵。假若中美絕交，美國自動員之日起到攻擊中國之日止，祇要一個月，故中美絕交在一個月之後，美國便可以亡中國。再從美國更向東望，位於歐洲大陸與大西洋之間的，便是英倫三島，英國從前是稱海上的霸王，他們的海軍是世界上最强的。自從華盛頓會議之後，也限制戰鬥艦不得過五十萬噸，並於普通巡洋艦、漏逐艦、潛水艇，都比美國多。英國到中國，不過四五十天，且在中國已經有根據，好像香港已經經營了幾十年，地方雖然很小，但是商務非常發達，這因地勢，在軍事上掌握中國南方幾省的咽喉，練得有陸軍，駐得有海軍，以香港的海陸軍來攻，我們一時雖然不至亡國，但是沒有力量可以抵抗，除了香港以外，還有接近的印度澳洲，用那些殖民地的海陸軍，一齊來攻，自動員之日起，不過兩個月，都可以到中國，故中英兩國如果絕交，最多在兩個月以內，英國便可以亡中國。再來望到歐洲大陸，現在最强的是法國，他們的陸軍是世界上最强的，現在有了兩三千架飛機，以後戰時還可以增加，他們在離中國最近的地方，有安南的根據地，並且由安南築成了一條鐵路，通到雲南省城，假若中法絕交，法國的兵，也祇要四五十日，便可以來攻擊中國。所以法國也和英國一樣，最多不過兩個月，便可以亡中國。照這樣講來，專就軍事上的壓迫說，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強國，都可亡中國。

以上可以說是 國父擬著「國防計劃」一書的原因，但 國父「國防計劃」一書的詳細內容是怎樣呢？根據 國父於民國十年七月八日給廖仲愷先生的手札（註一），那僅是 國父擬著「國防計劃」一書的大綱草案，並非「國防計劃」一書的全豹。三民主義的自序說：「國家建設一書，較前三書爲獨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政與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而民族主義一冊，已經脫稿，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二冊，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冊，於思想之縝密，研究之門徑，亦大畧規畫就緒，俟有餘暇，便可執筆直書，無待思索。方擬全書告竣，乃出而問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炮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攷之西籍數百種，悉被燬去，殊可痛恨！」

所以 國父給廖先生的這封信，可當作他擬著「國防計劃」一書的「大畧規畫就緒，俟有餘暇，便可執筆直書，無待思索」。倘若不遭陳逆叛變的影響，而又不是逝世得那麼早，則這部國防經典，定可完成。

國父給廖先生的手札，原文是：

「當革命破壞告成之際，建設發端之始，余乃不禁興高彩烈，以余生平之掬負，與積年研究之所得，定爲建國計劃（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國防計劃、革命方畧等）舉而行之，以求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之域焉。不期當時之黨人，以余之理想太高，過格而不行，至

民國卅元，十年於茲，中國猶未富強如列強者，皆以不實行余之救國計劃而已。余近日撰著一書（十年國防計劃），以為宣傳，使我國國民了解余之救國計劃也。茲舉國防計劃書之綱目如下：

- 一 國防概論
- 二 國防之方針與國防政策
- 三 國防之原則
- 四 國防建設大綱
- 五 制定永遠國防政策，與永遠以國防軍備，充實建設，為立國之政策
- 六 國防與憲法
- 七 太平洋國際問題與中國
- 八 國防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外交政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關係
- 九 國防與實業計劃之關係
- 十 發展國防工業計劃
- 十一 發展國防農業計劃
- 十二 發展國防鑛業計劃

- 十三 發展國防商業計劃
- 十四 發展國防交通計劃
- 十五 發展國防教育計劃
- 十六 財政之整理
- 十七 外交之政策與戰時外交的政策
- 十八 移民於東三省、新疆、西藏、內外蒙古，各邊省計劃
- 十九 保護海外各地華僑之意見書
- 二十 各地軍港、要塞、砲台、航空港新設計劃
- 二一 都市與鄉村之國防計劃
- 二二 發展海軍建設計劃
- 二三 發展航空建設計劃
- 二四 發展陸軍建設計劃
- 二五 各重要會議之召集，如開全國國防建設會議，海軍建設會議，軍事教育會議之屬，由中央政府，每年舉行一次，以爲整理國防建設
- 二六 軍事教育之改革與訓練計劃

- 二七 軍器之改良計劃
- 二八 軍制之改革
- 二九 軍醫之整理及改良軍人衛生之建設
- 三十 國防警察之訓練
- 三一 軍用禽獸之訓練
- 三二 國防本部之進行工作
- 三三 仿效各國之新國防建設計劃
- 三四 舉行全國國防總員之大演習計劃，與全國空海陸軍隊國防攻守戰術大操演
- 三五 作戰計劃
- 三六 遣派青年軍校學生，留學歐美各國學習于各軍事專門學校，及國防科學、物質工程專門學校之意見書
- 三七 向列強定製各項海陸空新式兵器，如潛水艇、航空機、坦克戰車、軍用飛機、汽球等，以爲充實我國之精銳兵器與仿製兵器之需
- 三八 獎勵國民關於國防物質科學發明之方畧
- 三九 購買各國軍事書籍、軍用品、軍用科學儀器、軍用交通器具、軍用大小機器等

，以爲整理國防之籌

四十 組織考察世界各國軍備建設團之意見書

四一 聘請列強軍事專門人員來華教練我國海陸空軍事學生，及教練國防物質技術工程之意見計劃書

四二 收回我國一切喪失疆土，及租借地、租界、割讓地之計劃

四三 我國與各國國防實力比較表

四四 抵禦各國侵畧中國計劃之方畧

四五 訓練國防基本人才三千萬計劃，訓練國防物質工程技術人才一千萬計劃

四六 完成十年國防重要建設計劃一覽表

四七 新兵器之標準

四八 組織海陸空軍隊之標準

四九 擴張漢陽兵工廠，如德國克魯伯廠之計劃

五十 國民代表大會關於國防計劃之修改，國防建設意見書

五一 歐戰戰後之經驗

五二 國防與人口問題

五三 國防與國權

五四 指導國民研究軍事學問之研究

五五 實施全國精兵政策

五六 軍人精神教育與物質教育之比較

五七 注重國際軍備之狀況

五八 我國之海軍建設計劃，航空建設計劃，陸軍之各種新式鎗砲戰車，及科學兵器

機械兵器建造計劃

五九 訓練不敗之海陸空軍計劃

六十 列強之遠東遠征海陸空軍，與我國國防

六一 各國富強之研究

六二 結論

以上各計劃，不過大綱而已，至於詳細之計劃，待本書脫稿，方可閱覽。予鑒察世界大勢，及本國國情，而中國欲為世界第一等大強國，及免重受各國兵力侵畧，則需努力實行擴張軍備建設也。若國民與政府，一心一德實行之，則中國富強，如反掌之易也。」

這封手札中所載「國防計劃」一書的六十二項綱目，雖說尚是一個未完整而欠條理的簡單初

稿，却具有現代化國防計劃的新規模。申言之，它不是十九世紀以前的那種純粹軍事的國防計劃，已進而把國家的整個活動如政治、經濟、文化等部門和軍事並列一起，構成全體性的國防計劃，來配合現代全體性的戰爭。他眼光的遠大，計劃的周詳，實爲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爲、梁啓超輩，望塵莫及。

現在我們着手研究 國父這個國防計劃大綱，真感覺到它範圍的龐大，綱目的繁多。應首先研究的，就是 國父的「國防方針」。我們知道：國防方針是產生於國防思想，各國各有其國防思想，及因其環境的不同，而各有其國防方針。英國與美國不同，美國與蘇聯不同。推而至于德日意亦各相異。三民主義爲我國防思想的根源，國防方針，自須以此種思想爲依據，所以它是自衛的，不是侵略的，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第一步應以「抵禦各國侵略」（大綱第四十四項）及「收回一切喪失疆土及租借地、租界、割讓地」（第四十二項），使國家完全得到自由獨立。「國防政策」爲實現國防方針的手段與方案，它是隨時代環境而變化的，而國防方針則往往成爲一成不變的東西，兩者的關係如此，其不同又如彼，故大綱第二項定有「國防之方針與國防政策」。國防政策，包括政治政策，經濟政策，文化政策及軍事政策。第二項定有「國防之原則」，本來在國防原則上，是以使敵人一兵一卒，不得侵入國境爲最高原則。英國亞爾夫來多氏說：「真正的國防，在於不使敵人上陸一步」。近代各國軍事家亦多主張：「求戰場必於國境之外」

。但這是限於攻勢作戰的，如果我們的力量尚未能從事於攻勢作戰，則要採取守勢作戰為國防原則，依於守勢作戰優劣的發揮，亦可以爭取最後的勝利。十九世紀之初，俄國的擊敗拿破崙，就是採取守勢作戰的結果。我們默察我們今後的假想敵國仍是某某強國，那麼我們就應決定守勢作戰為國防原則。在國防建設上，努力克服我們守勢作戰的弱點，充實守勢作戰的力量。但絕不能永遠如此，因為國防建設，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故將來仍要進而採取攻勢（非侵略性）的國防原則，以戰勝敵人於國境之外為上策。以下再就其他各項目分為四大部門作簡單的研究：

一、國防 政治部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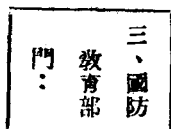
政治應以國防為中心，這是現代國防的趨勢。因為政治建設不合乎國防的要求，或失敗的話，就足以招致國防的不安，在戰時，尤足導致戰爭的失敗。像上次歐戰德國的失敗，及此次歐戰法國的失敗，便是政治失敗為之厲階。所以大綱中對於政治極為重視，定有五十三項：「國防與國權」。國權亦稱主權，從事國防的建設，必須保持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要能自由行使，不受人家的支配，否則，像今日的朝鮮、安南何能從事國防的建設！第六項：「國防與憲法」，是說中華民國應變為法治的國家，使一切國防計劃的進行，不受政治上的限制與障礙。第八項：「國防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中央政府之關係」。三民主義與國防的關係，畧如上述。五權憲法乃為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最完全最良善的萬能政府，以利國防的建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於國防建設，應確定職

分工合作，且全體人員均要深己奉公，增進效率。第三十項：「國防警察之訓練」，用以防奸捕諜，維持國家治安，且可作爲戰時的預備軍。第二十一項：「都市與鄉村之國防計劃」，是爲建設全國市政與鄉政的國防化。第五十二項：「國防與人口問題」，這是關於全國人口的生殖養育問題，在國防上所需要的國民是質優量多，但兩者比較，質重於量。第十八項：「移民於東三省、新疆、西藏、內外蒙古各邊省計劃」，用政府力量，移殖于西北邊省，以解決本部人口的過剩，並得充實邊疆，開發資源，以固國防。第十九項：「保護海外各地華僑之意見書」，華僑爲革命之母，向來對於祖國有很大貢獻。故在國防上應盡量設法（或用外交或用海軍）來保護他們，使他們在海外得以自由生存發展，不受人家的侮辱與宰制。還有第十七項：「外交之政策與戰時外交的政策」，平時外交，在能取得各國的援助來建設國防，戰時外交在能孤立敵人，爭取與國，來促進戰爭的勝利。爲此必須確立有效的外交政策。總之，我們要能儘量利用和平的外交來達到我國防上一切的要求爲上策，但却不可忽畧外交後盾——國防力量的建設。

二、國防
經濟部
門：

經濟爲國防力之一種，它在國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現在一國的經濟建設，已由國民經濟發展到國防經濟的階段。關於國防經濟的定義，據國防經濟學者的見解，它是表現於下述的三種形態：第一、平時經濟，作戰爭的準備，其主要目的，仍在滿足一般國民經濟的需要。第二、過渡時期經濟，即在戰爭危機迫

的要求，故提出這個主張，在使財源充裕，以供國防建設之需，及儲蓄大量原料與資金，以應戰時之用。



文化力量是國防的潛在力量。國父在民族主義上說過：「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够強盛的緣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于武力發展，繼之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可見文化在國防上的重要性。而發展文化力量，首在改革教育，使成爲國防教育。普之勝法，俾士麥歸功于小學教師。日之勝清勝俄，有人歸功于

「忠君愛國」教育的實施，便是兩大例証。所以大綱中定有第十五項：「發展國防教育計劃」。

這個計劃的範圍，當以建設學校教育的國防化爲主，但亦包括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的國防化。在把每一個國民養成「國防人」，以適應國防工作及全民戰爭的要求。第三十六項：「軍事教育之改革與訓練計劃」，我國軍事教育向落后，亟應改革，及樹立健全的訓練計劃，以資養成優良的幹部。第五十六項：「軍人精神教育與物質教育之比較」，兩者比較，當以精神教育爲重，尤以物質裝備處于劣勢地位的軍隊，更應以精神教育爲重，詳見第五篇「決勝精神力」。第五十九項：「訓練不敗之海陸空軍計劃」，欲訓練陸海空軍成爲戰而不敗的軍隊，確非易事。有待施以優良的教育，使指揮官對於戰略戰術運用自如，士兵對於戰鬥技能極其精熟，及全體官兵均有爲國家爲主義而犧牲奮鬥的決心。第三十六項：「遣派青年軍校學生留學歐美各國，學習于各軍事

專門學校，及國防科學物質工程專門學校之意見書」，爲深造青年學生成爲專門人才來担當國防的軍事上或經濟上等任務。第四十一項：「聘請列強軍事專門人員來華教練我海陸空軍事學生，及教練國防物質技術工程之意見書」，這是「替材晉用」的政策，因我國目下缺少此項人才，故應暫時聘請外國，以訓練我青年學生。第四十五項：「訓練國防基本人才三千萬計劃，訓練國防物質工程技術人才一千萬計劃」，這真是一個迫切而偉大的計劃。在常人驟然看來，似乎近乎吹牛，誠以現代國防部門之廣，國防業務之繁，非養成有此數目人才莫辦。尤以戰時國防各部門的動員需要人才更多，故不可不預爲準備。第五十四項：「指導國民研究軍事學問之研究」，在增進國民對於軍事具有常識及技能，可指派軍事人員或用演講或用通訊或用圖書儀器，或組織訓練班等方式來施行之。還有第三十八項：「獎勵國民關於國防物質科學發明之方畧」，我們知道：科學是一切學術的基礎，國家一切建設的根據，且爲國防武器的母體，今日我國最感落後的就是科學，而欲發展科學除廣設研究試驗機隸外，還要獎勵專家分途研究，及留學海外。現在世界各國科學水準最高的國家，首推德國與美國。這兩個國度的科學研究機關，有如林立，而且規模宏大，像美國比魯電話研究所，擁有研究員二千名，每年所用研究費達二千萬金元。德國卡衣柴維羅海羅姆協會是注重于自然科學的研究，包含有三十個研究所的大組織，每年不惜巨資研究。其次各國政府對於科學上有特殊貢獻或發明的專家，獎予巨金，視爲常事。且有賜以爵位者，如

意國無線電發明家馬可尼的獲得侯爵。有享受國葬之禮者，如德國尼布可式圖版的發明家，又為無線電送報的功勞者巴羅尼布氏于逝世時，希特勒賜以此種葬禮。且選在一八八二年陸巴特克爾博士遠赴印度，發現了虎疫的病原菌，於回國的時候，威廉第二曾厚待以歡迎凱旋將軍之禮。科學壇上，一時傳為佳話。又像蘇聯礦工斯達哈諾夫，他實際成功了採礦增加效率的方法，政府獎予「列寧勳章」，全國尊為「勞動英雄」，並享受生活的優先權，全國所推行的生產競賽運動，稱為「斯達哈諾夫運動」。國父在民族主義中說過：「恢復我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外國的長處，就是科學，十年之後，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為達到此目的，必須取法外國，獎勵發明，促其發展，以便戰時的動員。

四、國防

軍事部

門：

軍事為國防上最重要的一環，上述政治、經濟、文化諸部門均要與軍事配合而並進。更就國防趨勢看，軍事在國防上，不論平時戰時，皆居首位，即所謂「軍事第一」。因為國防建設，是為準備戰爭，而軍事力量又為綜合戰爭的支柱，沒有軍事戰的撐持，則政治戰，經濟戰，文化戰亦將無從展佈。大綱中的第二十八項：「軍制之改革」，是主張改革國軍的建制及保育制度，使軍備適應國防上的要求。第五十五項：「實施全國精兵政策」，是說今後的建軍，對於正規軍的建設，應採取精兵主義，兵額宜少，不可徒貪兵額眾多，坐耗國帑，而且兵多則不易精，不精的兵，就不合乎現代戰爭的要求。

·第四十八項：「組織海陸空軍隊之標準」，這是屬於軍隊的編制問題，而軍隊編制的標準，常視擁有兵員兵器，及戰術要求敵軍情態而定，且應不斷提高標準，第一步應以一大軍國為標準，第二步應以二大軍國為標準。第二十九項：「軍醫之整理及改良軍人衛生之建設計劃」，孫子說過：「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故為維持軍人的康健必須講求改良衛生，而改良衛生，首在整理軍醫，及確立改良衛生建設計劃。第三十二項：「軍用禽獸之訓練」，如驃馬、軍用鴿、軍用犬等的訓練。第三十七項：「軍器之改良計劃」，第三十七項：「向列強定製各項海陸空新式兵器，如潛水艦、航空機、坦克炮車、軍用飛艇、汽球等，為充實我國之精銳兵器，與仿製兵器之需」。第四十九項：「擴張漢陽兵工廠，如德國克虜伯礮廠之計劃」。第五大項：「我國之海軍建艦計劃，航空建機計劃，陸軍之各種新式槍炮戰車及科學兵器機械兵器建造計劃」。這都是關於兵器的改良、購買和製造的計劃，在充實國軍的新銳兵器，加強戰鬥力量。但為製造兵器，及供其他軍事上之整理，均要有工具的運用，所以又定有第三十九項：「購買各國軍事書籍、軍用品、軍用科學儀器、軍用交通器具、軍用大小機器等，以為整理之需」。還有第四十七項：「新兵器之標準」，這是脫離軍所用的新兵器，如陸軍兵器、空軍兵器、海軍兵器、化學兵器等，均要有一定標準，即新兵器的制式要一律，種類要單純，自製的要有一定標準，外購的亦要有一定的標準，以便戰時的補充。因為未來戰爭的延長，勢非自產武器不可，外購的僅為過

渡時期及仿造而已。至於擴充瀋陽兵工廠，如同蘇國克虜伯砲廠，不過舉其一例，其他海空軍等廠，亦當要與世界第一等強國並駕齊驅。第二十項：「各地軍港、要塞、炮台、航空港之新建設計劃」，這是軍事設法上一個大規模的計劃，工程浩大，需費亦鉅。軍港為海軍根據地，航空港為海軍航空根據地，要塞為樂城之一種，通常區分為（一）陸地要塞，（二）江岸要塞，（三）海岸要塞，炮台為設置炮位之所，要塞的一部。國防要地，如交通要點、軍港、航空港站，均宜構築要塞以為掩護而防禦敵人的攻擊，諸如此類，都應定有精密的建設計劃才可。自然構築要塞為國防上所必需，但我們決不可迷信要塞的效用，如果認為我們已設有強固的要塞，從此敵人便不敢來犯，那是錯誤的，如果認為專守於要塞之內，便可以保全要塞，甚至可以戰勝敵人，那也是錯誤的。世界頂有名的強固要塞，如法國的馬奇諾，英國的新加坡，都先後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宣告牠悲慘的命運了，這真是我們一個最寶貴的教訓。並且我們應認明：「要塞之設，在國防體系中，隨時勢和實際情形而變更，若以為要塞設置以後，可保存五十年百年之效用，甚至以為有永久價值，實為愚妄之見。從前腓特烈大王于蘇德頓山頂，所建的西爾柏堡要塞，到現在已喪失原來的意義和價值了」（註二）。以上各項皆屬國防軍事建設計劃，亦可分別歸併于第二十二項：「發展海軍建設計劃」，第二十三項：「發展空軍建設計劃」，及第二十四項：「發展陸軍建設計劃」之內，真是無所不包的大軍事建設計劃。于此我要提出一說的，就是現階段的國防建設，

國 防 計 劃

應以發展陸軍或海軍或空軍爲主體呢？過去有人主張採取「陸主海從」政策，也有人主張採取「海主陸從」政策，又有人主張應採取「陸海空並重」政策——他說中國有三千數百餘萬方里的土地，必須建設有龐大的陸軍，準備擊破敵人于國境之外，有二千八百餘海里的海岸線，亦須以列強海軍爲標準，建設強有力的海軍，準備擊破敵艦隊于領海之外。空軍爲最新銳的兵種，又爲立體戰爭的王者，亦須建設「優空國防」，準備擊滅敵機隊于領空之外，自然，這個主張是我們國防建設的最高理想，但在現階段是否爲我們的人力財力物力所能兼顧呢？實際上我們只得先其急，後其緩，以陸軍爲主，空軍爲從，徐圖海軍的建設。尤以現階段的對外抗戰，係大陸的戰爭，其爭勝負的戰場在陸地，其對峙而爭勝負的軍隊爲陸軍，空軍只有盡其協同作戰及爭取制空權的任務，海軍更談不到有多大的活動。魯登道夫將軍說：「大陸國在國防方面之主力，實爲陸軍，此爲戰爭之根本」。實有見而云。

其次，說到第二十五項：「作戰計劃」。孫子說：「多算勝（算爲作戰計劃——浴日計）少算不勝」。拿破崙說：「完備的計劃爲戰爭勝利之母」。近代各國的作戰計劃通常是由軍令部（即參謀本部）擬定的，像有名的「史蒂芬計劃」，便是德國參謀總長史蒂芬主持參謀本部時所策定的對法作戰計劃，德國于上次歐戰未能攻下巴黎，打敗法國，是因小毛奇沒有澈底執行這個計劃的錯誤，這次希特勒的打敗法國，也是根據着「史蒂芬計劃」而變化運用。可見作戰計劃在國防上的

國 防 計 劃

重要性。這裡所說的「作戰計劃」，雖然可以解釋它包括着政治作戰，經濟作戰，文化作戰及軍事作戰等計劃，但我却專把它當作軍事的作戰計劃來說，包括着陸軍作戰計劃，海軍作戰計劃，空軍作戰計劃，及陸海空軍聯合作戰計劃。我國今後對於假想敵國應豫先策定「先立于不敗之地」的作戰計劃才可。還有第三十四項：「舉行全國總動員之大演習計劃，與全國海陸空軍隊國防攻守戰術之大操演」。動員的原意，就是最初步的軍事行動，亦即最末一次的軍事準備，也可說是建軍（裝備）的準備完成與作戰（集中）的行動開始。于此足見動員最初的範圍，是限於軍隊的裝備，但自普法戰爭後，動員範圍已逐漸擴大，直至上次歐洲大戰，其範圍更加擴大，便有全國總動員之說，所謂全國動員，即包括軍事動員與民事動員兩部，民事動員，日本稱為「國家總動員」，即除軍事外之全國動員。所謂全國總動員演習，係把全國一切力量由平時狀態移于戰時狀態的大演習，為的完成全國總動員的準備，以便戰時立刻實現全國的總動員。在此次抗戰中，我政府經已頒佈國家總動員法及設置國家總動員會議的機構，使全國成爲一個戰鬥體，爭取抗戰最後的勝利。這也可以說是 國父這個動員演習計劃的進一步實踐。我們陸海空軍素乏國防攻守戰術之大操演，實爲國防上一大缺陷，今後應多行演習，以爲事前準備（擬定各種不同的方案和想定），這樣，到了實戰的時候，我們早已成算在腦，自然可以應付裕如了。

以上各部門的國防計劃，國父原擬假以十年的長期間來完成其重要建設的，故大綱中定有

「完成十年國防重要建設計劃」的第四十五項。不過以科學落後，國防基礎薄弱的我國，欲使其變爲世界第一等強國，攻必取，守必固，則非十年所可奏效，于十年之後，仍須來無數個十年，正如德皇威廉第二所說：「國防是永遠做不完的怪物，改善和增進，亦同樣的無止境」。雖然他是侵略的國防觀，但我們爲自衛計，亦須不斷建設下去，因爲世界各國的國防建設，有進無止，倘若我國防建設自甘落後，那就無從保障國家的安全了。所以「國父在大綱的第五項中又定有「製定永遠國防政策」。在民族主義上亦說：「所謂國無敵國外患，是自己心理上覺得沒有外患，自以爲很安全，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外人不敢來侵犯，可以不必講國防，所以一遇有外患，便至亡國」。這也是指示我們要永遠從事于國防的建設。

此外尙定有第四項：「國防建設大綱」，是爲確定國防建設的根據和程序，正如建國必須制定「建國大綱」一樣，此項應列於上述各部門之前。第三十三項：「仿效各國最新國防建設計劃」此爲取長補短，但須經過消化才可，應歸併于上述四大部門之內。至關於國防建設的研究和設計的機構，國父主張設置國防本部（見第三十二項）及召集各種國防會議（第二十五項及第十項）。

總之：中國爲世界的一環，中國不能離世界而關閉自守，所以爲建設中國的國防，或確立有效的國防計劃，固然要「知己」，更要「知彼」，即是要明瞭國際形勢，列強虛實，及其對我態

度。謀我奸計。所以大綱中定有第四十：「組織考察世界各國軍備建設國之意見書」，第四十七項：「注重國際軍備之狀態」，第七項：「太平洋國際政治問題與中國」，第六十項：「列強之遠東遠征空海陸軍與我國國防」，第四十三項：「我國與各國國防實力比較表」，第六十一項：「各國富強之研究」，及採取「歐戰戰後之經驗」，（第五十一項）這一項所謂「歐戰」，係指上次歐戰而言，今日我們要進而取法此次歐戰戰後的經驗了。

司馬法上說：「故國雖強，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是暗示我們不好戰，也不可鬆懈國防的建設。所以我們在戰時固要積極建設國防，就是在平時也一樣要積極建設國防。我們因為過去國防力量的薄弱，所以在這次抗戰之初，未能迎頭擊破敵人，弄至「半壁河山，淪于夷狄」，尤以我們國家的環境強隣逼處，海疆遼闊，更非積極從事于高虛國防的建設不可。從今日起，我們應確認「國防第一」，「國防至上」，而發揚「國父這個寶貴的遺教來從新制定詳細的計劃，一面發揮全體的力量來實行它，而建設高度的國防，戰勝當前的敵人，戰勝將來的假想敵人，使中國成爲「世界第一等強國，及免重受各國兵力侵擾」，再進而「濟弱扶傾」才可。

（註一）國父給廖仲愷先生的信，其時開粵地點，係國父於民十在廣州任非常總統之時

。據最近何香凝女士告訴我：當時廖先生亦在廣州，她曾親見這封信的寶貴原稿

（註二）見黃煥文先生譯：「大戰學理」（國防版）

四·軍政興革

提起孫子兵法便令我們想到軍政的重要，始計篇說：「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這是把軍政列爲勝敗攸關的五事之一。提起漢代三傑，也令我們想到軍政的重要。漢高祖起自亭長，逐鹿中原，戰勝強敵，取得天下，不待說，他是得力于三傑，卽張良担任參謀，韓信指揮作戰，蕭何掌理軍政——「補兵饋餉，軍得不匱」。結果論功行賞，何居第一。

軍政是軍事行政之謂，現它的內容，實比過去的複雜得多，包括有：（一）軍管區之劃定，（二）各種勤務令之頒佈，（三）軍隊之編制，（四）關於兵役諸法律，（五）軍事之預算決算，（六）徵兵法，（七）補充，（八）教育，（九）給養，（十）軍需之供給保存，（十一）其他關於理財事項。現代戰爭，對於軍政的要求，全在平時準備的充分，因爲軍政上有許多事項常須很長時間的準備才能完成。所以平時如果沒有充分的準備，到了戰時，必致腳忙手亂，捉襟見肘，不能爲適切的動員。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于未宣戰之先，有人問法國陸軍總長以法軍是否已有充分準備。彼答道：「軍隊的準備極尚，下至裹腿上的紐扣無一缺少」。此爲軍政準備

完成的典型。

國父于推翻滿清之後，認爲當前軍政亟待整理，又懷于將來對外戰爭的需要，在國民黨宣言（民國元年八月十三日發表）上，極力主張整理軍政說：「今日處於武裝和平世界，對外方面，軍備極須擴張，然擴張軍備，當自整理軍備始。蓋擴張軍備之舉，須待諸三四年後，而今日人手方法，則在整理軍政，軍政整理，而後始有擴張可言也」。關於整理軍政的政策，國父接着提出五項如下：

「一曰劃分軍區：於行政區域之外，則劃分全國爲數大軍區，獨立處理軍事，使軍民分治，易于實行。

「二曰統一軍制：今各省軍隊之編制，亦至不一，紛歧錯亂，非軍事所宜，故當使全國之軍隊，按一定之編制，俾軍事歸於統一。

「三曰裁汰冗兵：軍事雖應擴張，而冗兵則不可不裁。蓋兵備貴精，其操練不動，老弱無用者，理宜一律裁盡也。冗兵既裁，然後於強壯者訓練純熟，使之成軍，始可以擴張基礎。

「四曰興軍事教育：欲擴張軍備，則當求良好之將校。吾國今日之將校人才，異常缺乏，故此數年中，亟宜振興軍事教育，以養成一般將校人才。

「一日擴充兵工廠：吾國今日軍備上最大之缺點，則爲軍械不足，兵工廠祇有數所，而製出品，爲數亦微，今日即欲擴張軍備，然無器械，與徒手無異，故宜極力擴充兵工廠，先使器械豐富。此數者皆爲本黨擴充軍備之計劃」。

以上五大政策，我且作如下的簡單研究：

一、劃分

軍區：

現在世界各國，於行政區域之外，另有軍事區域的劃分，而此種軍事區域的劃分，係依兵興地理、行政範圍、居民程度及民性歷史而決定。在平時成爲一種軍行政教育與準備的戰事單位，到戰時各有其主要的國防任務，各有其作戰的方向，各自成爲整個國防機構的一部份。民國以來，我國主張設立軍區者，大不

乏人，兵學家蔣百里先生在「裁兵與國防」一文上主張：「全國設立百二十個軍事區，國防之據點。每區以步兵千二百人爲基幹，而斟酌地勢附以特種兵。其在黃河流域以內，至少須設置七十個以上（其餘之特種兵役，得另舉爲集團教育，如騎兵炮兵及其他技術諸部之類），此軍區之司令，以將官兼之，爲地方軍事之最高長官」。又有人主張劃分全國爲十次軍區：一日東三省軍區，二日直魯軍區，三日江浙皖軍區，四日閩贛軍區，五日兩廣軍區，六日西南軍區，七日川康軍區，八日內蒙軍區，九日山陝甘軍區，十日中澳軍區（即以漢口爲中心，將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劃爲整個的一個軍區）。而提出設立軍區最早的，要算我們國父。國父的主張與他們不

同，係主張劃分全國爲數大軍區，（按現在美國劃分全國爲三個軍區，英國本國劃分爲六個軍區，四個特別區，德國全國劃分爲十二個軍區）雖區域的劃分，尚未明白規定，其作用則在獨立處理軍事，實行軍民分治。這個主張，錯誤固屬父黨時以在野之身，致未實施。泊乎七七事變以後，我政府爲適應抗戰的需要，才依各省行政區域，設立各省軍管區，於軍管區之下，設師管區，團管區，專司徵集和訓練等事項，現在雖未進爲「軍區」，但我想必能實行于將來。

二、統一

軍制：

國父在這裡所說的軍制，僅限于軍隊的編制，如軍、師、旅、團、營、連、排、班、伍等。軍隊有了一定的編制，就可以將一切兵員組織起來，部勒起來，造成有組織的武力。正如孫子說：「治衆如治寡，分數（編制——浴日註）是也。」編制有平時編制戰時編制之分，前者爲後者的基礎，後者必依前者而產生。

制爲本，戰爲末，本不齊，則不能戰，求其能戰，則必先善其制，欲善其制，尤必先統一其制。以便教育統率及指揮。國父目擊當時各省軍隊編制的紛歧錯亂，便提出「統一編制」的主張，直至此次神聖抗戰以後，才告實現。雖說徐乎其徐，但亦足告慰國父在天之靈了。

其次 國父於民十三致蔣介石先生的信說：「今日開始練兵，猶不能行我所定編制，若謂練成之後，兵士官長都成了習慣而後，再行改制則難矣。此爲我所定之制，則欲練成之後，可以

應我方寸之運用也。倘開練之時，已不能行我之制，則練成之後，我亦無心用之矣。今爲應我所用之故，特托嘉蘭將軍將我衛士練至一營，以爲他軍之模範。兄謂我編制規模太大，若果因此何不練至一營或一團爲單位，以一營等一團，以一團等一族，有何不可？我想大家不欲行我之制者，則全爲故習所囿也。本其日本士官保定軍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勢，不知未來的戰陣爲何物，而以其師承爲一成不易也。因此之故，我更望今日之軍人捨去其故習，而服從我之制度，斯將來乃能服從我之命令，聽從我指揮也。如果今日教學生則存一成見，教成之後，何能使之爲革命軍，負革命之任務？試觀北洋之軍隊，訓練非不精，補充非不備，而作戰則遠不如敗殘之楊化昭、臧致平，以彼二人曾與南方稍有革命行動之軍隊接觸，而無形中學得一二革命之戰術也。此間今日所訓練之軍隊，如果將來能聽我指揮，則我必導之去以一攻十或以一攻百也。此等任務，更非尋常兵法所有，倘今日開練之始，不行我制，待至練成時，謂能聽我指揮，我決不信也」〔註一〕。國父這箇改革編制的主張，例如一個步兵師，共有兵數三八、九九二名，官數一、一六二員，其人員之多，戰鬥力之強，實爲一種大單位的新編制。今後我國軍隊的編制，固要充實其人員，尤要加強其火力，改善其裝備，務使一連一排有一連一排的戰鬥力，一團一營有一團一營的戰鬥力才可。但是軍隊的編制，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是而進化的，即依於兵器的進步，戰術的革新，和假想敵軍的編制而進化變更。所以我們對於軍隊的編制就不可存着一種保守的心

理，及做那漫無對象的設施才可。

三、裁汰

冗兵：

冗兵即無用之兵，亦即操練不動、老弱無餘的士兵，這種士兵，固不能完成任務，且成爲害羣之馬，亟應一律裁汰，使其歸農或爲工，以節省國帑，並使「人盡其用」。國父自擊當時各省軍隊多爲「強弱兼收，良莠並蓄」，便提出「裁汰冗兵」的主張，實是對症施藥。于此亦可見國父是主張採取精兵主義，因爲裁汰冗兵之後，所剩下的強壯者，加以嚴格訓練，就可成爲精兵。所以國父後來擬著「國防計劃」一書的綱目中，就列有「實施全國精兵政策」一項。其次是主張實行徵兵制度，因爲欲根本避免冗兵的發生，惟有採取徵兵制度，所以他在民前已主張「勵行徵兵制度」（見同盟會公開時代總章）。在此之後，又主張「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改爲徵兵制度」。這是指示國家在戰爭的急難中，應與人民相依爲命，人民享受國家的權利，亦應盡其對於國家的義務，而且亦唯有採取徵兵制度，才能適應現代長期戰爭所要求的大量兵員。現在列強如德、法、意、日等國，均行徵兵制度，又如英、美兩國平時雖得志願兵制，一到戰時都改爲徵兵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所徵出之兵，均經檢驗合格，自然沒有冗兵的現象。我國在此次抗戰中雖已實施徵兵制，惟關於徵兵仍待繼續改善，以杜絕冗兵的發生。

于此，我要附說的，就是關於訓練兵問題，即說士兵于淘弱強留之後，或新組織的軍隊，應當

怎樣訓練他們呢？練兵爲建軍之本，國父說過：「練兵一事，爲今日根本之圖」。又說過：「新到之武器，當用以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均見國父給蔣介石先生的信）。再說過：「創始革命軍，來救中國的危亡」（見黃埔軍校開學訓詞），但現代練兵的標準，每個士兵都要訓練（戰鬥教練重于制式教練，精神教練尤重于戰鬥教練），他們有充當班長，以至充當排長的能力，他們有了較高一級的能力，才會做出更好的動作。並且要訓練他們有各個獨立作戰的精神，因爲現代武器的進步，在戰場上不僅連長不能照顧全連的士兵，就是一個連長也照顧不了一排士兵，但爲使他們具有各自爲戰的精神能力，對他們的訓練固要嚴格，尤必須假以相當長期間。國父說過：「當兵的人，必要受過了許多的訓練，然後才能應戰，到了臨陣的時候，還有計及生死利害，違反他職守的。近來文明國的士兵，雖有死守職務，不計利害的，但是他們的天性純厚，還是不及蜜蜂。至于中國的士兵，更是比不上。俗話常說「好鐵不打釘，好子不當兵」，要他們成好士兵，必須經過許久的訓練，才勉強有用，如果說忠心一層，和蜜蜂比較，更是差得遠。蜜蜂賦有天生合羣的性質，一羣之中，各司其事，不必加以訓練，是自然而然的。人亦賦有多少天生合羣的性質，但須加訓練，然後合羣的性質才有進步，進步到極點，還是不及蜜蜂，蜜蜂實行天賦的特性，勇往直前，毫無顧慮，人每每因後天的訓練，沒有嫻熟，容易喪失先天的特性」（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軍事）。

四、與軍

事教育

將校爲軍隊的柱石，將校之良否，繫乎戰爭的勝敗重鉅。孫子說：「將者，智、仁、勇、嚴也」。即說將校須具備有此五種精神力，方合乎標準。古人說：「天下強兵在將，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敵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兵』。歐羅巴亦有一句名言：「牡羊之率獅子群，劣于獅子之率牡羊群」。惟欲養成良好的將校，首在興軍事教育。

中國的新軍事教育肇于清末，初仿德國，繼學日本，然東施效顰，所養成的將校，質固鮮合乎標準，量亦寥寥無幾，自然未足以適應現代建軍作戰的要求。這是 國父主張振興軍事教育的動機，也可以說是 國父後來創辦黃埔軍校的原因。自黃埔軍校創辦之後，我國軍事教育便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日臻發展，惟仍待改進，以達理想的要求。原來教育爲作戰的準備，作戰爲教育的實踐。今後應如何使教育適應作戰，即如何把講堂，操場和戰場打成一片，以養成優良的將校，實爲重大的問題。記得福煦元帥「研究兵術之方法與態度」一文，評論德國過去的軍事教育說：「普魯士之軍事教育，即能完全越過此兩方面（即由科學的觀念到統帥術，由曉暢真理到實行真理——浴日註）之遠距離者。例如一八六六年普魯士之前衛的指揮官，雖皆初出學校，而處理戰役諸事件，極爲恰當而有生氣，其所作爲，皆當時一般人心目中祇有戰場宿將始能勝任者也」。這是說「實際教育」的效果。普克爾將軍亦說過：「欲使將校具有應用理論知識之能」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以便原料的運進，及出品的輸送。

以上便是 國父「擴充軍備的計劃」。亦即整軍建軍的基本計劃。記得 國父說過：「現共和組建，須以兵力為保障，昔南非洲有某某共和國，以無兵力，卒至被人吞併，可見共和國，無兵力亦不足以救亡」（見共和須以兵力為保障演講詞）。又說過：「國事未定，則吾人須有不可悔之實力，質言之，即是武力，如何創有組織或駕馭原有之師旅，繼續以敢死得力之同志為本位，然後堅固不搖，戰勝一切」（致鄧澤如同志書）。再說過：「世界中的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爲力湊合而成，人爲的力量，可以巧奪天工，所謂人事勝天，這種人爲的力最大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包括兵力——浴日註），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民族主義）。于此可見建軍的重要，建軍應先建國，惟今後建軍的武力，則不能爲軍閥利用，以與帝國主義結合來作威作福，禍國殃民，一定要使其成爲全體國民的武力，正如北伐宣言上說：「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于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于此時乃能告厥成功」。至於今後建軍的方針，自要進而從事于現代化軍備的建設，即以建設機械化部隊與強大的空軍爲中心，并加緊化學戰備（國父稱毒氣爲「毒藥」——見民族主義）。至於擴充海軍，亦不可忽畧。因我國過去的海軍建設，實是幼稚，尤其自經此次抗戰損失之後

一切均要從頭做起，雖說建設海軍比陸空軍困難，一來時間要長，二來需費特大，好比一艘主力艦，在戰前的物價約需一萬萬元，一艘重巡洋艦約需三千萬元，一艘潛水艇約需二百萬元。一個軍港的建築費起碼要數千萬元，以至數萬萬元。海軍下級軍官的養成，總要經過八年的訓練，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置之不顧，我們應認清我們是一個海岸線綫長，華僑散佈全球的國家，我們爲掌握制海權，爭取海防的安全，及保護華僑的安全，我們將來仍得分期來建設我們強大的海軍。

國父于民元四月辭臨時大總統後，漫遊各省，途經福建，備受各界歡迎致詞說：「此次到馬江船政局，荷局長沈君希南盡禮歡迎，邀觀製造輪機鐵骨鍋爐等廠十餘所，乃知從前船政締造之艱，經營之善，成船不少，足爲海軍根基。惜乎甲申、甲午兩次挫敗，兵船燬失殆盡，而滿清政府既不能整頓於前，復不能補救于後，一蹶不振，日趨窳敗。今幸民國光復，此任屬之沈君，沈君在歐美學習製造有年，辦理必能稱職。且當時此局係沈君令祖文肅所創設，從此沈君繩其祖武，勉力而行，興船政以擴海軍，使民國海軍與列強齊驅并駕，在世界羣島一等強國」。

此外 國父在中國國民黨綱上（十三年八月廿九日公佈）規定有：「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改爲徵兵制度。……同時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士兵之經濟狀況。……施行軍隊中之農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嚴定軍官之資格，改革任免軍官之方法」，這也是屬於軍政興革要項。亟待分別實施。

又 國父子民十一年目擊軍閥各據一方，擁兵作亂，認爲欲謀中國的和平統一，必須先行裁兵

，而安插被裁之兵的政策，便是化兵爲工。曾在上海發表兵工計劃宣言，以爲號召說：「軍興以來，兵額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來自民間，爲不法武力所驅使，非其本意，一旦淘汰，使之驟失所業，亦所未安，宜以次悉改爲工兵，統一編制，一切如舊，收其武器與其工具，每日工作，約六小時至八小時，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事。工兵月餉，較現時倍加，將并月餉百元以上者加之，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則其工作所生產之純利，以一半歸於國家，以一半歸於工兵，論人數均分，自無差等。如此則一轉移間，易戰事爲工事，兵不失業，無挺而走險之虞，工事日繁，有生產發達之象。然後善收外資，投之實業，以起積年之疲弊，謀社會之繁榮，轉危爲安，悉繫于諸」。并先後發表有「實行裁兵宣言」，「裁兵之重要處置與方法」，及「和平統一化兵爲工」等演說詞，作積極而普遍的主張，雖然，這個主張，以當時軍閥的勾心鬥角，各懷鬼胎，未能實行。但是 國父這個政策，實爲一個解決戰後復員問題的良好政策，使被裁的官兵不致流浪失業，或挺而走險。上次歐戰後，歐美各國就是先驅的實行者，國父說：「這次歐美聯軍一共有幾千萬的兵，不到一二年之後，大半可以裁去的道理，便是用這個安插的方法。本大總統這次回粵化兵爲工，便是利用歐戰各國裁兵的方法」（見和平統一化兵爲工演講詞）。那麼我們將見這個政策又實行於我們此次抗戰復員之時了。

(註一)：國父革命軍步兵編製(其餘炮兵重兵(代騎)工兵輜重車，機關槍，甲炮車未定。至于人數定實，官數可酌量再加。)

六人	爲一伍	兵數	六	官	○
六伍	爲一列	全	三六	全	一
三列	爲一連	全	一〇八	全	四
六連	爲一營	全	六四四	全(附二人)	二一
六營	爲一團	全	三、八八八	全(附二人)	一二九
三團	爲一旅	全	一一、六六四	全	三八八
三旅	爲一師	全	三八、九九二	全	一、一六二

參考書：徐慕蓮先生譯：「戰爭論」(天文台版)。李麥麥先生譯：「世界第二大戰的戰備問題」。(商務版)

五・決勝精神力

孫武子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又說「殺敵者，怒也」。再說：「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拿破崙說：「戰爭成功四分之三，依于精神要素，而依于物質之情況決定者，不過其四分之一」。

克勞塞維茲氏說：「精神力爲軍事最重要因素之一，戰爭全部因素無不受精神力所貫注，而爲其操縱」。

哥爾茲將軍說：「殲滅敵人之戰鬥員，其價值較消滅敵之勇氣爲小，失敗主義者若充斥於敵之全軍，則勝利，即在吾人之眼前矣」。又說：「征服敵人，並不求悉數殲滅之，而求粉碎敵軍各個對於勝利之希望」。

福煦元帥說：「我欲爲勝者，必須保持戰勝敵軍之精神力，指揮官必須將此精神貫注於自己之軍隊，故指揮會戰者，乃粉碎敵之精神力，以至於最高度之謂也」。又說：「必勝之意志，乃

勝利之第一條件，兵卒應以此爲第一要義，同時指揮官亦必須以最高之決心，貫注於每一個兵卒之精神中。

從以上諸名將的格言看，我們可歸結說：精神重於物質。軍人不明乎此，固不配參加戰爭，更不配參加革命戰爭，這是兵學上「永久不變」的原則，任何人都不能推翻的。

國父是中國現代革命戰爭的指揮者，自然不會忽畧了這個重大的原則。當民國十年取道廣西北伐，師次桂林時，爲振作全軍的戰鬥情緒，強化全軍的精神力量，於翌年一月集合當時所統率的滇、粵，讀各軍將校給予剖切詳明地演講：「軍人精神教育」，這一部演講詞，爲國父重要的遺教，在世界兵學上實具有不朽的價值，另成一新體系，雖名軍人精神教育，實包括一般的哲學思想與倫理思想，不特可作爲革命軍人的基本教科書，且可作爲一般國民身心修養的座右銘。

一、精神

重於

物質：

蔣百里先生說：「在軍事教育上本來有兩種方法：一種叫做「外打進」。

一種叫做「裏向外」。「外打進」的方法，就是從外表儀態的整齊嚴肅，行動必須規矩矩（孔子教顏淵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爲求仁之目），以浸潤之，使心志和同，養成紀律。至於「裏向外」的方法，這是拿破崙所發明的，教育方法是啓發其愛國心，自尊心，使人人樂於爲國犧牲，但外表則不甚講求，故帽子不妨歪戴

，軍禮不必整齊，然而實際作戰，便能得到非常的成績。當法國在大革命時，人民不管自己對於槍會不會開放，但是一聽到「祖國危險了」的口號，成千成萬的人便自動的拿起槍桿上前線與敵人作戰。法國有一張圖畫，是紀念革命時代人民愛國的心理，其圖爲一家族，有絕美的太太，有極可愛的小孩，同男人正在一桌吃飯，忽然門口飛進一張紙條，紙上寫了「祖國危險了」幾個字，於是男人就放下飯碗奪門而出，踴躍赴戰場應敵。那時法國四面都滿敵人，而且敵人的軍隊都經過長期的訓練，論武器亦較法國民軍優良得多。但是法國民軍作戰的精神，個個勇敢非凡，所以在拿破崙未出世之前，法國一個國家，已經可以抵抗全歐洲的敵人」（註一）。考 國父研究拿破崙兵術，最有心得，那麼他的倡導軍人精神教育，也許受到拿破崙「裏向外」的教育方法的影響吧！原來精神與物質是不可分的，是可以互相影響的，兩者的比較，精神是活的，是可變的，物質（武器裝備）是死的，是不可變的。換言之，精神力量是無窮的，不是用數字所得而計算，物質力量是有限的，可以用數字正確的計算出來，而且創造物質是人的精神，使用操縱物質也是人的精神，故在戰爭上精神比物質爲重，也就是說明精神教育比物質教育爲重，固然一國軍隊的精神力與物質力兩者優越爲上，但德國以物質條件最優良的國家，其野戰教令尙有這樣的指示：「無論物質技術如何優勢，而人的精神力，仍爲決戰的要素」。至於物質缺乏的國家，其軍隊更應注重精神，以補物質的不足，自不待說。 國父致力國民革命，他一面統率劣勢裝備的軍隊，以與優

勢裝備的敵人搏鬥，另一面又看到將來對外的抗戰，因為國內產業的落後，勢必同樣以劣勢裝備的軍隊，與優勢裝備的敵人作戰，乃特別注重于軍人精神教育的倡導，確是看穿戰爭決勝的機微。

國父還部遺教，洋洋萬餘言，分爲五課，第一課講精神教育。第一節精神教育之要旨上，開宗明義說：「欲身任非常之事業，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爲何，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也。……於革命精神何自來耶？是在精神教育。諸君之所以爲軍人，非爲有軍人資格乎？非爲會受軍人教育乎？否則執路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如何其可！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即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須臾弗離，雖至造次顛沛之間，守而勿失，夫然後可以爲軍人，可以冒革命，可以卜成功」。第二節精神之定義上說：「人爲萬物之靈……凡非物質者，即爲精神。……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在中國學者，亦恒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爲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即成死物矣」。更在第三節精神與物質力量之比較上，舉例證明精神力爲戰勝之本說：

「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既如前述，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質方面，若言北伐，非曰槍枝務求一律，則曰子彈必須補充。此

外種種武器，亦宜精良完備，一若不如是，則不能作戰者。自予觀之，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何以知其然也？試以武昌起義爲例，當日滿清之武器，與革命黨人之武器，以物質能力論，何啻千與一之比較？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乃敢毅然爲之者，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黨人名冊亦被搜獲，兵士之入黨者，均爲查悉，悉數調往四川，僅有炮兵、工兵兩營，留駐武漢，其中同志尙多，有熊秉坤者，新軍中一排長耳，見事機已迫，正在大索黨人，若我不先發制人，終必爲人所制，置於死地而後生，等死耳，不如速發難，因將此意告諸同志，僉以無子彈對，後懇秉坤向其友之已退伍者，借得兩盒子彈，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所恃者，僅有此數，槍聲一起，炮兵營首先響應，瑯激、張彪、相繼逃竄，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槍彈非不備也，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瑞激日商諸某國領事，謂若湖北有事，請其撥兵艦相助，布置如此周密，兵力如此雄厚，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諸君試思，兩盒子彈，至多不過五十顆，即使一一命中，殺人不過五十人，能打破武昌乎？余以爲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即精神也。準是以觀之，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於武昌一役決之。此第就本國而言，已有此先例。試再言外國：前此意大利人，有加利波利地

者，爲一有名之革命家，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當其渡海攻城也。以一千人與三萬人敵，相持四五月，卒由他路抄襲入城。此在戰畧上，戰術上，無論如何，均不能取勝，而事實之相懸若此，將謂以少勝衆乎？直乃精神勝物質耳。又如日俄戰爭，俄國兵力，多於日本數倍，未戰之先，咸以爲日本之於俄國，不啻羶羊豕以犒虎吻，必無幸免也。何以戰爭結果，卒至俄敗而日勝？此無他，俄之敗，敗於無精神，日之勝，勝在有精神而已。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牛之力量大於童子，人皆知之，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東則東，西則西，牛乃不能奮其一角一蹄，以與童子抗，且甘心俯首，惟命是聽者，是因何耶？童子有精神，牛無精神，故童子之力雖不如牛，而能以精神制馭之，此尤顯而易見之例也。

「依上述各例，則知此次北伐，亦惟恃有精神，即能制勝，可勿問敵人子彈多少，我之子彈多少，但問我之精神如何。若無精神，子彈雖多，適以資敵，一旦臨戰，委而棄之，非爲敵人運輸戰利品乎？故兩國交戰，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即在撲滅敵人之精神，而使失其戰鬥能力。兵法有言：「攻心爲上，攻城次之」。攻心者，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取得城池，猶其後也。去年粵軍回粵，既下惠州，桂軍聞風破膽，先自逃竄，我乃兵不血刃，長歌而入廣州城矣，此足見物質之不可恃。所謂「兩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其道何在？精神爲之也」。

二、軍人
的精神
力：

其次，第五節軍人之精神說：「現時之中國，前途險象，較前尤甚。南北分立之局，擾攘數年，未能統一。北方內部且復各樹私幟，如張作霖、曹錕、吳佩孚等，割據地盤，擁兵自衛。政治之壞，過於滿清，人民轉徙流離，如在水深火熱之中，待援孔亟。援之之法維何？須用革命之手段。用革命之手段，則須負革命之責任。革命之責任者，救國救民之責任也。……諸君固皆曾受軍事教育者，當知軍人之職志，在防禦外患，在保衛國家，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為完全獨立之國家，不受外國之箝制？以予觀之，固猶未完全獨立也。國會雖選出本總統，而內亂尚未戡定，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尚居多數。北方已喪失對內之資格，而正式政府，又未經各國承認，當此危亡絕續之交，非先平內亂，而以革命救國不可？以革命救國，非有革命精神不可。無革命精神，則為法屬之安南，終非勢力屈服。有革命精神，則為英國之愛爾蘭，終得崛起自治。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益知革命精神之必需。印度久受英國壓迫，近亦引起反動，其革命思想與前不同」。跟着又畫龍點睛地指出軍人精神的要素有三：「一曰智、一曰仁、一曰勇。而欲使之發揚光大，非有決心不能實現。但所謂決心者，須多數人同心，合力成東而為之，非少數人所能集事」，「用能剷除反革命勢力，改造中國為「新世界」。不待說，這是全書的骨髓。茲將第二課分析智，第三課所分析仁，第四課分析勇，第五課分析決心，摘要列表如下：

智

定義——有聰明、有見識，又須合乎道義，並隨時進步。

〔由於天生者——與「生而知之」畧同。

來源——由於力學者——與「學而知之」畧同。

〔由於經驗者——與「困而知之」畧同。

別是非

〔軍人所以衛民，利於民則為是，不利於民則為非。軍人所以衛國，利於國則為是，不利於國則為非。

軍人之智——明利害——利害與是非相因而至

〔是則為利，利可為，非則為害，害不可為。

識時務

〔如摘已熟之果，既至其時，應手而落。如由高山推石，乘勢便利，毫不費力。

〔知己彼——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定義——博愛——公愛——己飢己溺。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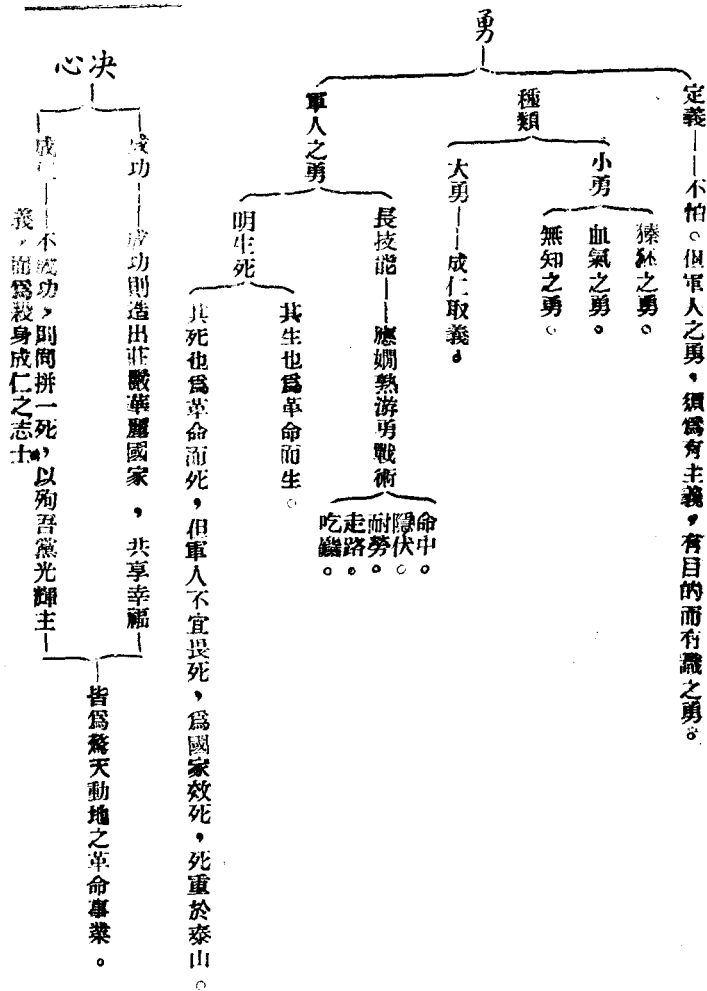
種類

救世之仁——宗教家之仁。

救人之仁——慈善家之仁。

救國之仁——愛國志士之仁。

軍人之仁——實行三民主義，救國救民。



我們從以上的表解，已可明瞭智、仁、勇及決心的淵源問題，關於智、仁、勇，有人說是淵源於兵聖孫子，始計篇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也有人說：淵源於哲人孔子，中庸載：「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考孫子兵法爲軍事哲學的書，中庸爲政治哲學的書，如果說它純粹地淵源於孫子，却缺了「信」「嚴」兩項，說它直接地淵源於孔子，却又用在軍事上，其實，國父對這兩部名著都很有研究的，故較不如說他是參証他們兩家的學說而立論。此外國父又參照新兵學加上決心一項，建立他軍人教育理論的新體系，且其內容又是全新的，不同於孫孔及其他兵書上的解釋，這是他的獨創，——站在革命戰爭的立場上來獨創的。

智、仁、勇是中國軍人的靈魂，亦即中國軍人的武德，它以仁爲中心，故可使智勇不致陷入歧途。所以缺乏仁之武德的軍人，決不是完全的軍人，如果他擁兵的話，必變爲軍閥，戰爭的話，不是爲爭權奪利而戰爭，便是爲優畧而戰爭。這都是國父所極端反對的。所以我們中國軍人的武德，不是日本的武士道（軍人精神）所可比擬。因爲日本的武士道僅偏重於勇智，丟了最重要的仁，故日本的軍隊只就變成「海盜」，「流氓」，拿破崙亦談魯勇而不談仁，他說：「爲大將應具之種種理想的才能，極難具備於一人。實際上爲大將最需要者同時最能揚名者，即智勇雙全。若有勇而寡智，則往往不慎，而生意外，若有智而少勇，則意想之事，往往不能作」。

所以他在歐洲極其聲名亦只盡其蹂躪的能事而已。舉世奉爲兵學大師的克勞塞維慈氏，他對於智勇分析得頗爲深入，值得錄出，以供參考，他說：

「戰爭是危險事業，軍人最重要的性質是勇。

「勇有二：一是對於危險的勇。一是對責任的勇。所謂責任，或指對人而言，或指對自己的良心而言，現在先論第一種對於危險的勇。

「這種勇又有二：有永久的勇，有一時的勇。永久的勇是不怕危險，這或出於稟賦，或成於習慣，或由自輕其生命而然。要之都屬於恆態的，永久的。一時之勇，則由積極的動因而生，若名譽心，愛國心，或其他種種感奮所激發。這種勇，要不外乎精神運動，是屬於情之領域，所以是一時的，而非恆態的。

「這兩種勇的效果不是很容易分別的：恆態的勇，以堅固態，所謂習慣成自然，無論何時，不離其人的。感情的勇，以猛烈勝，但不拘於時，前者生節操，後者生英氣，所以必須兼有這兩者，其勇方可說是完全的」。這是關於勇的方面。至關於智及智勇的關係，他說：

「若進一步作完全的要求，則軍人不可不有智力。

「戰爭，是一種推測的境界，一切事物可爲軍事動作的基礎，有四分之三，常不確實

。譬如在雲霧之中，或濃或淡，惟有智力的人能判斷，從迷離恍惚中求得真像。智力平常之人或可偶然想到真像，非常勇敢的人則以勇來補其智力的不及，然綜合全體而論，其平均成績，不智的人終不能掩蔽他的缺點。又，戰爭是一種偶然境界，人生事業中，最易和意外危險相接觸，莫過戰爭。這種偶然的境遇，能使各種狀況不確實的程度增加，而事業之進步，困之越發困難。

「情況不明，預料不確，和意外的事變，常使主將發生所遇到的和所期望的有大不相同的感想。這個即刻影响到他的各種計劃，甚至因此拋棄以前策定的計劃而另擬新的計劃。但一轉瞬間這新計劃也不完全。因為戰爭狀態不是一時出現的，昨日所聞和今日不同，今日所聞又和明日不同，於是主將之心，常惶惶於所聞的不同苦悶之中。

「當此之時，而能鎮定的主將就少不了兩種性質：一是智，所謂「智」，好似行路於黑暗之中，常保一點光明而知本線在那一方向；一是勇，所謂「勇」，可使人藉這一點微弱的光明而向前邁進。法國人所謂「局面眼」（慧眼），這裏也可以說是果斷，所謂果斷，勇是他的父親，而智是他的母親。

「因為戰爭是以戰鬥為主，而戰鬥又以時間空間兩要素為體。當時騎兵的使用和急劇的決戰，一切都以迅速和適當的決斷為成功的要訣，法人形容這時間空間的目測力稱之為

慧眼。兵學者很多以這個古義來解釋慧眼，也是因為動作迫切時而能下適當的決斷，都是由運慧眼而來。例如發見適當的攻擊點等等。由此可知，所謂慧眼，不只是指肉眼，還兼指心眼。

「由慧眼乃生果斷，這果斷實是責任的勇，也可說是精神的勇，法語稱為心勇，以其由智所產生。但是這勇雖生於智，而勇之動則不由智而由於情。有智的人不必有勇，多智的人往往臨到難關失却決斷力，我們是常見的。所以智是不可少的，但必須兼有勇之情，而勇若沒有情也不能維持繼續的。大凡人當危急之秋，與其謂為智所左右，不如說是為情所左右。

「臨事苦於疑慮，又恐陷於猶豫，則果斷最為必要。世俗常以冒險大膽，暴虎馮河的英雄稱為果斷，吾人斷不同意。凡勇的行爲若不具完全理由，決不許以果斷稱之。這個完全理由是由智力而得。前論果斷生於智而成於勇，固無疑議，然兼有智勇尚不夠，還要兩者能互相融洽才會產生第三者的果斷。有一種人，其心目很能解釋困難問題，而其平生處事也很有勇，但一旦臨到果斷的機會，忽然失却了能力，這是智力不融洽所致。然無智的人，遇到艱難決不會深思熟慮，幸而成功，實是例外」。(註二)

克氏於最後歸結說：「人類精神作用表現在軍事上，要而言之，無一不是智力的作用，無論

那一軍事動作，必須有適合其動作的智力，而後方能勝任。由此觀之，臨戰而能奏功，自下級以至上級，都不可不要智力，都不可不具有特殊的天才，不過，將帥所需的精神和智慧比較多些。但却忽畧了軍人應具的最重要的博愛之仁，并且強調「戰爭爲暴力無界限的行」，因此便造成德國今日軍人的暴虐無道，弄得全歐爲之烏烟瘴氣，暗無天日。這不能不說是克氏戰爭理論的一大缺陷。至於蕭米尼、威利遜、杜黑、福煦、魯登道夫等兵學家的著作，亦犯有同樣的缺陷。只可做爲侵畧者的工具。并可見 國父兵學思想的不同凡響，和我國兵學的特色。本來仁的戰爭觀念，在我國古代有一種說法——「不殺人」，叫做仁。其實這是錯誤的，它的出發點，應爲撥亂反正，濟弱扶傾。又如司馬法的仁本篇說：「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可也」。國父的所謂仁，應爲如此，所以他仁的戰爭觀念，決不是「不殺人」之仁，也不是春秋時代宋襄公之仁——「不重傷，不擒二毛」，因爲這是婦人之仁，是小仁，非仁者之仁，更非 國父之仁——「救國救世之仁，實行三民主義之仁，站在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立場上，縱是澈底滅敵亦所不惜，這是我們應該澈底認識的。

總之， 國父所講的智仁勇，是三位一體的，缺一不可。尤以仁爲中心。殿之以決心，以確實行發揚智仁勇的原動力，益見完整而有力。就是說軍人如果缺乏決心，則智仁勇，也是徒然，但決心生於判斷，判斷要迅速，決心亦要迅速，不可猶豫與躊躇，這樣方能作適切的自處——「

不成功即成仁」，但一人的決心，力量有限，須有集團的決心，犧牲一切，效命疆場，方能發生偉大的效果。

固然，智仁勇為每一個將校所必備，就是每一個士兵也要具備，不過在程度上各有差別而已，譬如就一個步兵師說：師長要有師長的智仁勇，旅長要有旅長的智仁勇，團營長要有團營長的智仁勇，推而至於連排長及士兵也各要有其智仁勇，而決心則不分上下彼此，一律皆然。然後才能分別完成自己的任務。至於程度的差別，固與先天有關，尤繫乎後天的學習與修養，所以我們革命軍人決不可自暴自棄，應不斷地努力學習與修養，提高自己的智力、仁力、勇力，及鍛鍊自己的決心，這樣就是士兵亦可成爲將校。今後的革命戰爭，所課於我們軍人的精神力太大了，因爲它是戰爭決勝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們必須經常努力提高我們的精神力，我們有了至高至大的精神力，自可以發敵取勝，建功立業。

（註一）見蔣百里先生：「兵學革命與紀律進化」演講詞。

（註二）見黃譯：「大戰學理」（國防版）。

六・戰爭與政治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是克勞塞維慈氏的名言，根據克氏的意見，戰爭為政治的手段，用以達到政治目的之手段，其性質又依於政治的標準而定。但降及今日，因為戰爭的本質變化，政治的本質變化，政治對於戰爭的關係亦因之變化，所以在戰時應以戰爭為主體，政治居于輔助的地位。內政與外交為政治的兩大形態，戰爭的勝利，有待它的輔助。反之政治對於戰爭不能輔助，甚至立于衝突的地位，勢非使戰爭陷于失敗不止。

在這裡，我把 國父關於戰時的政治言論，分爲內政與外交兩方面來說：

一、內政

方面：

戰爭所要求于內政，最要緊的是舉國團結一致。因為舉國上下及各黨各派團結一致，才能以構成強大的力量，協助戰爭，支持戰爭。國父在謀建設須掃除舊思想的演講詞上說：「中國現在時勢，尚在危險時代，如各自爲謀，不以國家爲前提，無論外人虎視眈眈，瓜分之禍，危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謀，而離心德，

亦難有成。是中國欲建築鞏固之國家，非萬衆一心，羣策羣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覬覦」。致岑春煊

協力討袁電說：「大敵當前，而內紛不息，事甚無謂，文已電同志，俾泯猜慮，併求事實上之一致。……務嚴約束，勿復生釁，庶幾同心戮力，共伸天討」。所以在內政上就應設法促成全國的團結一致，能如是，則不會發生無謂的磨擦，以相抵銷，更不會被敵人挑撥離間，以分裂力量了。

至于「足食」，「足兵」，亦為戰時內政的要項，關於足食方面，留待下篇論述。關於足兵方面，尤以在國防工業落後、武器生產未能自給的中國，更見重要。因為國防工業落後，則軍隊的裝備亦必後落，以這樣的軍隊與優勢裝備的侵略者作戰，則所需要兵員必比敵為多，其傷亡率亦比敵為大，自然所需補充的兵員亦因之加多，倘若補充的數量與傷亡的數量不能成爲對比，發生兵員不足的現象，必將使戰爭無從繼續維持。但爲足兵，就要實行 國父向所主張的徵兵制度爲，收徵兵制度的效果，就要建立良好的徵政。此外，戰時的內政對於一切是要實施統制的，國父說：「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建國大綱）。又說：「譬如今次之世界大戰，凡參加此戰爭之國，無論共和君主，皆一律停止憲政，行軍政，向來人民之行動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皆削奪之，甚且飲食營業皆歸政府支配，而舉國無有異議，且獻其生命爲國家犧牲，以其目的在戰勝而圖存也」（孫文學說）。所以我們今後在戰爭中，爲求「戰勝而圖存」，大家就應忍耐地在政府的統制之下而生活，只有國家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自由，且應爭相獻身爲民族國家而奮鬥犧牲。

二、外交

方面：

外交與軍事本為「難兄難弟」，在戰爭未爆發之前，外交可代替軍事，戰事一經爆發之後，外交就要協助軍事。上次歐戰方酣的時候，兩菲斯末賽將軍會說過：「這次戰事不僅是單純的武力角逐，如果我們要把握住最後勝利，我們必須運用外交，如運用其他國力一樣。當我們協約國達到滿意的和平時候，我們最高理想的實現，不僅依賴軍事行動，還須憑藉外交利器」。戰時外交的重要性，于此可見。在普法戰爭中，普之勝法，固勝於色當一役，亦由於俾士麥和英聯奧及對俄調協，使法國陷于孤立，以協助軍事。在意大利統一戰爭中，意之勝奧，雖勝於蘇費立倭一役，亦由於加富爾運用外交手段。聯法，與英合作，及對普親善，得以全力對付奧國。這便是兩大顯著的例証。

國父也是一個大外交家，彼在推翻滿清的革命戰爭中，奔走海外，聯絡友邦，用能博得國際同情，取得國際援助。嘗在美國聞得武昌起義的捷訊，本擬由太平洋濟行返國，親與革命之戰，繼念「吾黨盡力于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更大也」（自傳）。遂起程赴英，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絕止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銷各處英屬政府之放逐令，以便歸國。三事均得英政府允許，方取道法國歸國。民國以來，于討賊各役中，亦莫不運用外交以佐之，藉孤奸賊之勢，並取得國際間的援助。此外，民十二收回關餘，以充北伐經費，北京使團竟令外艦集中省河，百端恫嚇，國父從容應付，騰理力爭，卒達目的。

民十三廣州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利用商團公然叛變，英領且為張白，致國民政府以哀的美敦書，阻止政府戡亂，國父乃向英政府提出抗議，卒使英艦不敢妄動，而英領亦因此去職。還有民十二由于聯俄的成功，因而取得蘇俄的援助，促進北伐初期的發展。

以上是 國父外交戰的成功。其次 國父欲本其外交知識經驗，著作「外交政策」一書（見三民主義自序），雖未完成，而關於外交言論，散見遺教中者頗多。民族主義說：「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槍炮，他們用槍炮來，我們還知道抵抗，如果用外交，祇要一張紙和一枝筆，用一張紙和一枝筆亡了中國，我們便不知道抵抗，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中國雖然派了代表，所講關於中國之事，表面都說為中國謀利益，但是華盛頓散會不久，各報便有共管之說發生，此共管之說，以後必一日進步一日，各國之慮心積慮，必想一個很完全的方法來亡中國，他們以後的方法，不必要動陸軍，要開兵船，祇要用一張紙和一枝筆，彼此妥協，便可以亡中國。如果動陸軍開兵船，還要十天或者四五十天，才可以亡中國。至於用妥協的方法，祇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簽字是一朝，所以用妥協的方法來亡中國，祇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國家，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譬如從前的波蘭，是俄國德國奧國瓜分了的，他們從前瓜分波蘭的情形，是由於彼此一朝協商訂妥之後，波蘭便亡。照這個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這是說軍事與外交同屬

于政治的手段，而其「不戰而屈」的外交手段，尤爲可驚。夫在和平統一化兵爲工的演講詞上，就革命戰爭中的外交說：「革命的成功與否，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起來，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交力幫助武力好像左手幫助右手一樣，從前美國獨立，革英國的命，所以成功的原因，一半固然由於本國武力的血戰，但一半可以說是由於法國外交力的幫助，如果專靠武力，決計是難於成功的。譬如洪秀全革命，由廣西打過湖南、湖北，以至建都南京，而終不能成功的原因，大半是由於外交失敗——沒有外交力的幫助（致招英國戈登幫助滿清親自帶兵去打蘇州——浴日註），所以革命的成功與否，外交的關係是很重大的」。至軍事的勝利亦足以給予外交有利的影響，見自美洲致鄧澤如先生的信說：「經羊城一役之後，外交亦易入手，弟曾着人直說美國政府，皆大表同情。今已使人往英，以說彼中權要，想必能得當。法國政府，則向已有通情者也。如是吾黨今日可決英美法三國政府必樂觀吾黨革命之成事，則再舉之日，必無藉端干涉之舉，且必能力阻他國之干涉也，此又外交之路，因羊城之影響而收效果者也」。國父猶爲外交至上論者，即他認爲一國對外應先用外交手段，然後用戰爭手段，亦足見維護國際和平的精神。中國存亡問題一文說：「國家既不可以長從事於戰爭，而對外之關係則有日增無日減，不能用戰爭以求達其存在發達之目的，則必求其他之手段，所謂外交者由是發生。凡國家之國策已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於戰爭，戰爭既畢，仍當復於外交之序，故國與國遇，

用外交手段與用戰爭手段，均爲行其政策所不可闕者。然用外交手段之時多，用戰爭手段之時少，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軌則，戰爭之手段者，不得已云者，外交手段既盡，無可如何之謂也」。這個外交思想，正淵源於孫子的「是故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于此我們要注意的，不論在平時或戰時，爲求外交的勝利，必以國內的一致團結爲基礎。國父說：「夫欲求外交之勝利，必先謀內政之修明。今內部既分裂如是，何能得國際之承認。故自軍政府成立以後，非外人不承認軍政府，實又鑒于軍政府內部未組織完全，西南各省又未協同一致，故始終未通告各國，求其承認耳。……倘西南各省，一致擁戴軍政府，承認大元帥，則國內團結鞏固，對外發言效力自強，斷不患外交團之否認，及交涉之不勝利也」（六年致貴陽王文華、劉顯世電）。又說：「且人心渙散，政府不願督撫，官吏不顧人民，人民亦不知國家爲何物，所以外交失敗。現在中華民國，人民政府官吏，皆是痛癢相關……所以外交不致失敗」（見建設之兩大要務演講詞）。不特爲我們此次的抗戰外交痛下針砭。

國父戰爭思想的本質，是革命的，自然他戰時外交的本質也是革命的，卽他爲促進革命戰爭的勝利，而運用外交，并不同帝國主義者的運用外交來實現侵略的目的。但談到運用外交，首先就要確立「以不變應萬變」的外交方針，澈底地改變過去「遠交近攻」，「以夷制夷」的舊習。

國父於此已爲我們確立了兩個基本的外交方針：一曰聯絡素日親厚與國（即「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一曰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見民元國民黨宣言說：「外交方針，則可約畧言之：一曰聯絡素日親厚與國；今國於世界，孤立無助，實爲危象。故必當聯絡素日親厚之與國，或締協約，或結同盟，或一國，或數國，俱爲當時之妙用。一曰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吾國現勢，非致力對外之時，故宜維持列國對我素持之主義，使之相承不變，而得專心於內政之整理」。亦即前者爲與利害相關的國家結成同盟，以取得經濟上及軍事上的援助。後者爲維持中立國家素日對我所採取的公正主義，如尊重我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維護我國之反抗侵略運動等，使之相承不變。這兩大方針，固可適用於平時，亦可適用於戰時——削弱敵人，增強自己，促進戰爭的勝利。今日我國在抗戰中所採取的外交方針就是繼承 國父這兩大方針。

其次，爲使戰時外交運用得宜：第一、要明瞭情況： 國父說：「欲運用外交，非具世界之眼光，不足以盡其用，中國向來外交，無往而不失敗，蓋以不知國際上相互之關係，一遇外人虛聲恫嚇，即惟有讓步之一法，是誠可傷心者也」（民元國民黨宣言）。所以辦理戰時外交，就要洞識當時各國千變萬化的實情，及國際間複雜錯綜的利害關係，爲此，必須設置外交情報網，以求「知己知彼」，然後才能確立有效的對策。

第二、要爭取自主：一國的外交，不能媚外，也不必畏外，不能追隨人家，也不可附庸人家

，它是要獨立自主的，尤以戰時的外交貴乎獨立自主，即「致人不致於人」，方能操縱自如，實現預定的企圖。國父說：「吾國外交本非自主，向落人後，而不能研究其利害與得失之所在，殊可嘆也。今後吾國之外交，對於海軍國，固當注重，然對於歐亞大陸之俄德二國，更不能不特殊留意，不宜盲從他國，致爲人利用也」（註一）。又說：「中國一般人普通人的心理，以爲外國人廢除不平等條約，必須要中國有力量，如果中國一日沒有力量，那些舊約便一日不能廢除。這個道理，殊不盡然。要問外國能不能廢除舊條約，就要問我們有沒決心去力爭，如果大家決心去力爭，那些條約便可以廢除。好像最近的華盛頓會議，外國人便主張放鬆從前的凱馬契約。外國人也主張實行，我們中國人都是不爭，都是不要，假若全國國民一致要求，這種目的，一定可以達到的」。〈見國民會議爲解決中國內亂之法演講詞〉。這是教我們要樹立自主的外交的。我國在此次抗戰中的外交，由於能够爭取自主，堅持自己的立場，不肯中途妥協，故能造成今日更有利於我抗戰的國際形勢。

第三、要把攬利害：國與國間的分合，純以利害爲前提，其合由於利害的相同，其分由於利害的衝突，絕不是感情道義所可維繫，必須有了利害的結合，然後才有感情道義可談，尤以戰時外交爲然。英國人說：「英國無永久之友，亦無永久之敵，只有英國之利益」。孫子說：「用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真是道破外交的眞形。國父對此亦有深刻的認識

，他說：「夫兩國之同盟，非以其條約而有致者也。真正原因，乃在其利害之共同。英國本無急切與德國衝突之必要，業如前章所已言。此次交戰，既不能達摧抑最強國之目的，英國爲保其存在，不得不棄其欲得之利益，以保其所已得之利益。而德國苟以英國之助，得其所欲得之利益，即爲利害共同，而聯盟之事自生。譬如意大利，本與法爲連屬，且得法之助以立國，而一旦爭非洲北岸之地，與德澳有共同利害，則加入三國同盟以敵法。及其戰土以後，利害與奧衝突，而對法緩和，則又復活其同種之感情，與建國之舊恩。故知國防恩怨要約，兩不可恃，同種云者，亦不過使利害易共同之一條件，其他感情上之事實，隨時而變更，未可規律久遠之政策也。欲兩國之真正利害，相同必能有割捨之決心。所謂協調者，各着眼于永久之計劃，於將來兩國發展所必須者以交讓行之。……世人有疑此者，請視日俄。日俄以傾國之力相搏，事纔十載，日德之貨戰，距樸資茅斯條約，不過八年有餘。當俄媾和之際，吾在東京，親見市民狂熱，攻小村議和特使爲賣國，以桂總理爲無能，焚警舍，擊吏人，卒倒內閣，輿論未聞有贊成和議者，曾幾何時，而人人以狂熱歡迎俄之捷報。夫感情隨事而逝，隨時而生，一國當時之外交，必決諸恒久之利害，決不能以暫時之感情判之。以日俄之前事，可以判英德之將來矣」（中國存亡問題）。

再說：「大凡立國必須與利害相關之國，攜手進行，方能進步，利害不相關之國，縱彼欲與我相親，但是不可以與之親近者。從前滿洲政府……不知利害相關的道理，純是遠交近攻之政策，

：一經親俄，天山以西帕米爾高原一帶，已非我有，延至今日，蒙古又將不見了，這就是利害不相關之國相親的害。……今日謀鞏固中華民國，必須注重外交」（見學生類以革命精神努力學問演講詞）。所以我們在現實的外交上，切不可受人家花言巧語所愚弄，必須張着利害之眼，掉着利害之舌，揮着利害之腕，去應付一切，才可以迎刃而解，尤以戰時外交爲然。惟對於「濟弱扶傾」的革命外交，又當別論。

最後，近世以來，世界各國的善用外交者，莫如美德，英國在第一次歐戰中，既把德國的盟友意大利拉過來，又使中立國的美利堅加入戰團，並肩作戰，卒收戰勝之果。但在此次歐戰之初，因對蘇外交的失敗，使德國得以大膽發動西線之戰，而自己便罹重大的損失，戰禍蔓延至今未止。德國在此次歐戰中，既聯意以制法，又聯蘇以避英法兩國而作戰之言，而得集中力量解決西線各國，旋轉鋒攻蘇，欲求速戰速決，但因赫爾飛英的失敗，遂使攻蘇之戰陷於長期的苦境。于此，雖是見戰時外交運用的困難，但根本的原因，實由她們外交方針的錯誤，弄至無法補救。我們今後的對外戰爭是革命的，革命的戰爭是必需的，革命的外交也是必成，用外交可以促進戰爭的勝利，用戰爭亦可以來促進外交的成功。惟戰時外交，正如國父說：「外交微奧，有應事發生者，未可預定，亦難說明」（見民國黨宣言）。那麼我們就要把用兵的原則——「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應用到外交上來了。

（註一）見蔣介石先生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

七·戰爭與經濟

經濟是軍事的基礎，足以決定戰爭的持續，亦足以決戰爭的勝敗。其表現于現代戰爭上，固十足強烈，就是表現於古代戰爭上，亦相當顯著，「孫子兵法」一書是兩千多年前的著作，其中說：「凡用兵之法：騎車千輛，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惟現代的戰時經濟則非古代局部的動員可比，它是要澈底地由平時經濟體制改編為戰時經濟體制，即整個的動員，才能適應現代戰爭的要求。

在 國父遺教中，關於戰時經濟的言論很多，我在這裏僅就其四大項，如財政、工業、糧食交通等加以論述：

一、財政

方面：

近代戰爭是金錢的大量需要者，也是金錢的大量消費者，簡直成爲天文學的數字。像普法戰爭，雙方的戰費共計美金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俄戰爭共計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一次世界大戰共計二〇八、三〇八、〇〇〇、〇〇〇元。所以近代戰時的支出，尤其是長期戰爭的支出，不是任何

財政學者于事前所夢想得到的，這個原因是由于：一、動員人數的龐大，二、軍需品消耗的增加，三、物價的上漲，及舉辦戰時各種新事業。

德人說：「戰爭的決勝，是決定於劍，也是決定於金，尤其是金在戰爭的進行中及終結時更表演着不可輕視的作用」日人中澤三天在他著「戰爭」一書曾慨嘆道：「日俄戰爭。……日本的正金準備，僅有一億元餘，所以在講和會議上，不能強硬主張我意志的原因，不外爲財政困難所壓迫，真的金錢爲戰爭所不可缺之一」。所以一國或一政黨爲達到他戰爭的勝利，在財政上就不可不作充分的準備，與臨時的多方籌措了。

國父在倒清的革命戰爭中，對於財政的解決方法，主要的是募捐、借債及發行軍用票，就中以獲得華僑的捐助爲大。當時 國父奔走海外，或親向華僑勸捐，或命各同志勸捐，所謂「多一分經濟，多一分預備」的名言（見致李源水、鄭螺生的「捐手札」），便是發於此時。在財政上有此源源收入，用能支持各同志及革命軍的活動，而取革命的成功。

國父於推翻滿清之後，不久，又逢帝俄虎視眈眈，欲併吞我外蒙古，這時 國父極力主張對俄抗戰，並主張「鑄幣革命」，即以「紙幣代金銀」，以解決對俄抗戰的財政困難問題，見於紙幣革命一文說：

「第一，行錢幣革命以解決財政之困難。今日我之不能言戰者，無過於財政困難。自南

北統一後，謀借外債，以救我金融之恐慌。然至今六國之借款無成，若一有戰事，則更復無望。然則就財政上言之，無論有戰無戰，財政問題之當解決，必不容緩也。文於謀革命時，已注意於此，定為革命首要之圖。乃至武昌起義，各省不約而同，擬而北軍贊和，清帝退位，進行之順適，迥出意外。故所定方畧，百未一施，民國大定後，財政雖困，以為可以習慣之常理法以解決之，便不欲以非常之事而驚國人也。不圖借債無成，而俄禍又起，存亡所關，不能不出非常之策以應之也。錢幣之革命者何？現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為我國今日必較昔日窮乏，其實不然，我之財力如故，而出產有加，其所以成此窮困之象者，錢幣之不足也。錢幣為何？不過交換之中準，而貨財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未發達之國，多以金錢為之，其在工商已發達之國，財貨溢於金錢千百萬倍，則多以紙幣代之矣，然則紙幣者，將必盡奪金錢之用而為未來之錢幣。如金銀之悉往昔之布帛刀貝之用。……由此觀之，紙幣之行用有方，流弊不生既如彼，而利益之大又如此，况值非常之變，非先解決財政問題，必不能言戰。乃有熱血之士，徒責政府之無能，而不為設身代想，殊不共諒當局人為難之甚也。當此強鄰迫處，實行瓜分之秋，非徒大言壯語所能抵禦，非有實力之對待不可，是宜政府與人民同心同德，協力進行錢幣革命，以救今日之窮。在政府當速行立

本來在歐羅巴各國早已實行幣制革命了，而國父這個偉大的主張，直至民國廿四年方得實現。即所謂「法幣政策」的成功，（禁止紙幣兌現，白銀收歸國有，並規定以中交農四行的鈔票爲法幣），此次抗戰所以能够持久至今，端賴財政支持的力量，而財政之所以能够支持，要在實行法幣政策的結果，亦即實行國父素所主張「錢幣革命」的結果。

其次 國父對於戰時財政的重視，見於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的演講詞說：「廣東財政，向來收入，每年有三千多萬，我們現在的辦法，只要恢復從前的財政狀況，便可養十幾萬兵，現在更有新計劃，可再增加三千萬，但有三千萬，又新加三千萬，合起來便有六千萬。所以廣東這個省分，是很富的，是很可有爲的，這項新財源，弄成了功，甚麼事都不准挪用，專拿來做北伐的軍餉，將來得了江西、湖南、湖北、江蘇，十幾萬兵還不够用，還要多擴充，如果不能發展，就是這十幾萬兵還不得了，不要三年，便要消滅，所以現在的局面，便是我們生死的關頭。再就廣東局面說，東江殘敵很容易肅清，北江又打勝仗，此後外部，完全不成問題，所有的還是內部問題。這個內部問題，簡單的說，就是財政問題」。見于銀行最高的信用是「現兌」的演講詞說：「大家知道這個政府在廣東，現在有許多軍隊，軍餉都是不足。政府因爲担负這樣多的軍餉，財政是很困難的，在這樣財政困難的時候，政府怎麼樣還能够發起開辦這個銀行呢？這個銀行之所以能够開辦，就是因爲借了外國資本一千萬，因爲有了一千萬的外國資本，這個銀行才能够成

立。……我們這個銀行所發行紙幣的信用。……要維持這種紙幣的信用，便要商界工界農界和政界軍界同力合作，來培植這種雞鵝和各種的發達，便可以生出許多雞蛋和新數，這種雞蛋和新數，又可以再做種子，再生出雞鵝來生蛋，再長成新谷來做米，這種發生不絕的生長，是常無止境的，是毫無限量的，到了那個時候，軍界和政界便不怕窮，工商界和一切人民，便不怕沒有資本，這個銀行更是利益無窮」。

此外 國父對於合理的戰時增稅，亦主張實行，見于民生主義上說：「國家直接徵稅，所謂多取之不為虐。從前舊稅法，祇是錢糧和關稅兩種，行那種稅法，就是國家的財源，完全取之於一般平民。資家對於國家，只享權利，毫不盡義務，那是很不公平的，德國英國老早發現這種不公平的事實，所以他們老早便行直接徵稅的方法。德國政府的歲入，由所得稅和遺產稅而來的，佔全國收入約自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英國政府關於這種收入，在歐戰開始的時候，也到百分之五十八（按英國在歐戰期間，所得稅收入增加七倍，遺產稅收入增加二倍——浴日註）。美國實行這種稅法，較為落後，在十年之前，總有這種法律，自有了這種法律以後，國家的收入，便年年大形增加，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專就所得稅一項的收入而論，便約有美金四十萬萬」。國父這個主張，直至此次全歐抗戰爆發之後，方樹立了「直接稅體系」，使租稅重心，由間接稅移於直接稅，使財政的收入，日益增加。惟因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淪于敵手，影響稅收的損

失，真是不可言喻。

依于上述，是見 國父對於戰費的籌措，是以發行、增稅、募債及募捐四項為主，正和現代各國所實施的戰時財政策，不謀而合，依此而行，實足以解決戰時財政的困難，支持長期的抗戰。此外，關於管理外匯，亦為戰時財政的要項。外匯是國家對外的購買力，為從外國獲得物資，若要維持此種購買力。管理外匯的主要目的有三：（一）增加國家外匯的收入，（二）使國家持有的外匯只能應用於輸入戰時國家最需要的物質，（三）控制本國貨幣對外國貨幣的匯率。雖說我們在 國父遺教中，未見他提到戰時的外匯管理，但他在民族主義中，却倡導打破帝國主義所加於我們的匯率壓迫。并在錢幣革命一文上主張勿再將金銀輸出海外，在銀行最高的信用是一現兌一的演講詞上，主張應由國家銀行辦理匯兌事業。

于此應注意的，就是因為戰時社會的動盪，物價的高漲，生活的困難，每易使財務人員營私舞弊、貪贓枉法，故必須澈底厲行 國父向所主張肅清貪污的政策，使財界明朗化，做到涓滴歸公，并維持人民對於政府的威信。魯登道夫將軍說：「人民既為國家而犧牲其金錢，則戰時公債一絲一毫，應用之於公，而不應用之於私，應用之於國事，不應以之肥私囊。若有侵吞公款之行為，應實于政府自為盜賊，掠奪民財，其應防止之也，自不待論。世界大戰中德人之應募公債者，既為犧牲一己，原期於維持民族生存，而其結果何如乎？由世界大戰之經驗觀之，惟肅清政

治上之弊竇，然後能保國民之一致團結，此在財政上尤爲重要」。

二、工業

方面：

工業在現代戰爭上，其重要性並不亞於財政。像上次世界大戰時，德軍所以能屢建奇勳，主要的是得力於本國工業的發達，德國的領土雖然狹小，但在很小的領土之內，能建立龐大的軍隊，竟能抵禦協約國的進攻達數年之久，就是賴于德國工業上能够供給德軍所需要的步槍、大砲、機關槍、飛機和技術。又像美國在這次世界戰中，能够成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也是由於平時工業的發達，一到戰時，便能大規模動員，生產大砲、飛機、坦克等精銳武器，來源源接濟各同盟國作爲反攻軸心國家之用。

我們知道：工業與科學有如子母的關係。根據外國科學家對中國的批評，說中國是一個古代科學先進的國家——印刷術的首創者，指南針的發明者，應用火藥的先驅者，後因忽視觀察與實驗的方法，而一般士大夫階級皆趨於利祿，爲科學功名所引誘，遂使科學不能發達，科學既不發達，則機器工業便無從建立，只得長期停留于手工業的階段。說到中國之有新式工業，不過是百年來的事，即自海禁大開後，纔輸入西方工業的機器與生產方法，惟因受帝國主義的摧殘與束縛，至今尚未發達，自然談不到獨立應付現代的國際戰爭。國父對於發展中國工業的倡導，早已發端于上李鴻章書，其中有說：「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民國以來，更倡導不遺餘力，看他的三民主義及實業計劃便可知

道。國父對於發展中國工業，自舉國內資本、工具及人才的缺乏，認為應求助於外國。實業計劃上說：「歐美二洲之工業發達，早於中國百年，今欲於甚短時期內追及之，須用其資本，用其機器，若外國資本不可得，至少亦須用其專家發明家，以爲吾國製造機器，無論如何，必須用機器以補助中國巨大之人工，以發達無限之富源也」。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一文上說：「吾國既有天然之富源，無量之工人，極大之市場，倘能藉此時會，而利用歐美戰後之機器與人才，則數年之後，吾國實業之發達，必能並駕歐美矣」。然此非我的創舉，外國亦復如是。國父也說過：「俄國之製造廠、兵工廠，皆用英美人爲之，日本意大利國，其關於製造事業，亦多由英人主持」（見歡迎外資與門戶開放演講詞）。惟主權要操之於我，然後方不受外人的宰制。國父說：「鄙人主張用外人辦理工商事業，及訂立一定之期限，屆期由我收贖，并非利權永遠落於他人之手也」（全上）。又說：「萬衆一心，舉國一致，而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博大規模，宿學人才，精進技術，爲我籌劃，爲我組織，爲我經營，爲我訓練，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必能立於國中，我實業之人才，亦同時並起，十年之後，則外資可以陸續償還，人才可以陸續成就，則我可以獨立經營矣」（孫文學說）。可是欲發展工業，必須同時發展礦業，如煤鐵等，因爲煤鐵向爲近代工業的兩大原料，沒有鋼鐵，則陸海空兵器，無從製造，沒有煤炭，則一切軍需工廠的機器亦無從發動。至於石油的開採亦至必要，倘若缺乏石油，則在工業上所生產的兵器如飛機

、坦克、兵艦等，均無從活動，變成死物。英國某海軍大臣說過：「英國之生命在海軍，海軍之生命在石油，反對此者非英國人」。福煦元帥亦有一句名言：「一滴石油一滴血」。可見石油的價值。所以 國父在實業計劃上，亦計劃大規模發展礦業。本來 國父還個發展中國工業的計劃，是倡導于上次歐戰方息之時，距今已二十餘年，但實際上隨時可以斟酌進行，我希望能够實現于此次世界大戰之後。又，這個計劃雖是平時工業建設的計劃，但平時工業，爲戰時工業的基礎，亦即戰時工業的準備，平時工業尤以重工業沒有發達，一遇戰時的動員就要捉襟見肘，無從大量而迅速生產軍需用品，以應戰爭的請求。現在歐美各國的戰爭工業大半寄托於和平工業業之中，因爲和平是可以改鑄爲戰爭工業的，例如商船廠可以改造兵艦，汽車廠可以改造飛機發動機，火車廠可以改造大炮，普通機器廠可以改造槍步機關槍，造紙廠可以改造拋射藥，顏料廠可以改造炸藥，造幣廠壓片廠可以改造槍炮彈壳等。可見 國父的提倡實業，實具有軍事的眼光。

其次 國父於民元十一月間在安慶演講道：「軍器一門，我們從前所用是弓箭刀槍，試問現

代戰爭，能用不能用？試問現代戰爭，不用外國槍砲，能勝不能勝？」在民權主義上說：「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槍，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砲相抵抗」。又在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一文上說：「此次歐戰，塞法二國多輸送金錢於美國以易武器一。又說：「此回歐戰各國以製造戰用品而擴張其機器千百倍於平時」。又在民族主義上說：「德意志聯邦，成立

之初，本來是農業國，後來變成工業國，因為工業發達，所以陸海軍也隨之強盛」。這都是說戰爭與兵器的關係，戰爭與工業的關係，真的中國因為工業尚未發達，所以反映於這次抗戰中，就是我軍武器裝備的落後，且所用的新武器，如飛機、戰車、重砲等，竟全部仰給於外國了。

英國富勒將軍在他有名的「戰爭的機械化」一文上，對我國曾作了這個觀察：「在中國也是這樣，他們對於西方文化的反抗並不是反對工業化，既在是要將工業化與西方的剝削分開，大家都知道中國的煤藏是極富的，到了法律與秩序建立，天然資源發展之後，中國必將工業化，結果他的主要戰鬥力也必會機械化的」。這是很對的，我們為使國軍的戰鬥力成為機械化，就應努力完成 國家工業革命的主張，在內地，把我們的工業中心建設起來。

三、糧食

方面：

中國近代的糧食問題，到了這次抗戰爆發之後，其嚴重性實遠勝空前未有的紀錄，使我們親歷目睹糧食在戰爭上所佔地位的重要。

本來糧食影響於戰爭的軍大，由來已然。唐將張巡孤守睢陽，屢戰屢勝，終因「羅掘俱窮」，為敵所破。在此以前，像歷史家陳壽所撰諸葛亮傳說：「亮復出散關，關陳倉，曹真拒之，糧盡而還。……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得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尚在此以前，像孫子主張：「因糧于敵」，及強調：「軍無糧食則亡」。至如拿破崙的天才，

當作戰的時候，遇有提到糧食問題者，必痛斥以「不要談糧食」，因有這種謬誤，遂不免慘敗於莫斯科的飢寒交迫之中。以上係就軍糧而說，至於民糧亦有同樣的重要，德國在上次歐戰中，因糧食的恐慌，弄到人民個個吃不飽，引起國內發生糧食暴動，革命風潮日益擴大，便養成德國戰敗的一大因。有人說：「糧食是決定戰爭支持力的因素，又是決定戰爭勝敗的要素，實非虛語。」

中國號稱地大物博，向來以農立國，對於糧食本可自給自足，可是因為地利未盡，及運輸不便，而人口却一天一天的增加，故年豐而太平時，尚可自給，一遇饑歉而戰亂時，就不免發生恐慌。考我國糧食仰給外國由來已久，如唐書陳懋仁的「泉南筆記」，就有洋米輸入的記載。近百年來，因為天災人禍的交煎，尤以帝國主義的侵略，使我糧食愈不能自給，每年仰給於洋米為數甚巨（如民十九年竟達二千萬石左右），那麼到了戰時，益以敵人的封鎖，災區的擴大，農村勞力的減少，產米之區的淪陷，更當不堪設想了。國父早見及此，於上李鴻章書中，已提出「地盡其利」的「農政有官，農有學，耕耨有器」，為「富強大經，治國大本」。於民生主義上又強調：「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吃飯問題」。又說：「吃飯問題就是最重要的民生問題，如果吃飯問題不能解決，民生主義便沒法解決」。可見他對糧食問題的注意。又在民生主義裡說明糧食與戰爭的關係，曾舉上次歐戰的德英等國為例證：「未經歐戰以前，各國政治家總沒有注意到吃飯問題，在這十年之中，我們留心歐戰的人，研究到德國為甚麼失敗呢？正當歐戰劇烈的時候，

德國都是打勝仗。凡是兩軍交鋒，無論是陸軍的步隊、炮隊和騎兵隊，海裡的驅逐艦、潛水艇和一切戰鬥艦，空中的飛機、飛艇，都是德國戰勝，自始至終，德國都沒有打過敗仗，但是歐戰結果，德國終歸於大敗，還是甚麼原因呢？德國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吃飯問題。因為德國的海口，都被聯軍封鎖，國內糧食，逐漸缺乏，全國人民和士兵都沒有飯吃，甚至於餓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終歸失敗，可見吃飯問題，是關係國家之生死存亡的。……德國的糧食，在平時已經是不夠，當歐戰時候，許多農民都是去當兵士，生產減少，糧食更是不夠。所以大戰四年，歸到結果，便是失敗，由此可見全國的吃飯問題是很重要的」。

國父跟着又指出中國糧食問題的嚴重性說：「像要中國四萬萬人都是足食，提到這個問題，便是很重要，便不容易解決。到底中國糧食是够不够呢？像廣東地方每年進口的糧食要值七千萬元，如果在一個月之內，外間沒有米運進來，廣東便馬上鬧飢荒，可見廣東不够飯吃的。這是就廣東一省而言，其他許多省分，都是有和廣東相同的情形。至於中國土地的面積，是比美國大得多，人口比美國多三四倍，如果就吃飯這個問題，用中國和美國來討論，中國自然比不上美國。但是和歐洲各國來比較，德國是不够飯吃的，故歐戰開始之後兩三年，國內便有飢荒。法國是够飯吃的，故平時不靠外國運進糧食，還可足食。用中國和法國來比較，法國的人口是四千萬，中國的人口是四萬萬，法國土地的面積，為中國土地的面積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中國的人口比法國

是多十倍，中國的土地是比法國大二十倍。法國四千萬人口，因為能够改良農業，所以得中國二十分之一土地，還能够有飯吃。中國地土面積比法國的大二十倍，如果能够倣效法國來經營農業，增加出產，所生產的糧食，至少要比法國多二十倍。法國現在可以養四千萬人，我們中國至少也應該可以養八萬萬人，全國人口不但怕飢荒，並且可以得糧食的剩餘，可以供給他國。但是中國現在正是民窮財盡，吃飯問題的情形，到底是怎麼樣呢？全國人口現在都是不够飯吃，每年餓死的人數，大概過千萬，這還是平時估算的數目，如果遇着水旱天災的時候，餓死的人數更是不祇千萬了。

可是爲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尤其戰時的糧食問題，其政策不外是增加生產及實行統制，關於糧食的增產，國父於民生主義中指示我們五大應解決的問題，如機器、肥料、換種、除害、防災等問題，此外如製造運輸等問題，雖不屬於增產的範圍，因同列一起，合併摘要臚列如下：

一、機器問題——用機器耕田，生產可加一倍，費用可輕十倍或百倍。用機器抽水。來灌溉田地，非常便利。

二、肥料問題——用化學方法來製造肥料，用電來造人工硝，用水力來造便宜的電，農業生產，自然可以增加。

三、換種問題——用交換種子方法，使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產力可以增加。

四、除害問題

- (一) 植物的害：用科學方法除去稅草和利用稅草。
- (二) 動物的害：用國家力量，研究除害蟲方法。

中國製造方法——

- (一) 曬乾。
- (二) 罐鹹。

五、製造問題

外國製造方法——將食物煮熟，或烘熟，製為罐頭。

六、運輸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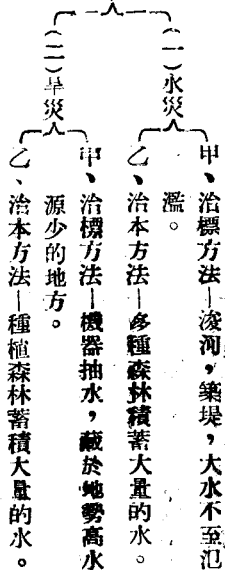
運輸不便
的損失

中國財富無形中因運輸不便而消耗者甚大，過廣的生產成為廢物，如極重要的糧食，時常因為運輸不通，而使吃飯問題，不能解決。

解決運輸
糧食問題

- (一) 水運——恢復運河制度，原有的修變，未有的開闢。海上運輸，更是要用大輪船。
- (二) 鐵路——到處聯絡起來，各處人民，更有便宜飯可吃。
- (三) 車路——窮鄉僻壤，通自動車，以救鐵路之窮。
- (四) 挑夫——雖然不經濟，但自動車不能行的地方也可以補救。

七、防災問題



此外，國父在地方自治開始實行辦法中所規定的第六事：「墾荒地」，即擴大耕地的面積，這也是增加糧食生產的一法。像英國于上次歐戰，為增加國內農業的生產，於一九一七年宣佈了一個開拓三百萬英畝耕地的計劃，行之頗收成效，于一九一八年又樹立了一個增加二百六十萬英畝耕地的計劃，政府把土地供給地方自治團體去開墾，連都市周圍的空地、城市裡頭的網球場、草地、高而夫球場、牧場和公園，也都由人民的團體去開闢做菜圃。在此次抗戰中，由于奉行國父「墾荒地」遺教的結果，亦增加了不少糧食。

其次說到糧食的統制：國父在實業計劃的糧食工業部門上指示我們，關於食物的貯藏及運輸、分配及運出等，都要由「中央機關管理」，於地方自治實行辦法第二事的「立機關」中，又主張設置「糧食管理局」，實行糧食公賣，其具體辦法是：「糧食一類，當由地方公局買賣，對於人民需要之食物，永定最廉之價，使自耕自食者之外，餘人得按口購糧，不準轉賣圖利，地方

餘糧，則由分屬轉運，售賣於外」。于此足證明 國父對於糧食的貯藏、運輸、分配運出及價格等都是主張採取統制政策的。這樣，在戰時自可以使有無相濟，節約消耗，杜絕地主奸商的囤積，及流入敵人之手了。現代世界各國在戰時都是採取糧食統制政策的，上次歐戰中各參戰國是如此，此次歐戰中各參戰國也是這樣。 國父關於上次歐戰德國統制糧食的敕果，在孫文學說上會指出如下：「近代國家之行政中政策者，以德國之組織為最進步，而此次歐戰一開，則德國海面被英封禁，糧食時虞竭乏，社會忽起恐慌，人民備受種種之痛苦。至兩年以後，乃始任巴特基氏為全國糧食總監，巴氏乃用科學之法，以經理糧食，而竭乏之事，始得無虞，恐慌之事漸息，而人民之痛苦亦漸減，由是德國乃能再支持二年之久，否則早已絕糧而降服矣」。于此亦可見 國父對於糧食統制政策的研究。

以上兩大糧食政策，實為解決戰時糧食問題的良法，但要樹立基礎于平時，以便戰時的動員尤以統制政策的推行，更有待于調查統計的完成，即對於人口與糧食的生產消費有全盤的調查統計，及執行人員的潔己奉公，忠於職守，然後才能作有效的推行。

四、交通
方面：

現代的交通，可以分為三大系統：一為陸上交通，一為水上交通，一為空中交通。現代交通工具用於陸上的是汽車火車，用於水上的是輪船兵艦，用於空中的是飛機飛船，種類繁多，不勝枚舉。交通設備為軍事行動的生命線，在現代

戰爭上，如果沒有良好的交通設備，則動員集中及軍需補給，均不能迅速，雖有衆多兵員，因關山連阻，必不能應時作戰，就是對於某戰場某戰線的救援，亦不能應時到達。德國國防科學家班斯氏說：「戰爭本爲敵對國家集中武力，變爲動作，所以戰爭在最高程度上言之，實爲「交通問題」。然爲使交通適應戰時的需要，則須實行交通統制政策，即一面統制物資的交通，另一面統制交通工具，使一切都在國家機構的支配管理之下，以便軍事的行動。

中國今後的戰時交通問題，亟待解決的就是國際交通線問題。因爲在今日的世界，任何國家都不能如中世紀一樣的經營領國經濟，尤其在產業未發達以前的我國，更要注意國際交通線的開闢與維護，以便戰時輸入一切爲我所無的物質。國父在實業計劃中已注意於此，我們應加以研究才可。以下我且就鐵路公路與戰爭的關係分述之：

自鐵路發明以至第一次歐戰爲止的戰爭，叫做「鐵路戰爭」的時代，因爲在這個時代軍隊的運輸，是以鐵路爲主的。毛奇將軍算是運用鐵路的一個大戰略家，他在作戰的時候，常用一張歐洲鐵路地圖爲指揮的根據，他所以能够以六個禮拜解決了普奧問題，兩個月進入巴黎，完成德國速戰速決主義，實得力於鐵路的運用。所以他認爲「建造鐵路，比砲台格外重要」。反觀我國此次的抗戰得助於鐵路亦不鮮，像粵漢路、湘桂路，迄今仍表演着重大的作用，數年來，當我長沙韶關每瀕於危急的時候，我軍都得鐵路的利用來作適時的救援，便促成每次所謂「湘北大捷」和「粵

北大捷」。

在「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戰備問題」一書上有說：「在備戰的整個系統中，運輸問題佔了很重要的地位，第一是鐵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證明了鐵道在現代戰爭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幾乎每一次大的戰爭無不利用鐵路，不同的僅是程度的差別。顯然的，如果沒有鐵路，像總動員、兵力集中這一類重要的任務，便無從執行，輸送各種軍用品以滿足軍隊的需要。在鐵路交通方面也應該有相當的準備，使其能夠不間斷的工作，這就是說，當鐵路為敵人破壞了之後，應該很快的恢復工作」。又可見鐵路在戰時的重要性。

國父自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目視中國交通的落後，又認為交通上最要緊的是鐵路，所以於辭去臨時大總統之後便專任全國鐵路總辦職務，從事全國鐵路網的興築，以發展中國實業。後值歐戰方息，又擬借外資建築十萬英里鐵路，內分（一）中央鐵路系統，（二）東南鐵路系統，（三）東北鐵路系統，（四）擴張西北路系統，（五）高原鐵路系統，及（六）創立機關車、客貨車、製造廠（見實業計劃），這真是一個大規模的鐵路興築計劃。

可是國父的倡導興築鐵路，並非單純為發展中國實業計，同時亦為鞏固國防及供軍事上之用。民元國民黨宣言上：「急辦國有鐵道：鐵道建築與實業固有莫大之關係而於軍事上國際上亦屬重要，應酌量現狀，審其緩急，急辦國有鐵道」，在於道路為建設着手之第一端的演講詞上說

一：

況以國防而言，以政治而言，以文化而言，鐵路實有極大之關係。現在以國防不固，俄在北滿及蒙古進行，日本在南滿洲進行，英國在西藏進行。我國兵力若能保護邊國，斷無此等事實。然我國果無兵乎？則何以籌借外債，遣散軍隊？既遣散軍隊，人人皆知兵少，然用兵之處，則併一兵而無之，此何故哉？此即交通不便之故。又如現在俄國政府建議由恰克圖修至張家口一條鐵路，籌備已久，轉眼即見事實。試問俄國政府向我提議之後，我政府將何以應付？將推之乎？抑承認之乎？我若及早自修，俄政府即無所藉口，而可以保全我之領土。且聞我政府提出此意後，法國資本家皆欲附股，將來籌款必易。我國若能趁此自修，法資本必投資於我，此必然之勢。至慮將來資本家限制勞動社會，此層不必過慮。鄙人之鐵路計劃，係預定四十年後，由國家贖回，仍為國有。不過開辦之時，由民間與外國借款。政府每年，仍可得利，鐵路公司，并不能專利贖回，如美國之有鋼鐵大王，及鐵路大王等名目，至於以保全領土而論此事，尤不可緩。東三省非我之完全領土乎？現在何以入於日人於俄？此無他，即因俄有東清鐵路，日有南滿鐵路故也。在中國之貧弱必自擴充鐵路的演講詞上說：「至強國一節，譬如中國有二百萬兵，分佈二十餘省，平均每省不過十萬人，以三十萬兵，即可以制我而有餘，蓋人以三十萬兵敵十萬，非敵二百萬也。其勢可斷言矣。且交通不便，則運兵運餉，俱不能速，及其到時，則大事去矣，故名爲有兵二

百萬，與無兵同，若助以鐵路交通，有兵百萬已足。蓋運輸便利，不過數日可到，分之雖少，命之則多，以百萬敵三十萬，加以主客異勢，蔑不勝矣。故鄙人以爲欲謀強國，亦必自擴充鐵路始也」。

可是，在 國父這個鐵路計劃未完成前，中日戰爭，便轟然爆發了。在這次抗戰中，我們所有的鐵路，雖比 國父當時已增加若干路線，但仍感到內地鐵路的不够應用，並且根據這次抗戰的經驗與教訓，當我攻勢的國防力量未建設完成以前，今後對於鐵路的建築應以內地（豫定的戰時首都）爲輻輳點，而向外發展，千萬不可置輻輳點置於沿海邊疆，即暫不可發展沿海邊疆的鐵路交通，以便戰時敵人的內侵。惟是爲我戰時之助的國際交通線——非假想敵國進兵的方向，則應作有計劃的建設。至於鐵軌的廣狹，尤宜全國一致，但對於假想敵國的鐵軌，則須絕對避免其廣狹相同。車廂的門窗和車輛的長短寬度，亦須以便利各種兵器的運輸爲原則。

其次， 國父對於公路的興築，亦擬有「碎石路一百萬英里」的計劃（見實業計劃），英人溫特林漢近著「二次大戰新戰術」一書說：「有時候戰爭的變化，與交通上、工業上的變化是平行的。比方有一個時期，軍需的供給以及軍隊的調動，完全是靠陸路或海洋的。其後又有一個時期，便全靠鐵路運兵，這叫做鐵路的戰爭。現在我們更有摩托化的戰爭，那就是無論軍隊裏的任何供給及運輸，都完全依靠摩托機械。不明瞭這樣變化的，便是一種致命傷的錯誤。在一九四〇

年五月間，有些法國的軍官判斷：德國不能從色當突破法國的主力線，因為那地區很少鐵路，後來事實證明：德國的軍隊正從此地侵入法國。在色當及麥茲的主力線為德國突破之後，有些法國人非常奇怪！其實是他們尚未明瞭摩托化戰爭已替代了鐵路戰爭」。這是說由於機械化部隊的應用，已使「鐵路戰爭」發展為「公路戰爭」了。于此亦可見 國父早已着眼於摩托化戰爭。不過在我機械部隊未擴張以前，對於公路的輻輳點，亦應同鐵路一樣的置於內地，首先完成內地的通於軍用的公路網。

總之，在經濟戰爭上，其勝敗的關鍵，全繫於國內經濟基礎的鞏固與否？故基本的辦法，就是發展本國的財政工業、農業、交通事業及其他一切經濟事業，達到適應戰爭的要求，至好就是能够自給自足。此外關於對敵經濟作戰，在 國父遺教中，我發現他提過三大方式：一為經濟封鎖，一為經濟不合作，一為經濟絕交（均見三民主義）。經濟作戰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海軍封鎖，即直接封鎖敵的海洋交通，以斷絕其對外貿易關係，但須有強大的海軍來執行。上次歐戰開始之後，英國即以海軍主力控置北海，封鎖了斯十的那維亞半島，使貨物不能經過荷蘭、丹麥與挪威流入德國，舉凡是否戰時違禁品，只要是輸入德國的，或德國輸出的，都被沒收，使德國經濟起了極度恐慌。同時德國對協約國，尤其是英國，也施以經濟封鎖的報復，但因德國海軍力量不夠，不能同英國一樣的作水上封鎖，只是實行深水封鎖，即以潛水艇封鎖英國，使英國亦受很

大的痛苦。到了這次歐戰，英國對德又以強大的海軍做水池不通般的封鎖着德國，德國亦用潛水艇襲擊英輪，同時雙方又採用各種方法來破壞敵方的封鎖，例如德國利用西班牙的中立地位轉運由美洲輸入物資，英國實行武裝護航，以防禦潛艇的襲擊。說到我國此次抗戰，以我海軍力弱，對倭未能實施經濟封鎖，反被她封鎖着我們全部的海岸，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唯有講求反封鎖的對策了，除開關西北和西南的國際交通線，以供對外貿易外，就是爭取物資，即突破敵人封鎖線，或賄賂敵人以輸入必要的物資，及嚴禁我必要的物資資敵。其次，關於經濟不合作與經濟絕交，根據這次抗戰的經驗，應在敵的佔領區內秘密指導我民衆，作大規模的展開，使敵的開發建設計劃無從進行，即依武力而作經濟的剝削，無法實現。至於組織經濟游擊隊派人敵佔領區內，破壞其掠奪式的經濟實施，以紛擾敵人「以戰養戰」的陰謀，同時又派遣空軍用流不息的轟炸其經濟設施，以至敵國的經濟中心，均為重要的經濟作戰方式。在今後的革命戰爭中，我們應展開經濟作戰，制敵死命！

- 參考書：德著日譯「納粹戰爭論」（育生版）。吳光傑先生著：「國民軍事教育常識」（中華版）。楊丹馨先生譯「未來的新戰術」（商務版）。梁淑德先生等譯「二次大戰新戰術」（大時代版）。

八·戰爭與宣傳

思想戰是宣傳與戰爭的合流，像尚書所載「湯誓」及「泰誓」，如果不是後人僞撰的話，那末戰爭的使用文字宣傳，早已開始於數千年之前。本來中國是世界上一個首先發明「攻心爲上」的思想戰的國家。像孫子兵法上所說的「內間」、「反間」，都是思想戰的角色，他們的任務是造謠中傷，挑撥離間，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漢高祖包圍項羽於垓下時，令軍皆作楚歌，以粉碎楚軍的鬥志，使項羽聞之大驚失色，演成烏江自殺的慘劇。諸葛孔明平南蠻時，採用馬謖提供的「攻心」戰術，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使其心服不敢復反，因以造成北伐得無後顧之憂，這都是歷史上思想戰的顯例。此後，像唐駱賓王的討武后檄，石達開的討清檄，洪秀全的誓師檄及布告天下檄，都是千古名文，字字句句如電如磁，至今讀之，猶足令人興起！

在歐洲方面，關於思想戰的歷史，據彪黑(Buchen)氏說：「自有印刷術發明以來，各國爲取得輿論對本國的有利，用印刷的戰爭，是和武力戰爭並行着」。腓特烈大上於亞勒西亞之戰，先發宣言，然後開戰。拿破崙對於思想戰更爲注意，曾說過：「一個新聞社的力量，勝於一個師團

的兵力」。

自由戰爭，同盟國設置印刷所於戰地，用以印刷發行戰地新聞。

但思想戰的起了劃期的發展，即是上次歐戰期間的事情。在這次大戰中，協約國與同盟國互相報復以思想戰，尤以協約國方面爲大規模，不斷地針對着德國的弱點作巧妙而猛烈的進攻。於此，我們要知道的：指導德國上次歐戰的戰爭原理，是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這一部書實爲兵學聖典，尤以克氏的學生毛奇將軍運用它的原理原則，一戰勝丹，再戰勝奧，三戰勝法之後，更爲世人所崇拜。但在今日看來，它只是一部武力戰的書，並不是將武力戰、政治戰、經濟戰、思想戰治於一爐的全體性戰爭的書，（按克氏雖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注意到外交的作用，但他却未提及內政應如何配合戰爭的方式，更未提及對敵國應如何進行經濟戰，思想戰，他僅是詳論武力戰而已）。德國軍人受了這一齣的薰陶，應用於上次歐戰，自開戰後，屢戰屢勝，使協約國對德國始終未能越雷池一步，但因忽畧於經濟戰，思想戰，遂致人心動搖，革命爆發，終爲協約國所屈服了，魯登道夫將軍接受了這個失敗的教訓，并清算了克氏的理論，於一九三五年發表他「全體戰爭」，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兵學傑作，成爲德國現代戰爭思想的主流，希特勒受它的影响，在這次歐戰中，一變上次歐戰的作風，特設置宣傳部，用戈培爾博士爲部長，以主其事。希氏曾說過：「我們的戰爭，要從內心摧毀敵人，讓他們自己征服自己，精神的混亂，情緒的衝

突，躊躇不決，突如其來，這些都是我們的武器」。雖說他是爲優畧而用思想戰，但亦可見思想戰的重要了。

國父致力革命運動，自然不會忽了祖傳「攻心爲上」的思想戰，他認爲思想戰與武力戰、政治戰、經濟戰有併用的必要，故自中法戰爭之後，一經決定「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便「以學堂爲鼓吹之地」，此後更以集體的力量的力量，擴大宣傳，其對象是滿清，是國內同胞，海外僑胞及國際人士。在瓦解滿清的內部，並喚醒國內同胞海外華僑，及取得國際人士的同情和援助。

國父在中國革命史一文上關於宣傳的經過說：「余於乙未舉事廣州，不幸而敗，後數年，始命陳少白創中國報於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以後，革命宣傳驟盛，東京則有賤元成、沈蚪齋、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主張革命，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爲書，尤爲傳誦，國內外出版物爲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及同盟會成立，命胡漢民、汪精衛、陳天華等，撰述民報，章太炎既出獄，復延入爲。民報成立，一方爲同盟會之喉舌，以宣傳正義，一方則力闢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之謬說，使革命主義，如日中天，由是各處支部，以同一目的，發行雜誌日報書籍，且以小冊子秘密輸送內地，以傳播思想，學校之內，市肆之間，爭相傳寫，清廷雖有嚴禁，未如之何也」。至於當時宣傳的方針，不外爲同盟會宣言上所揭舉的「一、驅除鞑虜，二、恢復中華，三、建立民國，四、平均地

權」，及民報上所標明的六大主義：「一、顛覆現今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維持世界之真正和平，四、土地國有，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六、要求世界列強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國父於此次革命成功之後，民元在北平報界歡迎會上演講說：「今日蒙報界諸君歡迎，甚幸。此次中國革命（指辛亥革命——浴日註）數日成功，皆報界鼓吹之力」。鄒編「中國國民黨史稿」上亦說：「其時不特各地本黨報紙，極力為革命宣傳，即非本黨之報紙，亦助之。遂使潛廷，草木皆兵，不日而民國告成。說者謂革命成功，革命軍隊之力爭，報紙宣傳之力爭，信不誣也」。

自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國父於每次發動討賊戰爭，亦莫不配合以「名正言順」的思想戰。尤其受到歐戰大敗及蘇俄革命的思想戰的影響後，更特別注重宣傳工作，三民主義的自序上說：「後遭國民黨交祖，同志決心從事攻心的奮鬥，亟需三民主義的奧義，五權憲法的要旨為宣傳之資，故須每星期演講一次，由黃昌毅君筆記之，由鄒魯君讀之，今民族主義適已講完，特此印單行本，以餉同志。……尚望諸同志讀者，幸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爲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期其造福於吾民族吾國家，誠未可限量也」。在民族主義上又指出：「這次國民黨所用救國方法，是注重宣傳，要對國人做普遍的宣傳」。不待說，本黨的經典，就是三民主義。

國父是一個思想戰家，也是一個天才演說家，他能出口成章，不假預備，連講二三小時，毫無倦容，并能够把對方心理，聽者莫不深受感動，至於議論精闢，尤其餘事。他在思想戰上發表關於宣傳的言論很多，現分爲三點述之如下：

一、宣傳

的效果

我們知道，一種作戰方式必有它的效果才會成立，而使用此方式者亦必求發揮它最大的效果。思想戰在下次歐戰中，算是發揮最大的效果了。今日我們讀魯登道夫將軍的「全體戰爭」一書，便可見他指出協約國方面所收宣傳效果之大，而德國因缺乏一種强有力的宣傳法門，致遭失敗。國父從思想戰的實踐中所得的

效果至大，他對思想戰的效果的認識亦至深，他說：「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又說：「國內外爲爭開國民會議，打的電報有幾千幾萬張，這種和平的爭法，好過用武力的幾千兵幾萬兵（見學生須贊成國民會議演講詞）。再說：「向軍閥去力爭，用一萬張電報去爭。……勝過十萬兵」（見中國內亂之因演講詞）。「數日前，有北京贊同葉某君見訪，於致賀廣州勝利之後，慨然謂筆墨之力，終不如槍礮之靈。實則依鄙人所見，筆墨之力，確實偉大。此次廣東之事，看來似是槍礮之功，實則筆墨之效，大不可沒。縷縷述之，事殊神妙。陳炯明之在廣州，干涉言論，無所不至，廣州報紙在暴力之下，固不敢有所主張，即香港新聞紙亦以許多障礙不克自由發揮。然而香港有畫家數人

，痛心於陳氏之作惡，相約以其擅長之藝術，描摹陳氏之罪惡，繪影繪聲，栩栩若活，市民爭相購買，或用作廣告，或代裝飾，有聚而圍觀者，有相與品題者，數月以來，以成香港之流行品，而討論之觀念，深入人心。雖陳家將到香港者，鑑於街談巷議及家懸戶備之情形，亦悚然於人心之既去。且滇軍發難，一戰而下廣州，迨陳炯明退惠州，所部猶不下一萬餘衆，乃通電獨立，或宣佈脫離關係者，即其平日認爲心腹手足之士卒，致欲負隅反攻而不解，香港畫報平日之浸潤感化，蓋深有力焉。吾人今日固不能抹殺彼討陳諸將士之功。然筆墨之權威，要亦不可否認。今茲粵中之事，二十日而解決，前十日可謂槍炮之勳勞，後十日實筆墨奮鬥之效果也（一見發揮筆墨之權威以與軍閥搏戰演講詞）。再又說：「本黨此次改組，乃以俄國爲模範，企圖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黨員協同軍隊來奮鬥，俄國以此能抵抗列強之侵迫。其時正當俄國革命初成功，而俄黨人竟能戰勝之，其原因則由黨員能爲主義而奮鬥。吾人由反對俄國各報紙所得之事實，則英兵由北冰洋上陸時，俄兵不加抵抗，自行引退，留下種種印刷品，問其何故來打俄國，列強既與俄國和好，何以今日再有征俄之舉，各國兵士，當時以爲往俄與德兵戰，不知爲與俄民戰也，以此質諸上官，上官無詞以對，兵士遂即行引退，或激成兵變，此全由俄黨員不僅能感化本國人，而且能以主義感化外兵，日本兵隊之開往西伯利亞，亦同被感動，此俄黨人爲主義奮鬥的結果」（一見宣傳主義之重要演講詞），再又說：「廣東以後把四境肅清了，或者要休息兩三個月，在這兩三個

月中，我們必須做宣傳的工夫，讓這幾十萬兵，都明白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個個白了主義之後，他們的精神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樣，他們的能力，必定同七十二烈士一樣，出去打仗，便有勝無敗，便可征服吳佩孚，否則吳佩孚的兵，便沒有分別。吳佩孚的錢多彈多，我們怎麼可以征服他呢？兵家說：「攻心爲上，攻城爲下」。能攻敵人之心，就是沒有錢，沒有彈，也可以打勝仗，也可以統一中國。所以我們要把這些軍隊都做成一種革命軍，讓到處人民都歡迎，像古人所說的：「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仁者無敵於天下」，那才算是冤枉了這幾十萬兵」（見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演講詞）。我們明乎此，那麼就應努力于思想戰線的建立和加強了。

二、宣傳

的原則

：

宣傳的原則，是思想戰的根基，有了原則，然後一切宣傳工具，宣傳材料與宣傳技術，都根據原則而妥爲配合，才會發生效果。義利情實爲最合理最切實的宣傳原則，如果運用得宜，實可以達到「攻心必勝」的目的。國父於提示我們說：「惟運動之方面，必隨時而變，先當動之以大義，不成矣，必再動之以大利。想此兩方法，兄必等已試之而無疑。然更有一法，則當動之以情誼。……用此爲游說之具，或比二者爲尤有力也」（致鄧澤如書）。其次要顧從對方的性格：因爲每一人有每一人的性格，每一羣人有每一羣人的性格，每一國人有每一國人的性格，不可以主觀爲出發點，必須適應對方的性格，然後才可以發生效果，國父於此提此我們說：「對於毫無智識的，給他一個智識是容易，

對於號稱有知識的教他判別是非利害，倒是很難。我們在這個時候，既然立了一個主義，要做指導社會的工夫，最要緊的，就是不可先拿我們的知識，整個的放上去，以為這件事，我已經明白了，他為什麼不明白，兩次說不明白，便生了氣，還是不行的。我們要曉得，羣衆的知識是很低的，要教訓羣衆，指導羣衆，或是教訓指導知識很低的人，最要緊要替他們打算，不可一味拿自己做標本。這樣的做法工夫，方才有趣味，方才得到研究的益處，方才能够感化多數的人。你看教馬的人，他怎樣能够把馬教會的？就是他在教馬的時候，他自己的意識已經先變了馬，他不是先要懂得他的意思，他是自己先要懂得馬的意思。教馬的人在馬的面前，是一點也用不得人的智慧的。如果要用人類的智慧，一定要和馬打起架來。你又看那教狗猴的人，他也是要就狗猴的性去教狗猴，不是要試人的性格去教狗猴。因為在我們看來，英國是這樣，俄國是這樣，德國是這樣，拿許多的榜樣做材料，就歸納到中國應該怎樣的本題，成一個主張，但是那多數的人，他却是不懂的，所以我們要指導多數人，是先要把自己的知識學問收藏起來，處處去順他的性，來誘起他的自覺，然後得來的結果，方能够圓滿。然後我們指導社會的目的，方能够到達」（八年六月與戴季陶談社會題）。

三、宣傳
人員的
條件

宣傳在歐美光進各國，早視為一種專門學術，尤以戰時的宣傳，更分門別類來作科學的研究，以求作得心應手的運用，所以德國現在竟有「宣傳大學」的設立，足見宣傳是需要專才的。國父對於宣傳人員的培養，向極注意，尤其自十二年本黨改組之後，更設有各種講習所，以爲訓練的機關。他認爲宣傳人員應具備的一般條件：第一要有誠心，國父說：「學問和口才本來是宣傳的方法，如果要能够感

動人，究竟以什麼爲最重要呢？……最要緊的，就是誠。古人說至誠感神，有至誠，就是學問少，口才拙，也能感動人，所以至誠有最大的力量。若是在宣傳的時候，沒有至誠的心思，便不能感化民衆。有至誠的心思，無論什麼人都能够感動」（見語言文字之奮鬥演講詞）。第二要有恆心，國父說：「諸君担负宣傳的任務，應該有恆心，不可虎頭蛇尾，今日熱心奮鬥，明日便心灰意冷。因爲要人必悅誠服，不能一朝一夕，一言一動，能够收效果到這種效果，便非請諸君對於宣傳，做繼續的工夫不可。如果不能繼續做去，便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假若真明白了革命道理，便有恆心。因爲革命是有目的的，要達到一定的目的，便不中途廢止，我們一定要到這種目的，那就是我們的志氣」（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可專注重軍事）。第三要明白主義及社會狀況，國父說：「黨員欲用其能力，出而感化他人，亦猶之軍人上陣戰爭，必自明其槍炮之效力，及其用法。黨員亦必須明白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內容如軍，然後試用之出而

宣傳，始生效力，始能感化他人也。槍炮能有力者，因其能殺人，故大軍一到，敵人即服。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則與之相反，其效力爲生人，革命主義既以生人爲最終之目的，故亦必須週知敵人之情形，尤須明瞭士農工商之狀況。然對待此類人物，非可殺之也，實須生之。如何方可以生之，則須知其痛苦所在，提出方法，敷陳主義，乃能克敵效果。此乃無敵之雄師，無人能抗之者，在乎我黨能善用之否耳。如遇農則說之以解脫痛苦之方法，則農必悅服，遇工商遇士各種人物亦然。然用何方法，用何力量，走何道路，則須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非對於已往及將來，乃對於現在造成良好國家者也。建國方法有二：一曰軍隊之力量，二曰主義之力量……：惟革命奮鬥工夫，必須有方法，而方法必從訓練而來。古人云，「不教民戰，是爲棄之」。其言甚當也，黨人爲主義奮鬥亦然，然必須自己先受訓練，然後出而能感化他人。故我黨人能起而救人，首須明白主義，明白社會狀況，然後人民乃能接受我黨主義也（見黨員須協商軍隊來奮鬥演講詞）。

第四要懂得宣傳的方法，國父說：「諸君所用的宣傳方法：就對人而論，應該由近及遠，先對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家人說明，再對親戚朋友和一般普通人說明。就措詞而論，所說的話，應該親切有味，要選擇人人所知道的材料」（見女子須明白三民主義演講詞）。這是宣傳人員必須具備的一般條件，至於要具備特長的能力，例如長於口才者則使其擔任口頭的宣傳，長於文學者，則使其擔任文字宣傳，長於藝術者則使其擔任藝術，自不待說。

此外關於宣傳材料亦爲宣傳的武器。國父說：搜集材料如軍隊打仗然，打過後必須補充子彈，今黨員出外宣傳，亦當如之，每星期到此補充材料，則宣傳事業自易着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本我之所倡始，所發明，其解釋須一依我之解釋，然後方不致誤解誤講，此處可稱爲諸位之兵工廠，我則盡其力，供給材料，爲宣傳軍士之武器也」。所以優勝的宣傳，必配合適當的材料，材料如果不適當，不但收效微薄，甚至還會發生不良的反響。所以在宣傳材料上就要避免誇大、空疏、歪曲、矛盾等毛病。

根據 國父以上的言論，足見宣傳效果的偉大，惟期收此碩果，達到思想戰的成功，則須確立宣傳的原則和宣傳人員的優秀及配以適當的材料和工具（如口頭、文字、藝術及無線電等）。于此尚有爲我們對敵軍宣傳應該特別注意的，國父說：「吾人當努力宣傳於一切軍隊中，使了然其自身之地位，變反動的兵力爲革命的兵力」，這點，在現代的國際戰爭中，應視爲「化敵國的軍隊爲敵國的敵人」的新戰術，在上次歐戰中，德國基爾運河的兵變，及各部隊中的發生譁變與反戰，這就是協約國方面宣傳的收效。所以我們在今後的革命戰爭，應特別注意「變反動的兵力爲革命的兵力」才可。

其次說到思想戰與武力戰的作用雖不同，但在過程中，均足以互相影響的，即是說思想戰要有武力戰來維持，武力戰要有思想戰來導致有利的形勢。國父在黨員不可存心做官發財的演講

詞上有幾句話是：「我們國民黨，就是革命黨，革命的方法：有軍事的奮鬥，有宣傳的奮鬥，軍事的奮鬥，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宣傳的奮鬥，是改變不良的社會。感化人羣，要銷滅那一般軍閥。軍事的奮鬥，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改造國家，還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羣的奮鬥，更是重要。因為這個原因，諸君從今以後，便要盡去宣傳，介紹國人。加入本黨。在一年之中，不要做很多的事，祇要一個人感化十個人，介紹十個人入黨，我想一個人介紹十個人，不是難事，再過一年二年以後，便是以十傳百，百傳千，推廣到全國，那就是全國的人心，完全被本黨所感化，到了全國的人心，都歸化於本黨，就是本黨的革命大告成功」。

在這次抗戰中，我們已充分接受 國父思想戰的遺訓了，所以「宣傳重于作戰」的口號，便成爲目下流行的口號，在這個口號之下，展開着大規模的思想戰，對內——提高民族意識，增強必勝必成的信念，對敵——摧毀敵軍的鬥志，助長敵國人民的反戰，對國際——爭取國際人士的同情，促成共同抗戰陣線的建立，實施以來，頗著成效。惟今後仍要倍加努力，鞏固我們的精神國防，加強我們的思想戰線，不論在戰時或平時均採取「攻勢作戰」才可。最後我凡引魯登道夫將軍的話來作爲本篇的結語，以供參考：「在未來之全體性戰爭中，所謂宣傳，」等於對人民之口說，其效用尤大。故關於敵國思潮如何，希望如何，願望如何，其對於政府與戰事之態度如何

，均應在平日預爲研究，以此種研究，乃宣傳有效之前提也。處於戰爭千變萬苦之中，則宣傳之效力尤大，尤易動搖其人民之團結。當一造軍隊勝利之日，其國民自不至爲動搖者所惑。其在困苦中掙扎者，最易受外界之迷惑。至於前線與國內有補充兵之來，有病傷者之往，有戰地信札之往還，有居民所受戰事之影響，此種種者，皆可以互通軍與民之間之聲氣。及一旦人心動搖，其軍與民皆無支持之勇氣，而其戰事之出路，惟有一途，爲世界大戰所表現。如余之所指示者是矣」。

參考書：德著日譯：「德國國防科學提要」（育生版）。

九·鐵的軍紀

「軍紀者，軍隊之命脈也，當戰時負有各種任務之大軍，群聚廣大之戰場，其境遇所在不同，而上自將帥，下至士兵，猶能脈絡一貫，萬眾一心，從一定之方針，為一致之行動者，厥為軍紀是賴。軍紀之要素，則在服從，故全軍將士，當以服從長上，確信命令為第二天性」——「戰鬥綱要」第四條。

軍紀就是軍隊的紀律之謂也，亦猶社會的規律，國家的「法律」。其實軍紀亦為國家法律的一部份。社會沒有規律則不成為社會，國家沒有法律不成為國家，自然軍隊沒有紀律也不成為軍隊。軍隊是一種特殊的團體，對於國家社會負有莊嚴神聖的使命，惟其使命重大，自然需要極嚴密極完善的紀律，來維持其生命，健全其本身。至於平時軍紀為戰時軍紀的基礎，倘若平時軍紀不良，必致影響于戰時軍紀的維持，戰時軍紀如不能維持，則上下凌亂，各自為謀，正如烏合之眾——忽聚忽散，亂飛亂噪的禽類之羣，以這樣的軍隊去打仗，縱有良好的命令，必無法執行，縱有必勝的戰畧戰術，亦無從實施，唯有戰敗而已。戰敗，就是軍隊的覆滅，團體覆滅，個

人亦必不保，所以軍人的生命、榮譽、功業是繫乎有組織的軍隊，惟有軍隊的生命、榮譽、功業能發揚光大，則個人的亦隨而發揚光大。爲此，首在維持軍紀，而維持軍紀，則自每個人的遵守紀律始。如果個個軍人都不肯遵守紀律，則軍紀必致蕩然無存，而個人的一切也必隨軍隊的沒落而沒落了。說到紀律的遵守，固不容有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有始無終的行爲，亦無階級之分，彼此之別及特殊的例外，上自統帥，下至士兵，均要一律遵守，尤其愈高的官長，愈要身體力行，以爲部下表率。法國車萊氏說：「革命政府對革命軍之官長與兵卒，木真正共和之誠意，爲一視同仁之賞罰。賞厚於兵卒，而首於官長，官長縱而兵卒不平矣，不平則鳴，如是或官兵相攻于部隊中，或軍隊攻政府，而軍紀壞矣，故欲保持軍紀，須賞罰公平也」。

古今中外的名將對於軍紀，莫不重視，尤其是戰時的軍紀，更視爲神聖不可侵犯，像穰苴之斬莊賈，晉文之斬顛顛，劉邦之斬丁公，孔明之斬馬謖，便是明幽的例證。至見於理論上，孫子列「法令執行」爲七計之一，又說：「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嚴而不能治，譬若騶子，不可用也」。蘇特列第二說：「余戰勝利，皆軍紀之賜也。然戰爭既久，軍紀稍弛緩矣。國家繁榮安靖，皆軍隊有紀律之故，羅馬人及高盧人，剛健，日耳曼民族之狡黠，終能征服世界者，軍紀嚴肅之故也」。拿破崙說：「紀律嚴厲，乃從收斂，殺傷污辱中，救護軍隊者也。軍隊之污辱，比死刑尤酷也」。魯登道夫說：「戰時軍紀較平時尤爲重要。在民族生存之奮鬥中，對於違

反軍紀者，應用種特別法律，加以迅速嚴格之懲罰，否則，綱紀一弛，軍力不保矣。」

國父在革命戰爭中，對於軍紀尤為重視。民權主義上說：「當軍人能够犧牲自由，就能够服從命令，忠心報國，使國家有自由。如某學生軍要講自由，便像中國自由的對詞，成何名爲放任放蕩，學校內便沒有校規。在軍隊內便沒有軍紀。在學校內不講校規，在軍隊內不講軍紀，那還能够成爲學校號稱軍隊嗎？」共和與自由之義的演講詞上說：「在戰時爲軍人，官吏時，則非犧牲自由，絕對服從紀律，萬萬不可。」自由的演講詞上說：「此次的革命，乃國民革命，爲國民多數造幸福。凡事以人民爲重，軍人與官吏，不過爲國家一種機關，爲全國人民辦事。所當夫機關者，全在服從紀律，如機械然，百端相錯，一絲不亂，而機械之行動，乃整齊如一。在黨員之奮鬥固於軍隊之奮鬥的演講詞上說：「軍隊在奮鬥的時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時不對，當士兵的都要服從，照原命令去共同前進。若是聽前進，若將錯就錯，也能打勝仗。如果一部的軍隊看出了命令不對，便單獨行動，以致牽動全軍，不能一致前進，弄到結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顧，自亂陣線，使要被敵人各個擊破，全軍就要覆滅」。民十二在廣州農林試驗場宴請各軍官演說：「軍人之天職首重服從命令，抱定宗旨而行，幸勿爲胡秦莽楚，致受滅亡，如陳炯明昔爲民黨最鋒師之人物也，不期中途失節，足見反覆無常之人，終歸滅絕，吾人可爲殷鑒」。民十四對於善後會議之主張致段琪瑞的電說：「文則以爲會議之能收效與否？全視實力派能聽命於會議與

否爲斷，設以巴黎會議言之，法國福煦將軍戰時統法國之兵不下四百餘萬，協約國陸軍亦踴躍揮，英國海克將軍統兵三百餘萬，美國巴星將軍統兵二百餘萬，其實力在國內洵無倫比，然一旦戰爭平息，糧兵歸伍，對於和平會議講絕無干與，其權限分明如此，故能大有造於國家」。這是說法美軍人的恪守軍紀，我國軍人亦應如是。其次於民元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曾頒布了一個整飭軍紀的命令：「頃據上海太晤士報載南京之兵士現象，均係實情。該報向表同情於民國，今爲懇切之忠告，若不切實警戒約束，不惟貽笑外人，後患何堪設想！該報所載下級軍官及高級之官，終必同受其危險者，誠非過慮。爲此令仰陸軍部速即頒行軍令，令責成各軍司令以下將校，切實奉行，以後各負其責任，並附譯該報所論之文，給與各軍將校傳閱。須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然後能保軍人之名譽，壯民國之干城，我金陵軍隊，不乏愛國健兒，斷不容以少數不規則之行爲，致壞我軍人全體之名譽也，速將此義通知之」。于民十二年所頒的帥令：其一是：「……各部軍隊，着就現駐地點駐紮，自經規定以後，各部軍隊，非奉本大元帥命令，不得擅自行動，致滋紛擾。該總司令等（指湯希閔，劉震寰等——浴日註），務各督率所部申明紀律，保衛地方，以期無負本大元帥撫兵恤民之至意」。其二是：「近日查各師旅部有緝獲奸細，即自行處決，市內聚賭大場之中，而竟然陳屍數日者，殊於文明人違，大相違背，着該總司令嚴行禁止各師旅部自行處決人犯，所獲奸細，務令解至司令部辦理之。又查各處之有無兵而猶用某某司令等名目，以招搖舞弊

者，着該司令嚴行拿辦」。其三是：「茲有不法之徒，專投入各軍隊，領有軍章為護符，無惡不作，致人民與軍隊日生惡感，此與大元帥，救國愛民之旨，大相違背。今特派大本營偵探長李天德嚴為偵察，如查得該匪徒之機關所在，即行報告衛戍總司令部憲兵司令部并公安局協同緝拿嚴究」。此外定為條文的有：

一、倒清
時的軍
紀：

計開：

- 一 不聽號令者殺。
- 二 反奸者殺。

國父在同盟會時代，為推翻滿清，對革命軍所頒布的「軍律」，極為嚴肅。

- 三 降敵被獲者殺。
- 四 私通軍情於敵者殺。
- 五 洩漏軍情者殺。
- 六 臨陣退縮者殺。
- 七 臨陣逃潰者殺。
- 八 造謠者殺。
- 九 私逃者殺。

鐵 的 軍 紀

- 十 任意擄掠者殺。
- 十一 強姦婦女者殺。
- 十二 焚殺良民者殺。
- 十三 殺外國人焚拆教堂者殺。
- 十四 勒索強買者，論情抵罪。
- 十五 私鬥殺傷者，論情抵罪。
- 十六 遺失軍械資糧者，論情抵罪。
- 十七 獲敵軍資糧軍械，藏匿不報者罰。
- 十八 私入良民家宅者罰。
- 十九 盜竊者罰。
- 二十 賭博者罰。
- 廿一 吃鴉片者罰。
- 廿二 縱酒行兇者罰。

二、倒袁
時代的
軍紀：

亦極嚴肅。計開：

國父在中華革命黨時代爲打倒袁逆世凱，而約束將士，所頒佈的「軍律」。

- 一 不聽號令者槍斃。
- 二 臨陣退縮者槍斃。

三 洩漏軍情者槍斃。

四 私逃者槍斃。

五 反奸者槍斃。

六 搶掠者槍斃。

七 焚殺良民者槍斃。

八 強姦或強佔婦女者槍斃。

九 收受賄賂，勒索資財者槍斃。

十 惡仇報復，捏詞誣陷者槍斃。

十一 擅用私刑，擅捕良民者槍斃。

十二 結伴持械互鬥者槍斃。

十三 捏報名額，虛領餉項者槍斃。

- 十四 殺害外國人，焚拆教堂學校醫院者槍斃。
 - 十五 造謠者槍斃。
 - 十六 販賣人口，或擄人勸贖者槍斃。
 - 十七 強買強賣者禁錮。
 - 十八 鬥毆傷殺者禁錮。
 - 十九 遺失或浪費軍械彈藥者禁錮。
 - 二十 竊獲敵軍軍資軍械物品之藏匿不報，私行傳賣者禁錮。
 - 廿一 私人良民家宅者禁錮。
 - 廿二 賭博或開設包庇者禁錮。
 - 廿三 吸食鴉片煙開設包庇鴉片煙局者禁錮。
 - 廿四 縱酒行兇滋事者禁錮。
 - 廿五 濫開娼寮戲館者禁錮。
- 上述的軍紀真是秋霜一樣的嚴肅，也許 國父是根據「孫子兵法」所說：「施無政之令」的原則而制定的吧！亦唯如是才能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武力爲國民之武力」。否則弁髦軍紀，恣意擾民，弄成兵匪不分，那就不是國民的武力，也不是革命的武力，國家的武力，簡直變

爲軍閥的武力了。但是嚴肅的軍紀會使官兵的精神，略於機械呆板，且有時而窮，正如古人說：「徒法不足以自行」。故必須養成全體官兵均能活潑地從內心上去自動遵守紀律，才算是最進步的軍紀，亦即軍紀的真精神。蔣百里先生說：「近代戰爭要人自爲戰，並且每個人都要由內心的自覺來遵守紀律，這才是近代最進步最高的軍紀」。又說：「現在軍事上由於兵學革命，紀律非出於自動不可，比方現代戰爭，一個連長在戰場上無法可以照顧全連人，所以連長在平時要教導士兵，到了戰時，在戰場上能照他所講的自動去做，這算是一個好連長。空軍的紀律尤其要出於自動，倘使飛行人員不能自動的遵守紀律，司令官要他去担任某種任務，他却駕了飛機在天空亂飛一陣回來，至於是否達到任務，司令官耳目不能看到，自然不得而知，所以我說空軍的紀律，必要出於自動，才算是一個現代的空軍戰鬥員」。(計一)

但怎樣才能夠養成全體官兵有遵守紀律的自動精神呢？唯一法門就是統一全體官兵的主義信仰，即對於三民主義都有深切的信仰。因爲三民主義是軍紀的根源，是軍紀的中心，倘若全體官兵於任何時都決志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爲三民主義而犧牲，則他們便可以自覺自動的遵守紀律，而紀律也就可以自然地得到維持，勳則必勝了。國父在革命軍不可存心升官發財的演講詞上昭示我們說：「要大家爲三民主義去奮鬥，變成革命軍，便是與大家爲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爲什麼要大家爲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呢？因爲三民主義去奮鬥，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義，所謂「仁

義之師」，這種死法，是爲主義而死，不是爲金錢而死」。又在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的演講詞上說：「如果我們的士兵，都知道革命主義，便變成革命軍，如果變成了革命軍，便可替革命主義去犧牲，以一當百，百當萬，同心協力去定中國。……他們明白了主義之後，他們的精神，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樣，他們的能力，必同俄國的兵士一樣，出去打仗，便有勝無敗，便可征服吳佩孚」。當然這種的軍隊，是自動地恪守紀律的軍隊，也是說明三民主義是軍紀的根源，軍紀的中心了。

（註二）見蔣百里先生：「兵學革命與紀律進化」演講詞。

參考書 劉文島先生等譯：「新軍論」（商務版）。游洪範先生著：「學校軍事教育綱

要」（商務版）。張民權先生著：「孫大元帥回粵記」。

十・戰畧戰術

戰畧與戰術的關係，正如母子一樣，戰術依存於戰畧，又隨戰畧所指示的方針而行動，戰術的結果足以影響戰畧的成敗，戰畧的正確與否亦足以影響戰術的結果。至於戰畧戰術的定義，幾乎每一個兵學家都有他的界說：蕭米尼說：「戰畧係在地圖上作戰，對戰爭全局打算的方針；戰術係在戰場上直接指揮一部的方針」。克勞塞維慈說：「戰術爲一戰鬥間使用戰鬥力的學術，戰畧爲使用多數戰鬥以達到戰爭目的的學術」。毛奇說：「戰畧係在地圖上運用理想，決定方針，統率全軍以行作戰的方針；戰術係在實地的戰場，指揮一部份軍隊，以行作戰的方式」。哥爾茲說：「戰畧係指揮全軍之術，戰術係指揮一部份軍隊之術」。這都足供我們對於戰畧戰術意義的瞭解。以下我且進而述 國父的戰畧戰術。

現在我們根據 國父的言行來研究他的戰畧戰術，可以說他在對內的革命戰爭中所採取的戰畧是攻勢的，即「戰畧攻勢」，在對外的革命戰爭上所主張的是守勢，即「戰畧守勢」。至於戰術則以採取攻擊爲主，即「戰術攻勢」，現我先談他的戰畧。

一、戰畧
方面：

國父在對內的革命戰爭中，所採取的戰畧，儼民元以前的進攻滿清，可以說
是攻勢的（即以「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奇襲為主），民元的興師北伐，是採
取攻勢，民十一、十三的兩次北伐以及歷次的討賊軍事，也是採取攻勢，即以精
神力比敵處於優勢的革命軍，作連續的進攻，求敵而包圍殲滅之。見於遺教上

有：

一、民元佈告全國同胞書說：「凡我各省軍民代表同心戮力，率衆前驅，效諸葛一生謹慎之
行，守呂端大事不糊塗之旨，運籌宜決而密，用兵貴神而速，自能垂手燕雲，復仇報國，直抵黃
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勳」。

二、民四討袁宣言說：「一旦義旗起呼，義動天地，當以秦隴一軍，出關北指，川楚一軍，
規劃中原，閩粵旌旗橫海，合齊魯以擣京左，三軍旣興，我將與諸君子，扼揚子江口，定蘇浙以
樹東北之威，鞏廳擣穴，共戮國賊，期可指日待焉」。

三、民六護法之役電襄陽黎聯軍總司令暨全體將領說：「執事據荆襄重地，地扼江漢之形勢
，南與滇、黔、川、湘、桂軍互爲聲援，合力並進，以成腹背夾攻之勢，則必勝之算，操自我手
。若復東取武漢，斷敵歸路而西南大兵，奮擊於前，更使逆軍匹馬隻輪不返，前此失在姑息，除
惡未盡，以致奸人迭出，變亂頻仍，今茲務定澄本清源之策，爲一勞永逸之計」。

四、民十一討陳電覆陳護黃說：「分路進兵，以期破賊」。

五、民十三關於討陳及北伐致蔣介石先生的信，其一說：「望兄鼓勵各人速出，一由東江擊破陳逆而出福建，一出江西則川湘各軍必爭先而出武漢，而中原可爲我有，否則不論奉直誰勝，西南必亡，際此之時能進則存，不進則亡，必然之理也」。其二說：「江西得後，則湖南不成問題，然後再會滇唐、川熊，黔袁會師武漢，以窺中原，曹吳不足平也」。于此可見國父亦師承了拿破崙「分進合擊」的戰畧原則。此外，他亦師承了我國古代兵法所謂「先發制人」的原則，因爲採取攻勢的部隊，其動作必須先發制人，爭取戰爭最初的勝利，由最初的勝利，而發展爲整個的勝利。見孫文學說上說：「余倡議討袁，惜南方同志以持重，不敢先發制人，致遭失敗」。又見陳英士致黃克強的信說：「中山先生在其時，適歸滬上，知袁氏將發專制之死灰而負民國之付託也，於誓必去之，所定計劃，厥有兩端。……二曰速戰：中山先生以爲袁氏手握大權，稱號施令，調兵遣將，行動極稱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本案證據既已確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即逝，後悔終嗟無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但是戰畧攻勢的採取，是不限于革命者或侵略者，革命者爲完成他的革命目的必採取攻勢，侵略者爲完成他的侵略目的，亦必採取攻勢。此次歐戰中，德國的閃擊歐陸各國是採取攻勢，日本此次的發動太平洋戰爭亦是採取攻勢，因此，他們都是先發制人，對於

對方都是突然施以猛烈的奇襲。但是攻勢是利於速戰速決的，如果達不到此目的，由攻變守，陷於被動的狀態時，那就會招來極端的不利，甚至戰敗的惡果，這是我們應當深刻認識的。

其次，關於對外抗戰的戰畧，國父是主張採取守勢的，亦即持久戰畧，消耗戰畧。因為敵人的來侵，必取攻勢作戰，利在包圍殲滅，速戰速決，而我國軍力比敵處於劣勢，自然要採取守勢作戰以制之。但國父的所謂守，決不是絕對的「守」，永遠的「守」，是以反攻爲最後目標的「守」，因爲戰勝是取決於攻擊的。克勞塞維慈說：「凡自信是寡弱的，不得不先處守勢，但守勢的結果，不過歸於消極。若守者之力已漸大，則當轉變爲積極目的，速把守勢棄掉，一至抵抗到相當程度，即自然須變爲攻勢。所以守勢作戰循自然之進行，必始於守勢而終於攻勢。若因最初處于守勢環境而限於一般被動的抵抗，始終不行攻勢運動，這是不合理的。若不問事態如何，始終嚴守守勢，決不轉爲攻勢的，那是更不合理。因爲守者專靠站在原來的地位來打退敵人而不轉爲攻勢的軍事行動，是和以絕對被動的守勢思想來行會戰一樣的不合理」（註一）。

國父的主張止和克氏相同，即先取守勢，俾取得充分的準備，養其全鋒，俟敵疲弊，然後乘機大舉反攻。當民初帝俄變畧我外蒙古日急，國父主張對俄抗戰，意謂在戰畧上應先取守勢，俟第五年兵八百萬至千萬，然後轉而採取攻勢，直抵莫斯科，聖彼得堡。見于錢幣革命一文說：「第二謀不敗之戰畧，以抗強隣而保領土。語曰：『能戰而後能和』，誰我今日不能戰，故俄敢公

然後我領土，苦徒然與辦交涉，與之言仲裁，悉歸無效，必也照第一策，先解決財政問題，然後能言戰，而戰必期於不敗，乃能言和，不敗之道若何，必備屢戰屢敗，而軍卒不撓，乃能求最終之一勝。語有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俄有常備兵百萬，戰時兵至五百萬，我現在練兵五十萬，民兵無量數，就俄之現勢而語，六個月內，必難出五十萬之兵，而我則於此期內，可出五十萬於外蒙北滿，六個月之後又可加新練之兵五十萬，然以敵俄，則在第一年之戰，勝負未可知，惟第二年，我當出兵二百萬，意料中當可逐俄出滿蒙之野，而復我黑龍江沿海州之侵地，然萬一仍敗，則在第三年，當出兵四百萬，若猶不得利，則第四年當可出兵六百萬，則未有不勝者也。在此期內，俄必有財政之恐慌，革命之起義，我可乘之隙者甚多，若彼猶不屈服，則期第五年之大舉，其兵至八百萬，或至千萬，必直抵莫斯科聖彼得堡而後已，或疑此作戰之計劃，爲萬不能行之事，不知此乃常理而言耳，若出以非常之力，則未有不能行者也。近世戰鬥之力，每以金錢爲限，吾先既已行錢幣之革命，則不受金錢之壓制矣。而以四萬萬人之人力物力，而供給千萬之兵，五年之餉，實綽綽有餘也。証之以南非杜阿二國，以四五十萬人口之國，能出五六萬以抗英，支持三年之久，而謂不能出千萬之兵，作五年之戰，有是理耶？又証之以太平天國與滿清戰，爲期至十六年，而兩者前後，合計共出兵千餘萬，五六十年前，中國之內戰已有三倍之長期，三倍之兵數，而當時人工物力尙能給之，無待取助於外債，而謂今日則不能乎，無是理也。

况今日乃舉國一心，生死與共，遠非往昔惟知自相殘殺者之比耶」。國父這個主張，實為我們弱者對强者，亦即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國家抗戰的最正確最有效的戰畧，尤以我國的環境情况是利于守勢作戰的：第一人口衆多，擁有無窮的兵員，我軍因敵人砲火的猛烈，犧牲雖重大，但補充却很容易。又以大多數人民尚是過着原始似的生活，任何地帶幾乎都可以自給自足，故非敵人的封鎖所可困。第二、領土廣大，在這種環境之下，敵軍愈深入，戰線愈延長，愈要逐個擊破，兵力愈分散，因此敵軍的困難日增，弱點亦日多，時時處處均予我反擊的機會，且在西南的山岳地帶，加以交通線的不良，更不利于侵略者機械化部隊的活動。這樣，我們便可以實行長期的抗戰，在這個長期抗戰之中，我以新軍力的源源遂成，國際形勢的日益好轉，最後必可以由單獨作戰，變為聯合作戰，實行反攻，戰勝敵人。此次我們對倭抗戰，就是運用 國父昭垂于我們這個偉大的戰畧。到了今日，已使我們深深地呼吸到最後勝利的快要來臨了。

二、戰術
方面：

克勞塞維慈說：「戰爭唯一手段，無論為攻勢，為守勢，而決定戰鬥者，厥在戰術，所以一切戰畧計劃，皆以戰術之結果為目的者，蓋以戰術之結果，為勝利根本原因也」。福煦元帥說：「戰畧自體不能存在，須賴戰術，始能發揮其價值」。戰術之重要，于此可見。在這裡，當我未說到 國父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所採取的戰術以前，我們首先應知道他對於戰術的解釋：第一關於戰術的發生： 國父認為它是發

生于戰鬥的事實，民族主義說：「現在的軍人都是脫入學校，研究學術，學成了之後，爲國家去戰鬥。照這樣心理來講，當然先有實論，然後才有事實。但是照世界進化的情形說，最初人同獸鬥，有了幾百萬年，然後那些毒蛇猛獸才消滅。在那個時候，人同獸鬥，到底有沒有戰術呢？當時或者戰術，不過因爲沒有文字去記載，便無可稽考，也未可知。後來人同人相爭，國同國相爭，有了兩萬多年，又經過了多少戰事呢？因爲沒有歷史記載，所以這些也不知道。就中國歷史來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所以照那十篇三兵書講，是先有戰鬥的事實，然後才成那本兵書。就是現在的戰術，也是本於古人戰鬥的事實，逐漸進步而來。自近發明了無烟槍之後，我們戰術便發生一個極大的變更。從前打仗，是兵士發見了敵人尙且一排一排的齊進，近來打仗，如果見了敵人，便趕快伏在地下放槍，到底不是因爲有了無烟槍，我們才伏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實然後才有書呢？還是先有書然後才有事實呢？外國從前有這種戰術，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戰始。當時英國士兵同波人打仗，也是一排去應戰，波人則伏在地下，所以英國兵士，便受很大損失。伏地戰術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荷蘭搬到非洲的，當時人數只有三十萬，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是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總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從前吃虧不少，便學土人的伏地戰術。後來學成了，波人和英國人打仗，英國也吃虧不少，所以英國人又轉學波人

的伏地戰術。後來英國兵士回本國轉教全國，更由英國傳到全世界，所以現在各國的戰術學都採用他，由此可見是先有事實才發生理論。

第二關於戰術的革命：拿破崙說過：「沒有十年不變的戰術」。克勞塞維慈也說過：「沒有一成不變的戰法」。從歷史上看：戰術的變化，在專用徒手肉搏的時代，是「點的戰術」，到了用戈矛弓箭的時代，便變化為「線的戰術」，再到用槍炮轉戰陸上海上的時代，又變為「平面的戰術」，洵乎現代，由于飛機的出現，便陸上海上空變為戰場，更進化為「立體戰術」了。這不過是就其大概而言。至於戰術的基本原則是不變的，這又是不可不知。自然 國父對於戰術的認識，不是永久不變的論者，並且他又受到拿破崙克氏理論的影響，所以他在民權主義上說：「專就兵學講，外國的戰術隨時發明，隨時改良，所謂日新月異。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國兵器，今日有沒有人還拿去用呢？那是沒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器，沒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器，到了今日也是無用。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成一個大變動，換句話講，就是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國最大的武器，和價值最貴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戰艦。現在外國的戰鬥艦，每艘價值五千萬元至一萬萬元，能够值這些錢的船，才叫做一隻兵艦。外國物質的進步，以武器為最快，武器的進步，又以戰鬥艦為最快，戰鬥艦的變動，最多不過十年，在歐戰以前的戰鬥艦，至今已成廢物。不但是海軍的戰鬥艦有這樣大的變動，

就是陸軍的槍砲也是日日進步，每十年一次變動，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次翻新，現在我們所用的槍在外國已經成了無用的廢物。歐戰時各國所用的大砲，到了今日也是舊式。……不像兵艦操典，過了十年，便成無價值的廢物。由此便知外國的物質科學，每十年一變動，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軍人精神教育上說：「武器與戰術固有關係者，以中國論，昔用之弓箭，而今用槍砲，武器不同，戰術亦隨之而異」。可是戰術的進化，固是跟着武器，而武器的進化又跟着什麼呢？當然是科學。民權主義上說：「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因為他們近來的物質文明很發達，所以關於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種種設備，使非常利便，非常迅速。關於海陸軍的種種武器毒藥，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這些新設武器，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那種科學就是十七八世紀以後，倍根糾頓那些大學問家，所主張用觀察和實驗研究萬事萬物的學問」。

國父認為中國在現代革命戰爭中，是急須建立適用於中國的戰術了，軍人精神教育上說：「自海禁既開之後，與英戰，與法戰，與日戰，與聯軍戰，未有不敗者，非無槍砲，不諳戰備故也。苟諳戰術，則昔日安南之黑旗，法國患之，南非洲杜國之農民，英國患之」。但他却反對幽圖吞棗，依樣畫葫蘆地抄襲外國的戰術，同書說：「此次歐戰發生，每一日中所用子彈，實不知其幾萬萬也，其在激烈戰鬥時，每日所用，有至十數萬萬者，然以其效力計之，則非萬彈以上，不

能中一人也。因彼之戰術，乃以子彈遮攔敵人，使不得前進，故多在二千米遠以外用之，若在八千米遠以外，至幾萬密達時，則須用重砲，亦如用步槍然，必在以彈遮攔敵人之前進，此外空中以飛機戰，水底以潛艇戰，類皆愈出愈奇，尚有露天地洞，與閉天地洞，為砲彈所不能及者，兩方兵士相遇，則以徒手搏擊，甚至開戰時，閱若無人，不知其戰鬥地點在於何處者，推其所耗子彈極多，以噸數計總在幾千幾百噸以上（每一噸合中國二十六担八）。此種戰術，中國決不能學，因彼之製造子彈增加無已，且發彈係以機器，不費人力。現有新式機關槍，一分鐘可發一千五百顆子彈者，以一百顆為一盒，計算每一分鐘，可分十五盒，彼因不求一一命中，務在多發子彈，堵截敵人而止。惟在革命戰爭中的戰術應採取攻勢或守勢呢？今日我根據追隨 國父的老同老說： 國父的戰術是採取極端攻勢的（註二），並且我們根據他如下的電令亦可以看出來：

其一、電令臧致平：「親自督許蔣兩軍同來，非全滅此殘敵（指陳炯明逆軍——浴日註）不可」。

其二、電令許汝為：「陳天太部已出四會矣，現戰情已變，江門軍當全數出三水蘆苞，向高新街方面進攻，以速掃滅粵省城之敵（指陳炯明逆軍——浴日註）為先」。然後再為第二步進取」。

其三、電令虎門廖司令湘芸：「我追擊軍大破殘敵于石灘之東，現已占據福田石龍之線，殘

敵向惠州潰退。虎門各部着速出擊，以掃蕩石龍南東之殘敵爲要」。

于此，我們要明白的，戰術攻勢固可配合戰畧攻勢，亦可配合戰場守勢，但是在現代戰爭上，倘若被迫而取戰畧守勢，如果戰術亦取守勢，始終呆守陣地的挨打主義，這樣，犧牲固重大，尤其無從戰勝優勢砲火的敵人，勢必反爲敵人所突破或迂回，招來全軍的覆沒爲止。古兵法說：「以攻爲守，乃自保也。以守爲守，乃自斃也」。正是此意。故爲擊退敵人，殲滅敵人，戰勝敵人，必須採取攻擊主義，對敵實行前攻，後攻，左攻，右攻，或襲擊，擾擊，誘擊，伏擊，截擊，側擊，尾擊，追擊，亦即放棄「以靜制動」的戰術原則，改取「以動制動」的戰術原則，然後才能導致戰畧的成功。

又，國父在戰術上最喜用「奇兵」，這又是繼承我國古代兵家孫子的「以正合，以奇勝」的原則。民十二東江之役，電朱培德許汝爲等指示說：「望顯派五山抽一勁旅抄敵人後路爲要」。電劉震寰指示說：「望見急調一隊至白沙埔，一以絕敵人後路，二，可保我航線，聞敵人食糧輻重，皆在風門坳附近，若兄能照此行事，可悉奪之，則博圖可解，我軍實亦加利莫大也。幸速圖之」。但用奇兵以「神速」和「秘密」爲要件，能如是，才可以發生出敵意外的行動，這又非有勇猛的精神不爲功。

此外 國父在戰術上（亦即採取攻勢爲主）尚有兩大貢獻如下：

一是游勇戰術：此種戰術，即現今所謂游擊戰術，惟現今的游擊戰術則比較進步了。游擊戰術的原則，早見於我國古代「孫子兵法」中所說的「避實擊虛」，「出奇制勝」。惟此種戰術，在近代為弱者用以對付強者的戰術，亦即被壓迫或被侵略者用以進攻壓迫或侵略者的戰術，即用以奇襲敵人，化敵人的後方為前方，及協助正規軍作戰而達成消耗勝果。一八二二年拿破崙遠征俄國，即困於此種戰術而敗北。蘇聯在大革命中，亦以此種戰術而擊退英、美、法、德、日等國聯合軍的進攻。說到游擊戰在我國此次抗戰中，現正展開於各戰區中，而研究游擊戰術，亦蔚為風氣。但它早為 國父用以推翻滿清的基本戰術了。國父對於「安南中之黑旗」及「南非洲杜蘭之農民」用以對抗英法的游勇戰術，向有研究，當民國十一年興師北伐，駐節桂林，曾召集各軍將校講演「軍人精神教育」，謂「此種戰術頗適用於中國，若以北方交戰，尤為相宜」。跟着舉出此種戰術的五種技能：一曰命中，二曰隱伏，三曰耐勞，四曰走路，五曰喫糲，並作如下的說明：

「何謂能命中？軍隊之有無戰鬥力，以能殺敵與否為斷，故命中為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論，即外國軍隊，亦未必擅長。……若游勇戰術，則與之相反，彼視子彈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輕施放，而有五十顆子彈便已十分滿足。以現在軍隊論，每一兵士，至少有二百顆以上子彈，何以一言北伐，猶以為少，豈命中之技，尚不及游勇耶？諸君須知子彈之接濟與補

充，有在後方者，有在前方者，游勇之重視子彈，因其子彈，止有此數，非遇敵人則無補充之機會，故不在後方接濟，而在取諸前方，此不獨游勇爲然，即如粵軍自援閩以至回粵，其子彈皆取自敵人爲多，而不專恃後方接濟，其明徵也。若在無槍砲而用弓箭之時代，射箭比放槍更難，而古時有一百步穿楊者，即在於能命中，否則臨陣之際，最多隨帶三四十枝箭矢，若無命中能力，卽不啻無的而放矢，祇須數分鐘間，矢盡而已亦就擒，又焉能戰？槍砲亦然，不能命中，則子彈之銷耗多，而殺敵之效力微，前者北京天壇之戰，段祺瑞軍隊耗去三百萬子彈，而張勳之兵死傷，合計不過二百七十餘人，此則由於不能命中之故。由是觀之，子彈之有效在能命中，若不能命中，子彈雖多，皆爲贅物。近時兵士往往輕於放槍，不問命中與否，放槍時，甚有高擡兩手，或緊閉眼睛者，此何異於無的而發矢？須知子彈最爲寶貴，中國既無諸人兵工廠，不宜學歐洲戰術以子彈爲遮擋，宜學游勇戰術，視子彈如生命，但平時須學習射擊，務求命中，不使虛發，此爲軍人之勇，有恃無恐之第一要件也。

「何謂能隱伏？卽避彈方法，但此種避彈，非如義和團之用符咒，乃係利用地形爲人身之屏障，予在安南時，常以此詢諸一般游勇，彼云：人立地上，靶子頗大，敵人一望卽知，故須藉地形以爲埋伏之所，或藏在石頭後，僅露其首，以使靶子縮小，敵人無標的可尋，我尚可從容窺探其舉動，卽在子彈如雨之際，尤宜深自隱蔽，勿庸驚竄，因此時前後左右，必

無敵人蹤跡也，游勇之所述者如此，彼蓋得諸經驗，而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却相暗合（地形屬於天然的如石頭是，地物屬於人工的，如一切建築物是），故隱伏亦為技能之一。

「何謂能耐勞？此與隱伏相關聯者，我亦嘗問諸游勇，彼謂隱伏秘訣，祇是「不動」二字，至少須能耐久十二小時之勞，直至夜深，始可潛行。因子彈之速度，異常快捷，人雖有追風之絕足，必不能過於子彈，走避易為所中，不如耐心隱伏，較為安全也。此尚有實例可證，前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有一次僅贖四人，逃在山上，敵之圍攻者約六百人，然彼實不知僅有四人也，來攻時，皆用三十人為前鋒，而此四人者，如何捱禦？據其事後所述：敵人未來時則隱伏不動，俟彼來襲近，在五十步左右，始行開槍，每開一排，必死敵二三人，連開三四排，敵人之死者十餘人，卒以脫險此一役也，即全在有命中，隱伏與耐勞之技能，否則以四人敵六百人，甯有幸事耶！

「何謂能走路？現時中國，尙未有完全鐵道，行軍之際，專恃走路，練習之法，祇須日行二十里，十日以後，每日遞加五里，如此，則不覺勞煩，而脚力自健。彼游勇戰術，亦即以善走稱。尚有實例可徵，北軍一到南方，每以山嶺崎嶇為苦，南軍則如履平地，快捷異常，是為我之所長，敵之所短，故曰走路一端，每為技能之必要，不可不注重也。

「何謂能吃蠶？游勇所持之糧食，即此炒米一種，每人攜帶十斤，可支六七日，不至苦飢。遇有作戰時，且無須費造飯時間，此亦為游勇之特長，勝於正式軍隊者。去年湖南援鄂之役，其始佔據地方不少，卒因後路補充缺乏，乃至於敗，糧食亦為補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蠶，則於行軍極為簡便，既免飛芻輓粟之苦，而給養亦不患煩雜也」（軍人精神教育）。

以上五種技能，是 國父在廿年前所指示的，較之今日游擊戰上所用的技能，雖是簡畧得多，但仍可作為基本的技能。再以與此次抗戰中正規軍的技能來比較，更見落後，亦仍可作為基本的技能，惟要增加各種新技能，如偽裝、駕駛、測繪、游泳、馬術及防空防毒等。這些技能都是達成戰術目的最主要的條件。然必須使其運用精巧靈活才可。

二、是非常戰術：這種戰術，亦稱革命戰術，係主張「用我軍一千人，可以打破敵人一萬人，用我軍的一萬人，可以去打破敵軍十萬人」，甚至「用一個人打百個人，用一百個人打一萬人」。本來尋常戰術，都是主張以優勢的軍隊對劣勢的軍隊，或以相等的軍隊對戰，極其量亦不過以二對三的軍隊相戰。像兵學天才家克勞塞維茲在他「戰爭論」上，亦是強調「兵數的優勢為戰畧上第一原則」，戰畧如此，戰術亦如是。並論拿破崙的作戰說：「拿破崙常以大會戰制勝，他是近代絕無僅有的名將，除一二會戰未能以多兵制敵，不得不用超絕智力而取勝之外，他都以集中較敵優勢的兵力或稍稍劣勢兵力為常法」（註三）于此可見 國父的戰術思想，實是超越古今，

爲拿克兩氏所不及。他說：「如果我們的士兵，都知道革命主義，便變成革命軍，如果變成革命軍，便可替革命主義去犧牲，以一當百，百當萬……他們如果明白了主義之後，他們的精神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樣，他們的兵士必同俄國的兵士一樣，出去打仗，便有勝無敗」（見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演講詞）。又說：「甚麼是叫做革命軍呢？革命軍和尋常軍有甚麼不同呢？不同的地方，小而言之：革命軍的一個人，常常能够打一百個人，至少也能够打十個人。大而言之，用我軍一千人，可以打破敵人一萬人，用我軍的一萬人，可以打破敵軍十萬人。像這樣以少數常常能够打破多數，訓練很神熟，武器很精良的軍人，才叫做革命軍。……現在廣東有十多萬兵，都不能說是革命軍。因爲他們都是一個去打一個人的，如果我軍一萬人遇到敵人一萬人，才敢去對陣，若是遇到了兩萬敵人，便不敢前進，像這樣的軍隊，有甚麼用呢？怎可以說是革命呢？至於本大元帥今天所講的革命軍，是一千人能够敵一萬人，像有這樣大力量的軍隊，在諸位軍事家一看起來，或者以爲不可能的事。大概照尋常的軍事經驗講，我軍無論談得如何精良，總要用數倍去打擊敵人，才可以操勝算。譬如用三萬人去打一萬人，才可以說是有把握。如果敵人有三萬人，我軍祇有二萬人，便不能說有把握，至於敵人有一萬人，我軍也祇有一萬人，更不能說是有把握。像這樣的軍隊，是尋常軍，不是非常的革命軍。世界上有非常的時候，能够做非常的事業，便有非常的革命軍，才可以做成功。諸位將士不信，祇考察十三年以前的革命歷史，革命黨和

清兵奮鬥，沒有那一次不是以一敵百。用一個革命黨，打一百個清兵，是很平常的事，如果不然，便不能算是革命黨。諸位將士是湘軍，是從湖南來的，湖南老革命黨，最著名的有黃克強，他有一次，白安南入欽廉起義，當時到欽廉來抵抗革命黨的清兵，有兩萬多人，黃克強帶的「革命軍」不過兩百人，所有的武器不過兩百枝槍，用那樣少的人，和那樣多的清兵打兩個多月仗，到後來彈盡而援不至，還可安全退出，照這一次戰爭說：革命軍就是用一個人去打一百人，像這樣的戰鬥，是非常的戰鬥，不可以常理論，像這件事不可以常理論的事，還是你們湖南人做出來的，所以本大元帥要大家以後能够打勝仗，做非常的事，便要變成非常的革命軍。像黃克強那次在欽廉打仗一樣，如果不然，就是槍好彈多，還是送把敵人，自己沒有用處（見救國救民之責任在革命軍演講詞）。再說：「革命軍是用一個能打得十個，一百個能打一千個，一千個打一萬個，一萬打十萬。像這樣用一倍去打十倍的軍隊才叫做革命軍。你們東路討賊軍打的仗本多，但是過細考察起來，是不是用一千人去打一萬人呢？打勝仗的時候，或者是用五百人去打一千人，或者是一千人去打一千人。好像在福建水口打仗，東路討賊軍是用一千人去打北兵兩千人，但是總沒有一千人去打一萬人的，我提倡革命是革命黨的領袖很想造成一種革命軍，現在的軍隊都不是革命軍，祇有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在廣州起義的軍隊，才可以說是革命軍，當他們起義的時候，在廣州的清軍，有滿洲的駐防軍，有李準的水師，張鳴岐的陸師，總計算起來，不下五六萬人。革命

軍的人數，不過二三百人，那裏有今日這樣多的軍隊呢？當時的武器，不過是手槍炸彈，那裏有今日這樣好的長槍大炮呢？，那樣少的人數，只用手槍炸彈，一經發動，便進攻各師行台和總督衙門，後來因爲約定的外援，沒有趕到便完全失敗，死了七十二人，葬在黃花園，所以黃花園所葬的七十二人，就是那一天打死了的革命軍，就是舍身成仁的烈士。所以黃花園的七十二烈士，才不愧稱爲革命軍！假如當時我們的革命軍有三千人，或者敵人祇有三千人，那一次革命，便可以成功。但是當時廣州的清兵不只三千人，有了五六萬人，我們的革命軍，又沒有三千人，只有二三百人，衆寡太相懸殊，所以結果歸於失敗。至於以戰論戰，當時城內之戰，可算是成功。那次革命黨只有手槍炸彈，使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軍，所以我們今天要紀念他。我現在所希望的，不能說是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的軍隊，總要希望革命黨的部下，有革命的精神，最少的程度，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如果不能，便不能當革命軍的名義。……革命軍打，不能用一個人祇打一個人，必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一個人怎麼能够打十個人呢？有胆量，便能够打十個人，有胆量又有槍，更能够打十個人」（見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演講詞）。再又說：「革命先烈的行爲，沒有別的長處，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爲國來奮鬥。從前的奮鬥是甚麼情形呢？大多數都是憑着赤手空拳，有了手槍炸彈，便以爲是很好武器。每次起義，總用很少的這種武器，去和清兵奮鬥，革命黨的見識，都是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此刻在這

地聽話的，多是軍事教員同軍官學生。試問諸位教員，研究軍事學，在戰術中有沒有這個道理呢？有沒有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的成例呢？依我看起來，無論古今中外，都沒有這種戰術。普通的戰術，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便以爲了不得。古時的兵法，都說是十則圍之，倍則攻之。近時兵法，古今才叫做正當的戰術。……辛亥革命，在廣州起義之後，又有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結果是成功。推到當時的情形，是怎樣呢？當在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還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黨不過是幾十人，所有的槍，都沒有子彈，臨時到處搜索，只得到兩盒子彈，一共不過五十顆，革命黨分到了五十顆子彈，便在城內的工程營發難，城外炮兵營，立時響應，便拉兩門炮進城，遙攻總督衙門，趕走瑞徵，佔領武昌。至於當時駐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鎮的新兵，有長江的海軍，又有巡防營的舊陸師，總共不下兩萬多人。革命黨祇用幾十個人，去打兩萬多人，可以說是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廣州起義，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結果是失敗。武昌起義，用一個人打五百人，結果是成功。都是以極少數的人，打極多數的人。廣州是失敗，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奮鬥，不能一慨而論。這樞衙門，是古今中外各國兵法中所沒有的。祇有革命歷史中才有這種倒例。我們繼續來革命，按部就班，便不能說用少數不能勝多數。……軍隊之能不能夠革命？是在乎各位將士之有沒有革命志氣，不是在乎武器精良不精良。如果沒有革命志氣，不研究革命的道理，像滿清末年所練的新軍陸軍，都有很精良的長槍大炮，海軍有很堅固的戰艦和魚雷艇，總不能

發揚革命事業。非常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從前留學日本和歐美各國的海陸軍學生，我們總是設法運動，要他加入革命黨，但是有許多學生，總是不肯加入，始終反對革命。他們那些反對革命的有智識軍人，是其麼心理呢？過細考查，就是他們都有一種成見，自以爲是軍事專家。在我們革命黨主張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用一百個人打一萬人，在他們受過軍事教育的人看起來，以爲這是古今中外戰術中沒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這個道理，我們不必辯辯，只要看後來中國革命，推翻滿清，是誰造成呢？成功的時候，固然是有許多軍事家的贊助。但是窮脈溯源，諒起原動力，還是由於極少數的革命黨所發起的。推到當時一般有智識的軍人，以爲用極少數打敗極多數，是戰術中決不能成功的定案。因爲不贊成這個道理，便不贊成革命，所以提前的革命，因爲那些軍人，都不贊成革命，所以從前的革命黨，真是有軍事知識的人，還是很少。辛亥革命之所以大功告成，是由於全國已經發生了革命之後，段祺瑞便結合一般軍人，聯名通電贊成共和，才能够推翻新清的目的。革命黨因爲降格相從，容納他們的意見，收羅這一般軍人，以後才收軍事上的順利。所以辛亥革命之成功，實在沒有真正軍事學識的軍人（見革命軍的基礎在高的深的學問）。于此可見 國父在用兵上是重質不重量的。就是說，如果我們的軍隊個個都有一爲革命主義去犧牲」的攻擊精神（武器爲次要條件），像這樣的革命軍，「以一當十」，自可殺敵致果。這是有戰例爲証，並非誇大之談，觀于上述，便可瞭然。何況革命軍的對敵作戰，勝固戰

，敢亦戰，從屢敗屢戰中，爭取最後的勝利。于此最要緊的，是全軍上下均要具有決死的高度攻擊精神。倘若當我一千人與一萬的敵人相遇，或一千人與一千的敵人相遇，便心寒胆散，立腳不穩，或怕死偷生，逃遁瓦解，像這樣的軍隊，根本不配作戰，更談不上參加革命的戰爭。所以我們今後在練兵上，一定要訓練每一個士兵都有「以一當十」的攻擊精神，那麼在作戰上就有把握了。其次我們從普通兵學上亦可以證明「非常戰術」的正確，像「孫子兵法」上所說的：「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或「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或「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或「以遠待近，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或「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敵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之所備者多，敵之所備者多，則吾之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也，衆者使人備己也。……故敵雖衆，可使無鬥」。如果我們能够運用這些原則，自可以達成「非常戰術」。至從現代戰術上看，像現代戰術是以「攻擊之重點，以對敵之弱點或其最痛苦之方向指向之」爲制勝的要訣，所以當我的兵數比敵爲寡時，倘若能够作適切的集中，則小力量亦可以變爲大力量，形成重點，向敵人的弱點或痛苦的方向猛烈一擊，那也可以達成「非常戰術」。于此可見「非常戰術」，在古今兵學上實有它的真理。

哥爾茲將軍說過：「關於戰畧戰術，從事著作者，無論何人非其所述原則中考慮本國特別事

戰 畧 戰 術

情，提供吾人以國民的戰畧戰術，則不能謂之真有所貢獻於國家」。真的，中國今後的戰畧戰術絕不能再採取什麼日式、德式、法式、俄式了，它一定要建立為中國化適合中國國情的東西。

國父的戰畧戰術就是中國化戰畧戰術的基本，我們今後應發揚它，更具體的來建立中國革命的戰畧戰術。

（註一）及（註三）見黃譯：「大戰學理」。（註二）據李仙槎、趙超先生等口述。
參考書：李子長先生著：「抵抗的國防論」。西田恆夫著：「戰畧戰術論」。

十一・縱橫戰論

首先我們要知道，應是國父對於戰爭時代的劃分。關於歷史上戰爭時代的劃分：有人分爲：（一）點的戰爭時代，（二）線的戰爭時代，（三）平面戰爭時代，（四）立體戰爭時代。至於現代的戰爭，也有人分爲煤力時期，油力時期，電力時期。這都是就戰爭上所用的工具或動力來劃分的。國父則側重於政治方面，在民權主義上，把歷史上的戰爭劃分爲如下的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

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

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

第四個時期——是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

公理同強權爭。

于此應加以說明的：國父所說「人同獸爭」及「人同天爭」，僅是戰爭的起源，唯有第三

第四個時期的戰爭，才算是真正的戰爭。而且國父在這第四個時期，有一個理想，就是基於民

稱戰爭的成功及民主政治的實現，足以避免將來國內戰爭的發生，近代歐美民主國家，可爲例証。他在民權主義上說：「就中國歷史講，每換一個朝代，都有戰爭，比方秦始皇專制，人民都反對他，後來陳涉、吳廣起義，各省都響應，那本是民權的風潮。到了劉邦、項羽出來，便發生楚漢相爭，劉邦項羽是爭甚麼呢？他們就是爭皇帝。漢唐以來，沒有一個不是爭皇帝的。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外國會有因宗教而戰，自由而戰的，但中國幾千年來所戰爭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我們革命黨爲避免將來戰爭起見，所以當初發起的時候，主張共和，不要皇帝，現在共和成立了，但是還有想做皇帝的，像南方的陳炯明是想做皇帝的，北方的曹錕也是想做皇帝的，廣西的陸榮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還更有不知多少都是要想做皇帝的，中國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兵權大的就爭皇帝，兵權小的就爭王爭侯，現在一般軍人已不敢大者王，小者侯，這也是歷史競爭的一個進步了」。

以下說到 國父關於過去戰爭及將來戰爭的論評：

一、論過

去的戰

爭：

戰史是兵學的泉源，也是將校的教師，凡軍事家對於戰史必有深刻的研究。拿破崙說過：「欲成爲偉大的將帥，唯一的手段，應把握着兵術的祕訣」，——研究戰史。華甸堡伯爵也說過：「戰史的智慧決不是蒐集一切實例，以供我們必要時發見其足以模倣的適例，便算完了，乃是憑實智所獲得的輔神訓練，使我們

於不知不覺中容易認識正確的目的，且可改進我們以前那低劣的無意識的天賦本能，使成爲有意識的力量」。普克爾將軍也說過：「軍隊若缺乏戰爭的經驗，則以戰史爲教育的基本，更屬必要。……戰史雖不能代替實際的經驗，然是爲實戰的準備。在平時研究戰史，乃學習戰爭與決定兵術原則的真正手段」。戰史的重要如此，惟戰史所提示於我們的各種原則，在用兵作戰的時候，則萬不可墨守不變，爲其拘泥，應因時因地而制宜，而神化活用才可。

國父對於古今中外的戰史，莫不有精博的研究。他在「戰學入門」的序文上批評鐵木真，毛奇，拿破崙說：「世之善戰者，有得於天才者，有得於學問者，如鐵木真之起於遊牧而能掃蕩歐亞，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此天才獨勝者也。如莫魯克（即毛奇——浴日註）之運籌帷幄，決勝先機，一戰而勝丹，再戰而摧奧，三戰而敗法，此學問特長者也。至于拿破崙乘法國革命之運，統帥寒之殘卒，與奧戰於意大利之野，以少擊衆，連戰皆捷，轉危爲安，及後幾奄全歐，其用兵之妙，古今無匹，此才學兼長者也」。亦是見他對鐵、毛、拿破崙戰史的研究。此外，他對太平天國戰史，中國近代戰史，及外國民族革命或政治革命的戰史亦很有研究。尤以對太平天國的戰史爲最，這大概是他基於推翻滿清的需要，正同洪秀全的一樣，關於遺點，去年我接到一位老同志由渝給我的信說：「總理生平最爛熟者爲太平軍戰史，對於進兵攻城得地之戰法及地理，往往如數家珍。其材料除得自私人紀錄，及官書外，外人所著關於太平朝事跡，幾應有盡有，嘗言革

命用兵與國家用兵之戰畧不同，太平戰法大可採用，並批判其勝敗之由（計一）。國父撰「太平天國戰史」的序文說：「雖以羅曾劉鄩號稱學者，終不知春秋大義，日陷于以漢攻漢之策，太平天國遂底於亡，豈天未厭胡運歟？其當時戰畧失宜，有以致之歟？還是說太平天國的失敗，有關於戰畧的錯誤。在民權主義更深入地論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說：「從初太平天國便是前車之鑒，洪秀全當初在廣西起事，打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滿清天下大半歸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講起原因有好幾種，有人說他最大的原因，是不懂外交，因為當時英國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想和洪秀全立約，承認太平天國，不承認大清皇帝。但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後，只能見東王楊秀清，不能見天王洪秀全，因為要見洪秀全便要叩頭，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見，便到北京和滿清政府立約，後來派戈登帶兵去打蘇州，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有人說他們的失敗，是由於不懂外交，這或者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也未可知。又有人說洪秀全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他得了南京之後，不乘勢長驅直進去打北京，所以洪秀全不北伐，也是失敗原因之一。但是依我的觀察，洪秀全之所以失敗，這兩個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閉起城來，自相殘殺。第一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楊秀清也想做皇帝，楊秀清當初帶到南京的基本軍隊，有六七萬精兵，因為發生爭皇帝的內亂，韋昌輝便殺了楊秀清，消滅他的軍隊，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也專橫起來，

又和洪秀全爭權，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內亂，便從江西趕進南京，想去排解，後來見事無可為，並且自己也被人懷疑，都說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軍隊帶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滅。因為當時洪秀全楊秀清爭做皇帝，所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韋昌輝、石達開、楊秀清那四部份基本軍隊，都完全消滅，太平天國的勢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錯。洪秀全當時革命，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他一起義時，便封了五個王，後來到了南京，經楊秀清韋昌輝內亂之後，便想不再封王了。後來李秀成陳玉成屢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勢，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們或靠不住，於是同時又封了三四個王，使他們彼此號位相等，可以互相牽制，但是從此以後，李秀成陳玉成對於各王，便不能調動，故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這是說太平天國的失敗，爲主的由于內訌。

其次對於中國近代對外的戰爭。例如論中法戰爭說：一鎮南關一戰，中國還獲勝仗，後來因被法國恐嚇，中國才和法國講和，情願把安南讓與法國，但是在講和的前幾天，中國的軍隊正在鎮南關諒山大勝，法國幾乎全軍覆沒，後來中國還是求和，法國人便以爲很奇怪，嘗有法國人對中國人說：中國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議，就各國的慣例，凡是戰勝之國，一定要表示戰勝的尊榮，一定要戰敗的割地賠償，你們中國戰勝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國，定種種苛虐條件

，這真是歷史上戰勝求和的先例」（民族主義）。又論庚子之役說：「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槍和大砲，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甚至於歐美的洋槍大砲，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較中國的大刀還要利害，所以發生義和團來反抗歐美，義和團的勇氣，起初是銳不可當的，在楊村一戰，是由于英國提督西摩，帶了三千聯軍，想從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館，經過楊村，就被義和團圍住了。當時戰鬥的情形，義和團沒有洋鎗大砲，只有大刀，所圍住的聯軍，有很精利的鎗砲，在義和團一方面，可說是肉體相搏，西摩因為被他包圍了，便用機關鎗去掃射義和團，義和團雖然是被機關鎗打死了很多人，血肉橫飛，但是還不畏懼，還不退却，總是前仆後繼，死死的把聯軍圍住，弄到西摩帶那三千聯軍，終不敢通過楊村，直進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調了大兵來幫助，纔能夠到達北京，解各國公使館的圍。就那坎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槍砲，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藉，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民族主義）。

至於論英法的民權戰爭，美國的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及俄國革命戰爭，詳見民族民權主義，恕不贅述。惟論上次歐洲大戰，我可以舉些例子來。民族主義說：「前幾年的歐洲大戰，這次戰爭亦叫做世界的大戰爭。何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呢？因為這次戰爭擴充影响到全世界，各國人民都被捲入漩渦之中。這次大戰爭所以構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遜民族和條頓民族互爭海上的霸權，因為德國近來強盛，海軍逐漸擴張，成世界上第二海權的強國，英國要自己的海軍獨霸全球，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權的德國，英德兩國都想在海上爭霸權，所以便起戰爭。二，是各國爭領土，東歐有一個弱國叫做土耳其即突厥，土耳其百年以來，世人都說他是近東病夫，因為內政不修明，皇帝很專制，變成了很衰弱的國家，歐洲各國都要把他瓜分，百餘年來，不能解決，歐洲各國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發生戰爭。故歐戰的原因，第一是白種人互爭雄長，第二是解決世界問題。如果戰後是德國獲勝，世界上的海權便要歸德國佔領，英國的大領土便要完全喪失，必成羅馬一樣，弄成四分五裂而亡」。這是就歐戰發生的原因而論。關於此，在同主義又說：「像這次歐洲大戰，便有人說是『打太陽』的地位，因為歐洲列強多半近於寒帶，所以起戰爭的緣故，都是由於互相爭赤道和溫帶的土地，可以說是要爭太陽之光」。其次就歐戰的形態說：其一，關於陣地方面說：「吾今欲請學者一觀，近日歐洲之戰場，當一如德軍第一次攻巴黎之失敗也，立即反攻爲守，爲需要所迫，數月之間，築就長壕，由北海之濱至於瑞士山麓，長一千五百餘

里，有第一第二第三線各重要之防禦，每重要之工程，有陰溝，有地窖，有甬道，有棧房，工程之鞏固繁複，每線每里比較，然過於萬里長城之工程也。三線合計，長約不下五千餘里，而英法聯軍方面，所築長壕，亦如之。……而歐洲東方之戰線，由波羅的海，橫亙歐洲大陸，而至於黑海，長約三倍於西方戰場，彼此各築長壕以抵禦，亦若西方」（孫文學說）。其二關於使用兵器及陣地方面說：「當歐戰的時候，法蘭西本國以北的許多地方，都被德國軍隊侵入，人民的產業化為烏有，房屋也打破了，在那個地方兩軍相持三四年，不但是房屋沒有，就是一草一木都找不出來，成了不毛之地。這是甚麼原故呢？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打仗，是用子彈分勝負，每次仗，一日要用幾十萬或幾百萬子彈，歐美現在打仗，不用子彈分勝負，要用砲彈分勝負，每日所用的砲彈，總是以數千萬計。我們現在的戰爭，在他們看起來，是拿破崙的戰爭，是幾百年以前的戰爭。他們現在的戰爭是甚麼情形呢？在戰綫以內的人，不能在地上走，要在地底下走。在戰綫之內挖了多許隧道，要後方勤務的人，都走那些隧道，去接濟前方的補充。他們現在用砲，好似我們用槍一樣，我們打了勝仗，是說繳槍，他們便不說繳槍，要說繳砲。每次最多的時候，要繳五六萬砲，要繳十幾萬機關槍」（見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演講詞）。

二、論將
來的戰
爭：

國父在實業計劃上劃分現代世界有三種戰爭：（一）國際戰爭——各國為土地而爭，為食物而爭，為原料而爭。（二）商業戰爭——是資本來與資本來之戰爭。（三）階級戰爭——即工人與資本來之戰爭。這種劃分真有見地。至對於世界將來戰爭的趨勢，國父又有一種新觀察，但他這種觀察，不同於戰爭小說家的描寫，也不同於一般星相家的預言，更不同於日本法西斯兵學者武斷將來的戰爭，為毀滅敵國全部的城市鄉村、老幼男女、山川草木以及一切善類的決戰戰爭，並依於無須着陸飛機的發明使用，又可以實行遠距離的決戰。他是以科學為根據，以世界人類的覺醒為前提，推斷將來的戰爭是公理與強權的戰爭，在民族主義上說：「就歐洲戰爭的歷史說，從前常發生國際戰爭，後的歐戰，是德奧土布諸同盟國，和英法俄日美諸協商國，兩方戰爭，經過四年的大戰，始筋疲力盡，雙方停止，經過這次大戰之後，世界上先知先覺的人，逆料將來歐洲沒有燒點可以引起別種國際戰爭，所不能免的或者是一場人種的戰爭，像黃人和白人戰爭之例，但自俄國新變動發生之後，就我個人觀察以往的人勢，逆料將來的潮流，國際間大戰是免不了的，但是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同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和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俄國革命以後，斯拉夫民族生了甚麼思想呢？他們主張抑強扶弱，壓富濟貧，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這種思想宣傳到

歐洲，各弱小民族都很歡迎，現在最歡迎的是土耳其，土耳其在歐戰之前，最貧最弱，不能振作，歐洲人都叫他做近東病夫。應該要消滅，到了歐戰，加入德國方面，被協商國打敗了，各國更想把他瓜分，土耳其幾乎不能自存，後來俄國出來打不平，助他趕走希臘，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到了現在，土耳其雖然不能成爲世界上的顯等強國，但是已經成了歐洲的三三等國，這是靠甚麼力量呢？是全靠俄國人幫助的，由此推論出來，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那些國家是被壓迫的呢？當歐戰前，英法德要打破德意志的帝國主義，俄國也加入他們一方面，後來不知到犧牲了多少生命財產，中途還要回師，宣佈革命，這是甚麼原故呢？是因爲俄國人受壓迫太甚，所以要去革命，實行他們的社會主義，反抗強權。當時歐洲列強都反對這種主義，所以共同出兵去打他，幸而俄國有斯拉夫族的精神，故終能打破列強，至今列強對於俄國，武力上不能反對，便不承認他是國家，以爲消極的抵制（現在英國已正式承認俄國）？歐洲各國何以反對俄國的新主義呢？因爲歐洲各國人是主張使強，有強權，無公理，俄國的新主義，是主張以公理撲滅強權的，因爲這種主張，和列強相反，所以列強至今還想消滅他，我國在沒有革命之前，也主張有強權無公理，是一個很頑固的國家，現在便反對這項主張，各國因俄國反對這項主張，便一齊出兵去打俄國，因爲這個原故，所以說以後的戰爭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今日德國是歐洲受壓迫的國家，亞洲除日本以外，

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強暴的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將來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那些強暴的國家，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一定去和那些強暴的國家，拚命一戰。推到全世界，將來白種人，主張公理的，黃種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種人主張強權的，和黃種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了一場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大戰之趨勢」。這個將來大戰的本質，亦同上述「第四個時期」戰爭的本質，中國現代黨內的革命戰爭是「公理同強權爭」，對外的革命戰爭，像此次的對倭抗戰，也是「公理和強權爭」。世界的將來大戰，也必有一次公理和強權的大戰，在這次大戰之前，也許要經過無數次的混戰，而這次大戰，也許是世界最後一次的大戰，在這次大戰中，將依于主張公理者的戰勝強權者，而永遠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石！

（註一）據馮自由先生於卅年七月田渝給我的信。

參考書：德國史布爾將軍著「兵術論」（世界兵學月刊第二期）。日本石原莞爾著：「世界最終戰論」（世界兵學月刊第六期）。

十二・結語

國父的戰爭理論，真是博大精深，我的研究，已如上述。惟對於「知難行易」的學說，我想在這裡，從軍事上給它一個闡明。這個學說是有普遍性與必然性的「凡知皆難，凡行皆易」的一貫學說。國父爲建立他這個學說，便著孫文學說一書，不憚其煩，連篇累牘，列舉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大例証，使人人容易了解「行之非艱，知之惟艱」的道理，并打破過去「知之匪艱，行之惟艱」的謬說。跟着又從人羣的進化上作進一步的証明，就時的方面分爲：「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爲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爲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之後，爲知而後行之時期」。此三時期，以第三個時期爲歷史發展最難的時期，足証知爲難，行爲易。就人的方面分爲：「其一先知先覺者，爲創造發明。其二後先知先覺者，爲倣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爲竭力變成」，此三系人，在古今社會上都以第一系人爲數最少，亦足爲知難行易學說之佐証。

我們了解國父上述「知難行易」的道理後，在軍事上我亦可以舉出十大例証來：發明兵器

較製造兵器難。發明射擊原理較射擊動作難。設計渡河難於實行渡河，設計要塞難於構築要塞。設計防空難於實行防空。定典範令難，而奉行典範令爲易。定軍令難，而奉行軍令爲易。定軍法難，而執行軍法爲易。定軍政的興革難，而奉行軍政的興革爲易。再就作戰而說，定戰畧戰術爲難，而奉行戰畧戰術爲易，至於射擊破壞衝鋒陷陣的行動更易。其次關於戰爭的進化，就時期說，亦可分爲「不知而行」，「行而後知」和「知而後行」的三個戰爭時期，近代的戰爭爲「知而後行」的最高表現。就軍人說，亦可以分爲「先知先覺」的統帥，「後知後覺」的將校，「不知不覺」的士兵。而徵敵取勝，就是由於此三級軍人的「相需爲用」，協同一致，發揮精神力與物質力所造成。於此我們更應明白的，像「孫子兵法」與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實爲千古不朽的兵學聖典。歷代名將的功業雖有勝於孫克兩氏者，但理論上而能勝於孫克兩氏者實無一人，更足証「知」的難能可貴，孫克兩氏爲先知先覺的兵學大師。又後孫膺的滅龍計，田單的火牛計，韓信的背水陣，孔明的空城計，李晟的雪夜入蔡州，拿破崙的越阿卑斯山，漢尼拔導演的康納維滅戰，興登堡指揮的坦能堡滅戰，這都是證明他們是先知先覺的名將，爲歷代軍人所罕見者。又，當先知先覺將帥所決定的戰畧戰術，來殺敵取勝，部屬因限於後知後覺或不知不覺，往往不知其所以然，直至戰勝之後，仍有不知其所以致勝之道，正如孫子說：「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所以一個軍隊在先知先覺

結

將帥的指揮之下，全體部屬只有服從命令，奉行命令，絕對不容懷疑猶豫於其間。

語

此外 國父知行的學說，尙有三個原則：一是「能知必能行」，一是「不知亦能行」，一是「有志竟成」，都爲我們革命軍人應當把握着的。先說「能知必能行」：我們知道 國父的所謂「知」，是真知，是科學的知， 國父說：「科學的知識，不服從迷信，對於一件事，須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過細去研究，研究屢次不錯，始認定爲知識」（見國民要以人格救國演講詞）。所以我們軍人的智識學問，不是徒在書本上死讀死記，及在課堂裡專心聽講，所可切於實用，須從實地觀察、實地演習，或實戰中去理解它，去把握它，然後才不會再蹈趙括徒讀父書的覆轍。克勞塞維慈氏說：「一切智識雖然大半得自推究事物的性能，而一切事物的效用必待經驗而後知，尤其是軍事智識的基礎在經驗，所以兵學是經驗的科學。例如火藥的效用，如離開經驗只憑想像與測算，實難得知其真相。所以自古以來，一切物質兵器的效果，必須反復試驗。子彈藉火藥之力一秒間飛行千尺，固可由測算而知，然其受空氣與重力的阻礙命中目標實際的效果，必由經驗而後知，物質的效果如此，精神的效率也是一樣」。又說：「所謂危險，所謂勞力，所謂謂報，所謂障礙，都是戰爭特質的元素，從它們妨害戰爭動作的作用上而觀，可總稱爲障礙。要如何方能克服這種種障礙，一言以蔽之曰：「習慣」，惟有慣戰能使身體忍耐大勞苦，惟有慣戰能使精神抵當大危險，惟有慣戰能使判斷不爲眼前印象迷惑。例如吾人初入暗室，瞳孔放大，吸收所

有的發光體，漸漸能辨別諸物和明處一樣，慣戰的情形大概是如此的。戰爭的習慣，也可由平時適當的演習，得着類似實戰的經驗，這要在演習中使各種障礙的一部份出現於實際，使指揮官磨練其判斷力與用意的周到，可以得很大的利益」（註一）。這樣所得的軍事智識學問，才是真知，科學的知，自然可以達到「知之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的地步。所以我們革命軍人今後的求知，決不可讀死書，應從演習中去求知，絕不可怕戰，應從慣戰中去求知，有了這樣的知，才可建功立業。

雖然「能知必能行」，固為上乘，但「不知亦能行」（包含知不完全的意思），亦可奏效。譬如當對敵人情況不明的時候，如果下最大決心，實行冒險攻擊，便可以制服敵人，並且亦可從進攻的行動中去獲得更完備的情報，只為我進一步行動的根據。假設我們因對敵情不大明瞭，為取得更完備的情報然後動作，固會錯過「戰勝之本」的寶貴時間，反會給予敵人以獲得關於我們更完備的情報的機會，又會喪失敏捷攻擊及初步獲勝的利益。至關於「有志竟成」。這是教我們求知和實行都要立志的，誠以軍事學問的博大精深，戰爭的艱難險阻，必有待於我們軍人立下堅強不拔之志，拿出整副的精神力來應付它，才可竟成其事。國父說：「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與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依此而論，我國此次對倭抗戰，就是「順乎天理，應乎

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的大事，又爲先知先覺的最高領袖領導全國同胞一致決志奮鬥到底，故一時雖因軍力懸殊，未克擊退敵人，但必能爭取最後勝利，將如 國父發動推翻滿清，中經十次失敗，終底於成。

最後， 國父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以卓越的天才，遠大的眼光，高深的學問，豐富的經驗，精勤的努力，在立德立功上是空前的，在立言上也是空前的——一面建立了中國現代的倫理哲學及政治經濟理論，同時又建立了中國現代的戰爭理論。不待說，他的戰爭理論是繼承中國固有兵法的精神，吸收世界各國兵學的菁華，並加以自己的獨創而成，又是適應中國現代國家社會的需要而建立的，他憑着他戰爭的道理，運用着他革命的戰法，既推翻了滿清，又完成每一次討賊軍事上的勝利，所以他的戰理戰法，不是一紙上談兵，乃爲必勝必成的法寶。我們中華民族的每一個同胞，每一個軍人今後不祇要認識它，更要發揚它運用它來鞏固中國的國防，把中國從被壓迫被侵略的苦海中搶救出來，在世界上豎起「濟弱扶傾」的大旗！